



# 广州 以什么影响世界

How does Guangzhou influence the world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以什么影响世界 /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8. 5

ISBN 978-7-5491-1770-3

I. ①广… II. ①广…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4713号

出版人：周山丹

策划统筹：阮清钰

责任编辑：黄敏虹

责任技编：王 兰

书籍设计：钟 清

GUANGZHOU YI SHENME YINGXIANG SHIJIE

### 广州以什么影响世界

主 编：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尚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投稿热线：（020）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87373998-8502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序

## 世界的广州

写下这个标题，笔者不禁想起钱锺书为《走向世界丛书》所写序言中的几句话：“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

广州，正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门窗。数千年来，正因其存在，不但让中国通过她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也让世界走向中国、影响中国。她是中国“门户开放”时的重要国门，也是“闭关锁国”时的唯一通道，是钱锺书所谓“门和窗都紧闭”时留下透些气儿的“门窗缝和钥匙孔”。这就是广州的独特之处。她产生的影响正是基于中国与世界建立联系中发挥的特别作用。

### 重要国门：开放中国，融通世界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十九大报告时说，“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 《广州以什么影响世界》编委会

主任 | 李鹏程  
副主任 | 陈志 童慧  
学术顾问 | 章以武 范若丁  
          | 伊始 郭小东  
编审 | 翁敏 阮清钰  
统稿 | 陈晓武 张鸿  
撰稿 | 郭珊 洪丹  
          | 陈龙 周豫

作为中国的南大门，两千多年来广州这扇门始终都没有合上过。正是有了她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一些重要时刻充当了“开放中国，融通世界”的重要桥梁枢纽。千百年来，广州作为国际贸易的中心，是中国参与全球商业的象征和代表，她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接的最强纽带。

面朝大海，大海也赋予了广州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气象。扬帆起航，她无所畏惧，广纳来自八方的人文、风俗，接受航程中的洋流季风以及各种险象。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接受东西方文明的浸润，经过消化、吸收、融合，“开放”和“包容”早已成为这个城市的DNA。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广州长期商贸繁荣，由此也带来了文化的盛兴。尤其明清时代因两朝实行海禁而确定的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十三行就是当时商贸鼎盛的见证。

广州两千多年的建城史以及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开放是这座城市长盛不衰的重要法宝，是广州乃至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本经验。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鲜有如广州这般长久开放、繁荣，在世界经贸交往网络中始终占据枢纽地位的城市。《财富》总裁穆瑞澜（Alan Murray）说：“广州的开放史就是最大的财富，她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接的最强纽带。”诚哉斯言。

开放的大门，包容的度量，让广州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延展至五大洲四大洋，吸引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并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吸引了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缔结36个国际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合作交流城市31个，共有60个国家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2016年10月，第120届广交会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要求更好发挥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作用，在更高层次上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为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如今，广州正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聚力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建设。一张“开放中国，融通世界”的大交通网络体系正在广州显现，其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也更加凸显。

## 千年商都：务实创新，走向世界

千年商都，花开不败，依靠的就是务实创新。正因为如此，她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对于“先行一步”，广州人有天生的执着。当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在一片争论声中，广州人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他们“遇着红灯绕路走”，就这样一个个禁区被冲破。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粤商具有中国人最简单明了的金钱哲学：赚钱为人生第一要义。在广州人的意识中，只要国家不乱、天下太平，多捞点“银纸”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有什么机会，就应该立即动手尝试。正是这种实干的精神，让广州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能够抓住机遇赚到第一桶金。

“敢为天下先”，这对历来讲究中庸之道的中国来说十分不易。延续到现在，开风气之先的敢作敢为，显然是创新创业都需要的风格。所以广州敢想敢做、敢闯敢拼的风气确实对中国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Openness & Innovatio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这是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所定的主题。“开放”与“创新”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两个重要关键词，与时俱进，“创新”与“开放”“包容”成为广州的性格的关键词。

因为开放包容，广州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所在，随着众多新鲜事物的进入、融合、发展，广州又成了开风气之先的创新地。她的文化形成、商业发展都是如此。新的时期，因为创新，广州依旧是一座生机勃勃的魅力之城。

广州的创新，是建立在务实之上的。可以说，务实是其创新的基础和保障，而创新则是务实的延展和升华。广州的务实甚至低调是众人所熟知的。这种务实作风正是广州较早发育出商品经济、讲市场规则的重要原因。

广州正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行动计划，深入推动与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政策沟通、实施联通、贸易共通、资金畅通、民心相通，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承担着核心枢纽作用，国际航运、国际航空、国际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渐次成型，广州对全球高端资源要素的集聚力越来越凸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 红色摇篮：推翻王朝，建立共和

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州曾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摇篮、重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影响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由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鸦片战争的序幕“禁烟运动”就发生在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至今历史遗存仍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对中国的进攻是先封锁珠江口，然后从广州开始沿海北上，广州也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仍然成为英法侵略者首选的侵略目标，甚至一度被侵略者攻占。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资产阶级革命派被迫发动第

二次革命，它的重心在南方，广州是首先宣布独立的地区之一。

护国运动胜利后，孙中山继续为挽救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于1917、1921、1923年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不承认北洋军阀政权。广州是大总统办公之地。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实现全国统一。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把广州作为首都和革命根据地。

1927年4月，国民党实行“清党分共”，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27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发动起义，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府，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公社”。

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新学；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从鸦片战争的爆发，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从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到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先后在广州召开，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从孙中山在这里创办了黄埔军校，到毛泽东在这里主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一幅幅近代历史画卷在广州展开，一个个英雄人物在广州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这些震惊中外的起义、变法、革命活动，使得广州的政治舞台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 独特文化：敢为人先，影响世界

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广州因地域的开放，人心的包容，再加之商业的务实创新，从唐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就隐然活跃。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至今风靡五大洲的禅宗发源地正是岭南，而主要发生地之一就在广州。禅宗、禅学、禅思，从宗教到生活，它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潜移默化的，却也自然会桶底脱落。广州荔湾区华林寺一带，当年是达摩的“西来初地”。早在明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就是通过澳门、广州等地逐渐北上的。

近代以后，广州是外国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广州最早引入西洋风格建筑，最早引进生产玻璃器皿、西洋钟等的新材料和新技术，广州还是中国辛亥革命后最早穿西装、打领带的地方。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是19世纪末广州人詹天佑设计的潮汕铁路，广州也是最早使用电车、巴士的区域之一。广州还是现代学堂教育、文明戏进入得最早的地区和中国最早的外文翻译出版中心之一……一直到改革开放，以至今日，广州向外输出的文化、观念，不但影响中国，也波及世界。

在中国可能没有一种地方方言能像粤语这样影响全国甚至是世界华人圈。粤语歌曲的流行与香港有关，但广州不仅是中转站，也是内地流行音乐的发源地。这些流行音乐又与时尚的影视剧互相影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极大地扭转了人们对广州“文化沙漠”的质疑。

如今，广州已是公认的“世界之城”。2017年6月，全球最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机构GaWC发布2016年世界级城市名册，广州首次入围Alpha-级，成为全球49个世界一线城市之一，在中国内地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这条好消息在广州却多少显得有些波澜不惊，街头巷尾似乎难以听闻此类议论或者欣喜惊呼。长久以来低调务实的广州早就有了一份淡然处之、波澜不惊的心态。

现在，抑或未来，广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已被国内其他城市逼近乃至超过，但在体现城市引领和辐射等功能的较量中，广州仍具有明显的优势，未来广州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排名可能还会持续上升。

“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巍巍广州，正在天地日月江海之间，以成其高覆广载明照大容之业。

编者

2018年5月



## 维新之城

## 风起南方——思想解放的策源地

## 第一章 岭海雄风：南来北往千年不衰 / 002

两千年前，从南越港口扬帆启航 / 002

一千年前，南汉富饶因海丝鼎盛 / 004

碧海万里波不扬的南海神庙 / 006

## 第二章 广州与禅：从宗教革新到日常生活 / 010

西来初地与禅宗播衍 / 011

岭南独有的生活禅 / 013

禅与思想解放 / 015

## 第三章 开眼看世界：东西方思想的激荡 / 016

“一口通商”的特区 / 016

“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 / 018

万木草堂与“百日维新” / 019

近现代思想开放之源 / 021

## 第四章 老城新命：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 / 023

冲破思想僵化的藩篱 / 023

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 026

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 030

## 英雄之城

## 百年风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摇篮

##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中国的觉醒 / 036

销烟：反抗意识的苏醒 / 036

三元里抗英：反侵略的先锋 / 038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 / 039

海军之魂邓世昌 / 041

## 第二章 共和先声：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 043

广州起义：共和第一枪 / 043

碧血黄花：武昌起义的前奏 / 045

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与大本营 / 046

## 第三章 黄埔军校：影响一个国家和时代 / 049

将帅摇篮“黄埔系” / 049

黄埔精神：为主义英勇奋斗 / 050

## 第四章 红色摇篮：新的开辟与探索 / 052

中共“三大”与大革命热潮 / 052

第一次携手：国共合作的开端 / 054

农讲所：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 056

广州起义：“东方的巴黎公社” / 058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 / 061

商贸之城

千年商都——世界贸易版图上的独特地标Canton

第一章 商业文明：独领风骚 / 066

独一无二的滨海商都 / 066

历史悠久的重商传统 / 067

从重商意识到商道精神 / 069

第二章 广州十三行：近代国际商贸中心 / 072

“一口通商”成就世界商都 / 072

“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 075

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首富”集群 / 077

第三章 “中国第一展”：广交会 / 080

广交会——连接世界与中国 / 080

中国推动世界经济最持久的引擎 / 083

专业市场：广州打喷嚏，全国都感冒 / 085

线下的千年商都，线上的超级入口 / 087

第四章 活力全球城市：枢纽驱动 / 090

世界资源配置与财富中心 / 091

阵容豪华的“世界500强朋友圈” / 092

南沙：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门户 / 094

文化之城

蔚为大观——岭南文化中心地

第一章 南学风貌：与古为新 / 100

书院学制改革与学海堂新风 / 100

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 / 103

广州学人与“史语所”才俊 / 105

智星闪耀 / 107

广州大学城：华南文化教育高地 / 114

第二章 文化特质：从容淡定开放包容 / 117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117

骨子里的包容，深藏于民间的开放 / 118

潜移默化的张力，接轨国际的文化 / 120

第三章 传承与革新：绽放海内外的岭南艺术 / 122

绘画：融汇中西，引领中国 / 122

粤剧：驰名世界的“南国红豆” / 125

广东音乐与流行音乐 / 128

引领潮流的南国影视 / 133

“动漫之城”领跑全国 / 135

第四章 融媒之城：时代新绽 / 138

晚清和民国的报业摇篮 / 138

当代中国报业的黄金地带 / 141

微信在广州 / 144

时尚之城

鲜活脉动——衣食住行的世俗与时尚

第一章 齐“话”广州：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方言 / 154

粤语的开放与包容 / 154

你说，我说，大家说 / 156

粤语行走在世界 / 157

第二章 食在广州：美食背后的文化 / 159

粤菜的成长与创新 / 160

粤菜里的城市性格 / 162

亦古亦新的生活习俗 / 165

第三章 时尚魅力：一席流动的盛宴 / 169

西化与新潮，时尚的桥头堡 / 169

白天鹅：现代文明的一扇窗口 / 173

广州会议与世界论坛 / 175

创意产业园的勃兴 / 178

第四章 冲出亚洲：广州恒大与体育精神 / 182

广州亚运：拥抱亚洲与世界 / 182

“南派”武术与精武之魂 / 184

广州恒大的崛起 / 185

宜居之城

云山珠水——北回归线上的明珠

第一章 千年羊城：北回归线上的璀璨明珠 / 190

五羊衔谷，风调雨顺 / 192

风水宝地，气贯长虹 / 194

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人文湾区 / 195

第二章 临水照花：绿色宜居的万花之城 / 198

广州的“龙脉” / 199

珠江与“水城” / 201

千年花市，生态绿城 / 203

第三章 万国衣冠：超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 / 207

和辑百越与民族融合 / 209

华洋杂处：敞开的国门 / 213

孔雀东南飞：不设限的城市 / 217

第四章 匠心筑韵：城市空间的人文嬗变与流传 / 220

中轴线：城市的地脉文心 / 221

骑楼与西关大屋：包容气象，传统骨骼 / 223

建筑背后的大师心影 / 227

崭新的地标“小蛮腰” / 229

结 语 / 233

# 维 新 之 城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英）科林伍德



浩瀚南海之滨，海洋赋予了广州开放的胸怀，广州则用发展为思想解放做注解。广州无疑是历史骄子、时代宠儿，她总能在历史与命运的重要关口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广州发祥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经两千多年，兴盛不败，在世界史上极为罕见，它带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

一个世纪之前，孙中山以广州为大本营，发动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并以广州为中心，提出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建国方略》。

1992年新春伊始，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根本性方向性选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来到广东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2018年金秋十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并发表重要讲话，开启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征程。

在近现代这些改天换地的历史时刻，为何我们总能看到广州勇立时代潮头和历史风口浪尖的身影？为何历史一次次选择了广州？

让我们探寻广州光荣历史背后的思想脉动。

思想解放的策源地

# 南方 风起

| 第一章 |

## 岭海雄风： 南来北往千年不衰

### 两千年前，从南越港口扬帆启航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塞，港口宽阔，河网密布。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经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因此，她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开端，率先进行贸易往来和思想文化交流。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来自北部边境。中华文明一旦遭遇动荡，总是靠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和扩张，以此保存命脉。而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游牧民族，以及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带来的外部文化刺激。这一切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大航海时代后世界一体化而发生改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桂林、南海、象三郡，将岭南纳入版图。秦末，曾随秦大将任嚣征伐岭南的龙川县令赵佗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那一年，开启了广州两千年的“岭南之心”历程。

南越王在此地营造了都城、宫室和御花园。御花园由一座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组成，水池呈斗状，池壁的石板上刻有一个斗大的“蕃”字，是当时番禺城的简称。池水通过木质暗渠流入曲流石渠，蜿蜒曲折，涌出粼粼的碧波。池中龟鳖游鱼成群，池上亭台楼阁，美景尽收眼底。

南越国宫苑遗址的一口井内清理出100多枚南越国木简，其中完整的木简全长25厘米，简上文字均为墨书，字数不等。经初步考证，这批木简是南越国王宫的纪实文书，反映了南越国宫廷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如宫室管理、职官制度、法律条文等。

岭南地区经过南越国近一个世纪的开发经营，汉越民族和睦相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当时的南越国都城番禺，既是秦汉时期的一大都会，更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后，南越国王便开始筹谋如何利用近海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当时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这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出征南越国，战争的熊熊烈火燃尽了南越王的宫室与亭台楼阁。然而，汉武帝并没有放弃海上贸易。当时，南越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已开通，借着已有的海上线路，汉武帝进一步拓宽了海上贸易规模，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汉书·地理志》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为：从徐闻、合浦（今属广西）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开始了与罗马帝国的第一次“间接”来往。内地商人由海路到

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走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到达印度，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则将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希腊、罗马商人再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从番禺、徐闻、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

## 一千年前，南汉富饶因海丝鼎盛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乃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时期，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

今天北京路北段广东省财政厅一带，在唐朝时期是岭南道节度使、清海军节度使、市舶使院等官署衙门所在地，用于管理岭南地区行政事务、传达政令。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王国兴于岭南，都城王宫同样选择在今天的广州市北京路一带。

考古发掘印证了文献资料的记载，在南越国宫苑遗址的西面发掘出南越国的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一号廊道、砖石走道和宫城北墙等遗迹。南汉国一号宫殿叠压在南越国一号宫殿之上，坐北朝南。已发掘南、北两进

殿堂，两者之间有廊道连接。南汉国二号宫殿是当今中国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宫殿之一，根据已揭露的第三进殿建筑规模来推算，整个前殿宫殿面积可能达到近2000平方米，接近故宫太和殿的面积。

在南汉宫殿遗址还出土了一座精美的十六狮柱础石。柱础石用整块石灰岩石雕凿而成，覆盆下层刻有覆莲瓣，上层则雕上十六蹲狮，圆顶面平整光滑，是罕见的建筑雕刻精品。十六只体态肥硕的狮子一雄一雌地围绕在柱础周围，成双成对，“萌”态尽现。

南汉偏安一隅，却建造一座巍峨富丽的宫殿，不禁使人好奇其财富与实力。1997年，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印尼海域发现的一艘公元920至960年间的沉船有助于做出解答。这是一艘归航的东南亚籍商船，船上满载着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乾亨重宝”铅钱等物品，其中银锭足足有5000两之多。银锭是南汉政府的国库银，这笔钱财相当于宋廷996年全年收入的1.15%。可见南汉的富足与其繁荣的海上贸易关系甚大。

公元970年，北宋潘美率军平定南汉，宫殿原址并没有完全荒废，继续被用作宋代“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司署的办公用地。在二号宫殿遗迹的南面，叠压的南宋建筑台基遗迹和北宋官衙广场地面遗迹清晰可辨，两者面积分别达到200平方米和420平方米，气势不凡。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沿用了南汉国的南海海上线路，鼓励海外贸易。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

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宋代朝廷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到了元朝，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政府制定了堪

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至此，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海上丝绸之路远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悠久，延续时间更长，通往地区更多，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更广泛，影响更深远。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

当下，中国正在启动与东盟及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历史上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发展战略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更高层次的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极其重要的当代意义。

## 碧海万里波不扬的南海神庙

自先秦始，一望无际的海洋便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南越王时期，便已利用近海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越来越多的使者、商船从广州出发，沿南海海路前往世界各地。

为祭祀海神，以求“海不扬波”，南海神庙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建成，千百年来目睹海港变迁、沧海桑田，显示出波澜不惊、古朴沉稳之气质。这个历代帝王祭海地，见证了中国海外贸易史的演变，承载着民众对世界友好交往、社会繁荣发展和美好生活的感恩和希望。如今，当络绎不绝的游人流连于石碑坊、华表、碑林、古树名木、仪门和长廊、大殿、后宫之间，仍能一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神韵。每到农历二月“波罗诞”千年庙会，人们在此祈福祭拜，一如千百年前，古代船员进出港口



南海神庙前的“海不扬波”牌坊

前祭拜海神，保佑海上贸易一帆风顺。时移日转，不变的是人们对海洋的信仰和敬畏。

长期以来人们在起航前祭拜南海神，祈求一路平安；返航抵岸，也会来到南海神庙感念神明护佑。外国商人乘船远涉重洋，饱经大海风浪之险，每当他们遥见山上的南海神庙时，不禁发出欢呼：“波罗密特！”在梵语中，“波罗密特”意为“到达彼岸”，外国人皆称南海神

庙为“波罗庙”。

作为历代帝王的祭海地，南海神庙为何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还要从附近的扶胥港和扶胥镇说起。“扶胥”是个古老而珍贵的名字，由此派生出的扶胥镇、扶胥港、扶胥江、扶胥古运河、扶胥浴日等，亦扬名久远。

扶胥港地处广州溺谷湾北缘漏斗湾口，珠江前后航道在此处汇合后，形成宽广的狮子洋顶港湾区，向南眼狮子洋直通虎门入南海，这使其成为通过海上丝路进出广州的起点和终点。

过去，中外商船须在此停靠接受检查，并补充粮食、蔬菜和淡水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使者、商船从广州出发沿南海海路前往世界各地，外国商船也经由此海道前来广州，人们祈求海神保护的愿望与日俱增。

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建立东南西北四海神庙。在审视各处港口的条件后，最后选定广州东部的扶胥镇，建立南海神庙开展祭海活动。扶胥镇地理环境优越，不仅面临浩瀚的黄木湾，海上交通条件极佳，而且人口云集、经济发达、驻有重兵，是建庙祭海的理想之地。

自此之后，南海神庙成为扶胥港的标志，庙、镇、港三者的发展紧密相连。据《元丰九域志》记载，扶胥镇为广州八大卫星城之首，商业比猎德、石门、瑞石、平石、大水、白田、大通繁盛。而《南海志》记载，元代到广州贸易的国家有147个之多，扶胥镇一年税收达4467贯。

至此，历代帝王重视南海神庙的谜底揭晓，以扶胥为始发港的海上商路方兴未艾，自扶胥港的外贸收入，成为充实国库的重要财源。

千年风云，广州得风气之先，勇立潮头，逐步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广州成为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得益于与外邦频繁的贸易文化往来。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有这样的论述：“要个性解放，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在穷

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得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的时候，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淳劝那些关心人心世道的大君子，不要反抗这个潮流吧。”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思想解放”为题论述这一观点的重要性。

| 第二章 |

## 广州与禅： 从宗教革新到日常生活

美国人亨特《旧中国杂记》写道：“再没有人像中国人那样宽容了。无论一个人宣称信仰什么，谁都不会因此而受到迫害或遇到麻烦。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回教徒、孔门弟子和老子的信徒，都享有心安理得的信仰自由。”

从汉代开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陆续传入广州，使得广州在中国宗教史上居于“四地”的重要地位：外来宗教海路入华的首选地、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宗教变革地、岭南宗教文化的中心地。

千百年来，广州各大宗教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形成多元共存的和谐局面。位于应元路的三元宫、光孝路的光孝寺、六榕路的六榕寺、惠福东路的大佛寺、光塔路的怀圣寺、解放北路的清真先贤古墓、一德路的天主教石室圣心大教堂、光孝路的基督教光孝堂等五大宗教活动场所都分布在相距不远的范围内。

禅文化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宗教贡献和文化贡献，它与广州也有着深

厚的渊源。如今禅文化深入广州百姓生活，成为日用而不觉的生活禅。同时，它也已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深刻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

### 西来初地与禅宗播衍

岭南是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虽地处边陲，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镇，也是南禅向外传播的始发港。在这块土地上，曾谱写了不少在中国佛教史、禅宗史上厚重而又闪亮的篇章。历代有不少高僧大德向往岭南，为岭南禅宗的发展筚路蓝缕、躬身践行，从而使岭南的佛教禅宗延续不断、生机勃勃。这些人中，既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僧众，也有翻山越岭而来的岭北名僧，更有泛舟蹈海而至的西域祖师。安世高、强梁娄至、康僧会、迦摩罗、求那跋陀罗、真谛、金刚智、不空等西域大师，将佛教的种子播撒在岭南大地。禅宗六代祖师中，初祖菩提达摩在广州，三祖僧璨在罗浮山活动，六祖惠能长期在岭南弘法。唐宋时期的石头、大颠、鉴真，明清时期的憨山、大汕、天然，近当代的虚云、印顺、本焕、佛源等大师，均是各时期振兴南宗祖庭、中兴中国佛教和传播中国佛教的巨擘。

其中，广州是岭南佛教播衍的重要地。佛经的传入，不管是陆经还是海经，均要经过汉译才可为广大信众所认识。译经成了早期来华的西域僧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广州与洛阳、南京是中国早期三大译经中心。而且海经入华的量可能大于陆经，这就赋予了广州译场的使命和地位。

公元524年，菩提达摩到中国创立禅宗，首站就是广州。后北上河南少林，面壁九年，是为中国禅宗初祖。今日位于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的华林寺正是达摩的“西来初地”，其前身为6世纪20年代所建的西来庵，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名为华林禅寺，后再建供奉五百罗汉的殿堂，成为广东

名刹。达摩带领信众开挖的五眼井至今仍存于“西来初地”牌坊前。清同治十年（1871年）所修《番禺县志》记载，五眼井为菩提达摩率众开凿，因有五泉眼而得名。该井的开挖见证了当年僧众自给自足的简朴修行境界。

据传达摩临寂前曾预言：“一百七十年后，佛法当在南方衍盛。”其禅法和衣钵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代代相传，至六祖惠能而终成南禅，是为“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摩祖师在中国创立了禅宗，起点在南粤，而最终又把禅宗兴盛的希望寄托于南粤。禅宗五代单传后，曹溪禅崛起。“岭南本是禅宗地，世世传灯有姓卢”，岭南寺院受禅宗影响至深。无论光孝寺、六榕寺，还是南华寺都供奉六祖惠能，可见禅宗在岭南的影响。

六祖惠能隐居山林15年后的首次露面就在广州法性寺（今称光孝寺）。当时，寺前的幡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两个和尚争论，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惠能排众而出，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此话一出，惊动了在寺中讲《涅槃经》的印宗法师，连忙延请入寺，得知其为禅宗六祖后，为其在菩提树下再度剃发，并请他升坛说法。至今光孝寺大雄宝殿后面仍有瘞发塔。这是禅宗史上著名的公案。

光孝寺的菩提树是中国有记载最早移植的母树，而后才开花结子，向外播迁。可以说，“光孝菩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彰显了广州在禅宗发展史和传播史上的重要作用。

六祖惠能对禅宗进行革新，顺应历史潮流，他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世间，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和欢迎，从而使禅宗“一花开五叶”，花繁叶茂，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禅宗传入日本始于8世纪，但到镰仓时代（1185—1333年）才真正发展起来，惠能南禅法系的临济宗、曹洞宗和黄檗宗在日本的相继兴盛，带动了日本禅宗流派的勃发。而且禅宗对日本的影响，不仅限于教界自身，而是融

入整个民族文化的日常生活，茶道、花道、武士道等都受到禅文化的影响。另外，《六祖坛经》自1930年黄茂林英译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从而影响世界各地。

禅宗从岭南始，又以岭南兴，从中透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佛教（印度禅）进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调和而最终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即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它的发生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圈的中原大地，而是在核心边缘、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岭南；其代表人物不是饱读诗书的圣贤，而是普普通通的樵夫，确实耐人寻味。

## 岭南独有的生活禅

禅宗思想能够在岭南地区流行与昌盛，与岭南地区特定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岭南固有的文化特质使其更有利于吸纳和兼容禅宗思想。

在中国，南北文化历来有着明显的差异。关于南北文化，梁启超曾这样论述：“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北学是指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而南学则是指以楚越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梁启超认为，北方文化追求的是“治世”“平天下”，而南方文化的最高境界则是“修心”“知人心”。因此岭南文化中“明自然，顺本性”的特征，为禅宗文化在岭南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禅学本就是穷理尽性之学，其旨趣正是恢复自己原来的心——“本心”。所以二者的思想核心非常相似。因此，当禅佛思想传入岭南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历经千年的播衍，禅文化在岭南落地生根，并且潜移默化成为广府人日

用而不觉的生活禅。

早茶是岭南饮食文化中最具代表的形式，也是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真正与广州现今的“早茶”形式接近的茶馆，考证下来大约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一种叫作“一厘馆”的馆子，其设备很简陋，只有木桌板凳，多供应糕点，门口挂一个木牌子，写着“茶话”两字，实际就是一个为客人提供歇脚叙谈、茶水糕点的地方。发展到后来，这样的场所逐渐变得专业起来，内容越来越丰富，场面也越来越豪华，并最终促成了广州人的“早茶”习俗。今天，“叹早茶”已成为广州人生活中的一大内容，也成为广州城市特色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早茶是广州人的传统，套用一段社会学理论：传统之所以得以沿袭，是因为人的某些行为，源于一定的社会需要，这种需要又作为其他人及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因而被铭记心中。

从“一厘馆”到现代酒店茶楼，尽管广州人“叹早茶”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功能、本质并没有特别的变化。旧时广州的“妙奇香”茶楼有一副对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它准确形象地描绘出了“叹早茶”的理念意境。事实上，情趣性、休闲性、交际性和经济性始终是广州人“叹早茶”的不变主题，也是早茶广为风靡的主要原因。

广州人的茶道与禅道往往相辅相成，以茶味喻其禅味，并由茶味之体悟为媒介，陟于禅味之获得与领悟。由茶至禅，对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人生价值取向的提纯，人格情趣品位的升华，发挥出不断迸发的向上作用；潜移默化中弥漫出对法界、有情众生的熏陶力、熏修力——“尘心洗尽兴难尽，世事之浊我可清”。中国禅宗与中国茶道的东传，促成日本茶道的发展，“茶禅一味”也应运而生。

## 禅与思想解放

岭南禅文化之所以形成，跟其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海路开启后，大舶巨舟带来成箱成篋的佛教卷帙，这是陆路“白马驮经”所望尘莫及的。所以佛教的深入传播是从海通之后才开始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大批的海外僧侣从广州入华，在这里传经授道，为岭南禅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另外，还有文化思想上的原因。岭南人自古以来重视“心性”“自性”，广州人的性格里，本来就有禅宗出世之风的“种子”。禅宗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哲学思想，而岭南远离中原，一向有开放的传统，容易接受各种新事物和新思想，再加上商品经济发达，是更适合禅宗发展的环境。

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和发展变异，已形成了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广东的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禅宗文化与岭南文化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早期南粤大地思想解放的火苗一直生生不息。

首先，禅宗对于自身个性的重视和对偶像的破除，有利于人们精神的解放，能够以更开拓的思维去迎接未知的变革，并始终抱有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

其次，岭南禅文化的务实性、世俗性的倾向，有利于在社会变革中以更务实的姿态进行思考与探索。在历史文化发展中，岭南文化代表了民间所需求的利益，古代建筑中的祠堂、书塾，近代的商店、茶楼等老百姓喜爱和实用的民间建筑类型，都是为老百姓所用的。

再次，岭南禅文化具有兼容性的思想特征，这是岭南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反映出来最明显的特性之一。广州人对待古代文化、外来文化，都能采取来者不拒、批判吸收、一切皆为我用的态度，这正是多元文化带来的效果。

| 第三章 |

## 开眼看世界： 东西方思想的激荡

近代以来，广州处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风云激荡之中，历经了中西思想交汇、近代先进思想的蕴蓄、革命运动的兴起。由此岭南文化开始全面而深入的更新，并产生了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走向民族觉醒，打破自我封闭，推进历史变革，引领思想启蒙。众多的政治思想者表现出强烈的“创世”理念，并提出顶层制度设计的构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如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的大同理念、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这些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与广州有着重要的联系，强烈凸显这座城市不容忽视的特质。

### “一口通商”的特区

1757年，刚离开广东到福建的总督杨应琚向乾隆皇帝呈递了一份奏折，回顾了广州十三行设立的原因和经营情况，并根据虎门、黄埔一路的地理形势，认为对外通商应限于粤海关。乾隆批示：“所见甚是。本意



清代外销画里的珠江口船只林立

原在令其不来浙省而已，非为加钱粮起见也。且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而百姓生计亦属有碍也。”随即下达了著名的“一口通商”上谕：“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交易。”同年，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这道著名的“一口通商”上谕，是中国外贸史上的一大转折，广州从此成为清政府的外贸特区，粤海关独揽外贸85年，直至鸦片战争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为止。这段“特区”的历史，让广州的对外贸易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1768年，英国人威廉·希克到了广州赞不绝口：“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形，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景象了。”

由于当时特殊的外贸地位，广州被誉为“金山珠海”，是清朝的“天子

南库”，更是宫廷御用洋货的供应地。在《宫中进单》中，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进贡的记录占全国的10%，其富足可见一斑。

贸易的巨大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让广州成为中国近代东西方交流的“桥头堡”。在明清两朝，广州是皇家引进西方科技人才的通道，一批又一批掌握科技知识的西洋传教士由此进京供职。意大利人利玛窦、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等都是从这里登陆中国，浸淫中华文化数年后才走进皇宫。西式学堂、西方医学、西方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和西式绘画、音乐等大都是从广州传入内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广州这个窗口传到世界各地。

鸦片战争前后，南粤大地上的有识之士们，更在与外国人的对抗和接触中，成为中国“睁眼看世界”、思想冲破传统桎梏的第一批人。在这里，走出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容闳，提出“国家要自强，必定要开放”的近代著名外交官黄遵宪，还有近代政治文明的开拓者孙中山，以及康有为、梁启超、邓世昌、詹天佑等近代著名人物。

## “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

1999年5月18日，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一份以“林则徐广场”命名的议案上签名，从此中国反毒禁毒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在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里占有一席之地，成为鼓舞世界各族人民彻底清除毒品的光辉榜样。而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也塑有林则徐的蜡像。为什么外国人如此看重林则徐，甚至连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车伊始，就在广州擘画销烟事宜。面对来自英国——这个当时西方海洋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林则徐斩钉截铁地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毒贩被迫交出

2万多箱、110多万千克大烟毒品。由于大烟数量太多，销烟整整进行了23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也因此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虎门销烟地虽在东莞，但历史资料显示，林则徐大部分的销烟都是在广州进行。其中一处销烟地就在今越秀区大沙头码头一带。当时此地西临珠江，是一个岛。虎门销烟后，从各府、厅、州收缴的烟土、烟枪仍有不少，林则徐又下令在该处新砌一池，可容纳200石，在池的四角嵌以铁锅，在外烧火煮化鸦片。为纪念林则徐销烟的壮举，2010年广州越秀区在沿江路海印桥底附近建起了林则徐纪念公园。

虎门销烟半年后，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同年，英国的坚船利炮从海上入侵，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中国失败告终。随即林则徐被发配新疆，途中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自勉。

对于外来的东西，林则徐并不是一概排斥。他既看到鸦片的危害，也意识到英人的先进。“开眼看世界”是他一贯的思想主张。他在禁烟运动中主持编译的《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理志书。此书成为后来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创作《海国图志》的蓝本。但其重大意义，不在于为近代中国人提供了一部了解包括世界海洋在内的历史地理图书，而是以同时代中国人少有的远见卓识，开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风气之先。

## 万木草堂与“百日维新”

1890年春，在布政司惠爱街的“云衢书屋”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一起拜谒被时人视为“怪杰”“圣人”的康有为。那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相遇。梁启超《三十自述》写道：“时余以少年科第……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被康有为一番“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之后，梁启超决定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

1891年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康有为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室，正式设教授徒。一年后，学生与日俱增，地方显得狭窄，遂移址到卫边街邝氏祠。1893年冬又迁址到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后来康有为正式将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寓意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意思。正是在这里，通过师生的相互论辩、激荡思想，康有为完善了自己的变革思想，培育了大量的维新变法人才。梁启超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救国志向之确立，正在于万木草堂。正是从广州的万木草堂开始，他们成为相互辉映的双子星。

康、梁二人在广州结合，有其偶然因素，但背后却有着必然的引线。广州以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得风气之先，从早期维新派开始，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即在此鼓吹社会变革，挽救民族危亡。广州是最早受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地区，她毗邻港澳，容易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华工大批出国，到19世纪末，在海外许多地区形成了华人社区，华侨成为当时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广州既得风气之先，促使知识界跃动，先进之士便较早地探索拯救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从早期维新派郑观应、何启、胡礼垣，到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表现出巨大的智慧和理论勇气。认识到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就不难理解何以粤籍人士能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898年，在民族危亡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给清末沉闷的社会带来了新风气。在短短103天的“百日维新”中，康、梁等人力求把变法维新的主张付诸实践。这场变法维新运

动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几乎同时开始。这两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虽然结束的时间有先后，目标、路线不同，但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旨在使中国免受帝国主义欺凌，摆脱贫困落后局面，带有反帝爱国性质，同时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要求兴民权、立宪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改革，在思想文化方面则宣传近代科学及资产阶级文化，这又带有反封建的性质。毛泽东曾指出，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样，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阶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场变法没有成功，却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一次比较全面的批判。近代中国以资产阶级的西学、新学批判封建主义的中学、旧学的运动，正是从戊戌维新开始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近现代思想开放之源

纵观近代以来发生在广东的重大变革运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从地理上看，都最先发自广东，尤以核心城市广州为主要根据地，而后渐次影响和带动全国。有的是以广州为策源地，如戊戌变法；有的是在广州酝酿已久、并以广东人为领袖而发起的，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有的是以广州为基地和中心，如一口通商的“特区”，广州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

从规模上看，它们都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最终打破一省界限，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全国变革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蔓延18省，前后历时14年；辛亥革命从兴中会成立至历次护法运动，延续近30年，遍及海内外；

大革命从广东兴起，通过北伐战争，革命的形势席卷全国。

从手段上看，它们都采取了维新变革、另起炉灶的革命途径，把革命的“枪口”对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力图打破旧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

从理念上看，它们都广泛吸收了同时代全球文明特别是西方先进文明的成果，具有进步性和合理性。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大革命时期涌现的先进人物，这批广东的杰出代表，都以极大的勇气冲出闭关锁国的藩篱，最早开眼看世界，吸收和引进世界先进的思想和理念，由此引领维新变革之风气。

从性质上看，它们都着眼于救亡图存、救国图强，高举维新革命旗帜，力挽中华大厦于将倾；高举强国富民旗帜，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其性质都是爱国运动，并因此得到广大有识之士和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从结果和影响上看，尽管这些维新变革运动有成有败，有彻底有不彻底，但它们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中国走向独立自主、民主富强起到时代先驱的作用。所以有人说，近现代史上中国主要看广州，这绝非虚妄之语。

## 第四章

# 老城新命： 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

## 冲破思想僵化的藩篱

改革开放是新条件下进行的伟大革命，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和试验田，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是广东改革开放伟大试验的中心。

改革开放前，广州与全中国一样，在旧体制内在矛盾与“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挤压下，百业凋敝，经济几临崩溃，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从1966年的10.4%一路滑至1978年末的4.8%，工业增长水平甚至一度低于农业增长水平。在这一时期，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内部是三大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电力、燃料、原材料供应长期不足，交通运输紧张，基建工程进展缓慢，人民需求被遏制，生活困顿；外部是外经外贸发展缓慢，对外交流的闭锁使得偏居一隅的广州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1978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广东省以广州为主要阵地给予了热切回应。刚刚复出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带头明确表态赞成和支持实践标准的观点。在他的带动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逐步开展起来，广大干部群众冲破“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思想不断得到解放，广州由此成为全省思想解放的核心阵地。

作为广州重要的理论战场，《广州日报》不断刊登和转载讨论文章，揭开了广州人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百家争鸣。从城市的企业自主权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经济，从经济领域的市场取向思路到文化领域的裸体雕塑《勇士》，思想解放的火光在群众的热切讨论中渐成燎原之势，新思想、新观念冲击着各条战线、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是时，广州的思想解放在经济领域率先破冰，萌发新芽。

1977年11月，邓小平同志点燃了改革开放“第一把火”：工作重心应当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当各界人士准备积极响应号召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两个凡是”却阻碍了思想的进步。一面是“按既定方针办”，一面是转向经济建设，困扰着全国干部与群众的问号，同样存在于广州人民心中。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摆正理论、解释理论误区、阐释理论真实含义，成为经济发展行动的先行条件。于是，在迎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前，经济理论界的有识之士已擎起理论界拨乱反正的大旗。

这面大旗，率先在广州挥舞。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市的两位经济学先驱已开始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问题。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有恒以“方集”为笔名，发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问题——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价值规律的意见之商榷》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在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决定仍然具有支配的作用。正确地认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对于我们当前的经济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61年，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卓炯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著名理论，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等文章，倡导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沿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认定“高度集中、排除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模式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因此吴有恒与卓炯的先进理论，不仅超出经济学界的理解范围，更因与当时的主流舆论相左而受到批判。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至1977年，此时的中国国民经济被严重破坏，一度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极度困乏，需求被严重遏制。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寻求新道路。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理论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1978年11月至1979年3月，卓炯在《广州日报》连续刊发四篇文章，公开论证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理论。广州经济学界予以积极回应，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深入讨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等系列观点。这一系列商品经济思想，成为日后广州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尽管这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基本思路直到1992年以后才被国家普遍接受，但这一迟来的接纳，并不妨碍市场经济理念在广州实践。更何况，这一经济理念得到了任仲夷等广东省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任仲夷这辈领导人所具有“公权必须公用”的自然化的政治理念，也为广州继续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广州城市新风貌

## 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各级领导的有力支持，给广州人民壮了胆、强了心，为广州实行全面改革铺平了道路。

农村改革序幕悄悄拉开。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州时首先关注“三农”问题，要求“清政策”“农村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要恢复”，中国基层农村在恢复过去做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试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安徽

小岗村类似，广州市的农村改革也从偏远山区开始。1978年底，从化县江埔公社禾仓大队和凤院大队黄一、黄二等3个生产队，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全国少见的近郊农村改革在广州的杨箕村悄悄开展，“包产到户”的做法引起不小的反对声音，面对舆论压力，广州市委实地审查后最终选择了尊重村民意愿，并采取默许态度。这不仅给广州农村改革撑腰壮胆，也为城市改革、经济改革进一步卸下思想包袱、放开手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价格体系改革“闯关”。1978年12月，广州率先放开部分水产品市场，搭办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河鲜货栈。1981年至1984年，广州相继放开禽、蛋、鱼、果与蔬菜价格，并在1985年实现了这七大类农副产品的生产经营与价格全面放开。广州人勇敢的价格“闯关”，不仅使广州在全国脱颖而出，也为践行市场导向的经济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足了实践与试验；不仅实现了广州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也助推了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

商业企业改革逐步实现市场化。1970年，广州的闹市区在林彪集团“把闹市搞淡”的政策下，商业网点被搬迁裁并，商店经营分工被打乱，经营特色被湮灭。1977年底，恢复商业网点、发扬小百货经营特色成为广州市委进行商业改革的首举。随后，广州黄埔等区域的群众围绕“近郊农贸市场应不应该开放”这一话题展开了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近郊农贸市场在全市范围内的恢复与开放。其后，广州又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1981年，广州正式实施“一费三养”的特殊政策，盘活了城建资金，解决了城市用水、交通紧张的问题；1983年，利用外资兴建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等，打造对外活动交流配套环境；1984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企业经营积极性；1988年，由广钢与香港粤海集团合资成立的广州钢铁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钢铁联合企业，带领国企改革进入新

篇章。

广州内部各领域的全面改革，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奠定了内部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群众还未到达温饱线时，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粤港两地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在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后，广东省委开始探索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研究发展对外贸易的问题。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他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得到中央的赞同和支持。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提出实行新体制和试办特区的要求。在这当中，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担起了对外开放的重任。

1978年，改革开放新气象在广州的春交会上蔚然成风。在“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讲究实效，不强加于人”的方针下，这届广交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表现不俗，为我国树立对外贸易信誉、提高对外宣传水平做足了试验与实践。引领珠三角乃至全省实现改革开放前半程突围的“三来一补”引资模式，在广交会初现并最终成型。

“三来一补”，是广州的大胆尝试与设想，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短缺、物料短缺，却急于发展的问题，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开辟了引资、用资的新模式。

随着出口加工的逐步发展，设立特区，树立典型，强化外资利用率，快速缩小与港澳差距的想法在中央及广东省层面逐步出现。1980年，中共

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此前探索的“出口特区”定名为意义更为广泛的“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从此起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1983年，广州抓住成为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的契机，积极践行“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探索财政与市场政策的全面对外开放，加强吸引外资来穗的能力，摸索对外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新路径。

整个20世纪80年代，广州市积极响应广东省改革开放各项试验需求，在习仲勋、杨尚昆、任仲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中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行一步，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各个领域体制机制建设取得无数新突破，使广州成为国内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广州经济建设硕果累累，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43亿元飞跃至1991年的386亿元，“中国第三城”由此而来并延续至今。凭着广州人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披荆斩棘的创新实践，广州在一穷二白、毫无退路的境遇下，谱写了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

广州人在突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治教条、开创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思维道路上越行越勇，一面敢于积极接受国际社会先进思想观念，率先接纳卓炯等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理念，一面顶住党内、社会的质疑与批判，积极践行“改革无禁区”，彻底突破单一所有制形式，容纳一切市场经济早期做法，扩大改革试验场域。可以说，改革开放的第一程，广州对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与践行，不仅带动了广东经济实践的全面开展，也给全国人民开启了现代思想的闸门。

## 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1978年后，在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带领下，全国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天。短短十余年，冲破思想藩篱所焕发出来的科学精神、创造激情和革命干劲，将改革开放的浪潮全面推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得以提前实现。

20世纪90年代，更具深度与广度、更宏伟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开启，给全国人民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但这一次解放思想任务，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内部出现了新的经验教条、思想僵滞、体制机制缺陷；外部是国际社会动荡不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时间“思想解放过了头、改革过了头”的质疑声此起彼伏。许多城市、地区开始犹豫徘徊。

广州也不例外。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与突围，广州经济实力跃居全国第三，两个文明建设成果全国瞩目，但薄弱环节也逐渐显现。一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国际环境的风云剧变，不进则退的可能性迫切要求广州人进一步解放思想；二是十余年的经验积淀有可能成为故步自封的理由，亟待反思与扬弃；三是总体优势尚未能完全发挥，身边的深圳、珠海等兄弟市凭借着政策优势与先进理念，渐成赶超之势，长三角、沿海开放城市等已加入竞赛大军，再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迫在眉睫。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知问题。在“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重要精神的指引下，广州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力争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这一宏伟蓝图下，广州开始系统谋划发展纲领。基础制度上，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配套进行财税、金融、外资、价格与流通

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外贸易上，继续坚持以对外经贸为导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三让三得”政策的提出，提高了招商引资项目质量，解决了广州部分建设资金问题。

这一时期，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入高速发展期，开放领域从生产领域向金融、贸易等服务领域拓展，跨国公司、高技术公司纷纷进驻，直接推动了广州工业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的先行标兵广东，再次进入为全国探寻科学发展的试验区，而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广州，早已对此有了先觉与自觉。

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简单地将现代化视为工业化的时候，广州已经开始寻求新型工业化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伊始，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问题，让广州意识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模式的缺陷。调整优化第二产业，变劳动密集型经济为技术密集型经济，重点发展对国民经济起支柱作用的高科技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旅游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五大产业群，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带头作用的信息产业，成为广州经济结构优化目标。20世纪末，《广州市青山绿水蓝天计划》出台，让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调整相映生辉，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实践经验。

21世纪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早期追求“杀出一条血路”的思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改革已到了必须进行顶层设计与系统设计的关键阶段。如果说前两阶段，广州依靠着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阶段扩大内需，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城乡平衡，区域协调发展，成了新时期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推力。

为此，广州以“海交会”为基地，请来了有意来中国创业、创新的大量海外高层次人才为广州出谋划策，帮助诊断粗放发展模式存在的各种问

题及其症结，并对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进行大力改造——广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改造，大胆触及国有企业破产和重组的深度难题。

具有广州特色的国企改革之路始于1999年，依照行业属性划分、以资产整合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使得广州近年来在汽车制造、钢铁、医药、机械装备、轻纺日化、能源交通、商贸旅游和建筑房地产等领域催生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广州也由此成为广东省内，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的国企改革“标兵”。由此也催生了全国首部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专著《集团突围——广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纪实》（广州市文联出品）。

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都在同步推进。

行政审批改革全国领先。1999—2000年，第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广州开展，清理取消了202项不合事宜的审批项目；2002年，第二轮改革继续发力，清理取消273项审批项目。此后十余年，广州政府的“自我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商事制度改革领域深入开展，广州成为全国首个全面实施此项改革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此项改革的拉动下，广州市营商主体数量持续保持大幅增长。2017年广州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32.8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20.7万户，同比分别增长33.9%、45.8%。

“南沙经验”先试先行。2012年，国务院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设立广州南沙新区为国家级新区，南沙新区成为唯一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国家级新区，其开发建设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南沙，由此成为立足广州、依托珠三角、连接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新区。其后，南沙片区率先试水“容错”机制，让改革创新者敢于放开手干。全国首创政府购买查验服务、全国首创海关快速验放机制、全国首创“智检口岸”……多个全国首创的“南沙经验”全面开花。

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闯关。面对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与传统的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这一经济新矛盾，以商贸、制造业见长的广州，加快步入“去产能与调结构、去杠杆与强实体、降成本与优服务”之路，立足创新，力求以重构产业布局寻求城市竞争力再上台阶。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发展方针调整为“三为主、二致力、一促进”，并与其他50多个国家级开发区一道，探索转移跨国企业高科技高附加值加工制造环节、研发中心及其服务外包业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区。2016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中（国）新（加坡）广州知识城开展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广州创新驱动战略更上一层楼。根据批复，中新知识城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知识城打造成为“立足广东、辐射华南、示范全国”的知识产权引领型创新驱动发展之城，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探索经验。

同时，广州也在总结、吸取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从此前已经认识到的产业布局均衡性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均衡性问题、城乡发展的均衡性问题、城市新老市民享受发展成果的不平等问题等，到全球已然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泥潭”等都是需要破题的方面。当初的广州紧盯香港，透视世界，而今，世界已以更全的面貌出现，以真实的现代“世界”为对象，筹划广州的改革开放与均衡发展，更需要广州人放宽视野、谋篇布局。

# 英雄之城

居世逢乱离，始辨英雄士。

——（清）陈恭尹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7年北伐战争成功，广州是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前线，也是新事物传入的窗口，近现代维新、革命的策源地。这段时间不足百年，但贯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和现代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面貌及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年代。

这百年光阴是广州历史文化名人出现最密集、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广州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上百个近现代名人深沉有力的足迹。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风云人物均在广州雄姿英发建功立业，近代科技巨匠冯如、詹天佑和现代文化泰斗鲁迅、郭沫若、陈寅恪等均曾在广州生活、工作过。在中国，像广州这样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历史文化名城并不多见。

广州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更在于它是近现代多种先进思想和理论的起源地，比如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先驱康有为、梁启超在此著述讲学，培养了一大批维新运动的人才，提出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推动了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此领导革命运动，着手推行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系统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纲领。

与此同时，近现代革命在广州留下了丰富的史迹遗存，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和纪念碑、万木草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旧址、大元帅府、中山纪念堂、中共“三大”会址、农民运动讲习所、团一大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每一个事件节点、每一个历史遗址，都成为近现代广州引领全国民主革命思潮的坐标。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摇篮



| 第一章 |

## 鸦片战争： 中国的觉醒

### 销烟：反抗意识的苏醒

中英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向中国推销鸦片。鸦片贸易侵蚀清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中英两国贸易地位发生了转变，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据统计，仅1820至1840年间，中国就有一亿两白银外流出去，已经开始影响清王朝的货币市场，使清王朝的经济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鸦片会极大地摧残吸食者的身心健康，而且容易成瘾，使得鸦片交易屡禁不止。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一方面宣示自己禁烟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加紧收集烟贩的罪行。一次，林则徐以钦差的身份，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名学子入贡院“考试”。名为考试，实际上等试卷发下来学生们一看，试卷中夹杂着一张纸条，上面试题四道：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零售商、过去禁烟弊端、禁绝之法。学生对鸦片深恶痛绝，因此都认真地写下每个人知道的具体情况。

6月3日至6月25日，林则徐下令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不仅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发展，也让人看清了英国商人资本扩张的本质，唤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关注。

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开始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创了以条约形式掠夺和奴役中国合法化的先例，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中国人斗争的双重历史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销烟直接打破了看似平衡的利益局面，唤起了当时很多爱国的有识之士的省思，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大抑制了英国在中国的鸦片交易，沉重打击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贸易掠夺，展示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坚定决心和觉醒意识。此次事件还成为世界禁烟运动的一个范例，历

史上很多国家、地区结合自身的情况对此予以效仿，抑制毒品泛滥。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展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 三元里抗英：反侵略的先锋

三元里抗英事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与非官方武装力量在广州市郊三元里发生的冲突事件，也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运动。

1841年5月25日，英军攻陷广州城北诸炮台，设司令部于地势最高的永康台。永康台又名四方台，距城仅一里，大炮可直轰城内。清军统帅奕山等求和，5月27日与英订立《广州和约》，以支付英军赎城费、外省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但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萧岗等村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图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击退来犯的小股英军，三元里民众料到英军必会报复，所以在三元古庙集合，相约以庙中“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会后，他们分头联络附近103个乡的群众，准备共同战斗。次日，南海、番禺百余村团练手持戈矛犁锄，群起围困永康台。相持近半日，英军司令卧乌古亲自带兵出击。团练且战且退，诱敌至牛栏岗丘陵地带。时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发射，团练民众冒雨反击，将英军分割包围，肉搏鏖战。追击过程中，英军第三十七团的一个连（60人）被义军截至稻田中，三四十名印度雇佣兵被刀砍毙伤。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英军战死5人，受伤23人，另有一名少校因疲劳过度而死。31日清晨，广州手工业工人以及附近州县如花县、增城、从化

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相约饿死英军。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闻讯恐慌，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他们用土枪、土炮、矛戈、盾牌、锄头、镰锹等，与英军作战。可谓“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三元里之战，英军惨败，6月1日英军退出广州。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方面是中国民众更加坚信自己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点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影响巨大，从当时的影响来看，它直接在广东乃至全国激起了一股抵抗英国侵略的回流，甚至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英国侵略者更加坚定了用武力征服中国的决心，这就迫使清政府极不情愿地打开了国门，在一种武力的胁迫下用所谓的“据理力争”的手段去应付外来侵略者的种种要求。一段漆黑而漫长的民族屈辱史在这次中国民众与英国军方的较量后逐渐有了参照，一段艰难而曲折的民众抗争史在三元里事件之后显现出了清晰的历史坐标。

###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场运动持续了14年，席卷全国18个省，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针对当时泛滥于清朝社会的鸦片流通制定了严厉的禁烟政策，展现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太平天国在建立政权后，积极制定和推行经济、政治、军事改革。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中，广州人洪秀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洪秀全出生在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为了考取仕途功名，曾多次前往广州应考。广州的时局和风气对其思想触动很大。

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的口岸城市，鸦片战争后，一度受到抑制的鸦片贸易卷土重来，大街小巷公开摆卖鸦片，城内烟馆多达五六百家，广州府属各县各大圩（场）烟馆遍布，鸦片滥用也成为花县乃至近代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

与此同时，西方文化思潮也相继涌入。尤其是基督教正经由马礼逊和他的助手梁发等传教士在广州开展活动。梁发是佛山人，他编著了易于国人理解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据说1833年洪秀全就是从在广州秘密传教的梁发手中获得这本书，成为促使他思想转换的重要启迪。

洪秀全四次落第，但在1828—1843年四次往返及停留广州，给了他广泛接触、深入了解社会各阶级生存状况的机会。洪秀全忧虑鸦片输入对民族带来的灾难，耳闻目睹各地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以及林则徐在广州发动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特别因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最早，广州一带人民受封建压迫和外侵之苦最深，先后掀起了火烧十三行和著名的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武装挑衅的斗争。这一切都给洪秀全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使其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他把个人的悲愤际遇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激发了对现实社会、对清朝政府的强烈不满。

受到《劝世良言》的启发和影响，洪秀全随后创立拜上帝教，以传教为名，发动群众，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为破除旧的封建体制撕开了一道口子，也对外国侵略者有一定的打击。1861年，面对英国联合太平军消灭清朝，成功之后平分中国的条件利诱，洪秀全断然拒绝，这与清政府开门揖盗的卖国行径形成鲜明对照。当然，以传统农民运动的认识水平和使用手段，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肩负起反封建、反侵略以救中国的历史使命，注定以失败告终。

## 海军之魂邓世昌

清末海军名将、民族英雄邓世昌（1849—1894）是广东番禺人（今广州市海珠区），原名永昌，字正卿。自小立志加入海军，以御强敌。1867年，他考入船政学堂海军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被船政大臣沈葆楨奖以五品军功，派任“琛航”运输船大副。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闻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将其调入北洋水师，任“飞霆”“镇南”炮舰管带。1888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任中军中营副将，兼“致远”舰管带。

邓世昌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海军将领。他“执事惟谨”“治事精勤”，刻苦钻研海军战略战术理论，注意学习西方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在他精心训练下，“致远”舰“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成为北洋舰队中整训有素，最有战力的主力战舰之一。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在“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海军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却被另一条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的爱犬

“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壮烈牺牲后，清廷谥以“壮节”，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山东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号，以彰显中国海军风骨。

## | 第二章 |

### 共和先声： 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广州依靠长期对外通商的优势，最早形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向上海、天津、福州及全国各地发展。三大阶级的形成，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阶级格局，为后来中国社会的一切演变播下了优良的种子。各种思想启蒙和理论形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中国民主革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与土壤，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系统纲领都在此酝酿。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中心地就在广州，后来又以广州作为反帝反军阀的大本营。

#### 广州起义：共和第一枪

正当康、梁等人在为改良变法奔走呼号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已经发轫。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并决定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共和制。这是

孙中山提出的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从事的战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广东地区的反清武装起义有八次，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所占的地位也最重要。兴中会首次起义地点便选在广州，继而形成影响全国的革命思潮。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立即着手准备反清武装起义。他在发展多个会员的同时，组织了兵操队。他借用当地一所学校，聘请一名丹麦军事教官对20多名兴中会会员教授兵操，进行训练，并在会员中筹措经费，共筹得13000美元作为起义经费。1895年1月初，他与邓荫南赴香港组织反清武装起义，把革命纲领付诸行动。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联合辅仁文社杨衢云、谢纘泰等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路13号成立兴中会总部，此后酝酿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前夕，孙中山驻守在城内，负责指挥一切起义事宜。经过半年的准备，一切就绪。10月26日，重阳那天，各部都派人到总部请命。孙中山突然接到杨衢云要求延期两天起事的电报。孙中山料到延期必然走漏风声，便暂令各路人员回原处候命，并电告杨衢云停止派人来穗。当晚，陈少白撤离广州。27日晚，孙中山乘船离穗，辗转到了日本。粤督谭钟麟得到朱淇之兄朱湘的密报后，即派兵包围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机关，陆皓东等六人被捕。杨衢云仍在香港积极布置，在接到孙中山停止行动的电报前，已派员送武器下船，朱贵全、丘四等已随轮赴穗。28日，当船抵广州码头时，清兵已在岸边把守，朱贵全、丘四等70余人被捕，陆皓东英勇牺牲。于是广州起义尚未发动就遭到镇压。但它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第一次尝试，是此后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统治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是辛亥革命的先声和前奏，也是孙中山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战争事业的开始，具有重要意义。

## 碧血黄花：武昌起义的前奏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发动了十次著名的起义。其中黄花岗起义是十次起义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干部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孙中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列强疯狂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的命运悬于一线”；清政府加紧搜刮，“民心大变，时有反抗”；“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他决定集中全力再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破釜沉舟的起义，并针对革命党内因失败而气馁的思想指出：“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尚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黄兴响应孙中山的倡议，并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

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时半，一声号响，黄兴率先锋130多人，臂缠白巾，脚穿黑面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冲出小东营，枪杀沿途街道巡警，直奔总督衙门，杀死管带金振邦，冲入内堂。两广总督张鸣岐正在主持防范起义的会议，闻警即越墙潜入厚祥街逃到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放火烧毁督署，从东辕门杀出，与李准援军发生遭遇战。革命党人林时爽中弹阵亡。黄兴伤右手，断了两指，仍坚持指挥，决定分三路突围：一路由黄兴率10余人出大南门，准备接应响应起义的巡防营；二路由徐维扬率花县同志40人冲出小北门，接应事前已联络响应起义的新军；三路由刘梅卿带领川、闽和南洋、安南回国的“选锋”，攻袭督练公所。黄兴等转战至双门底，因事前未曾接头，竟误与前来响应起义的巡防营党人温带雄等展开枪战，方声洞中弹牺牲，余众在混乱中被冲散。

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潘达微通过善堂出面收殓烈士遗骸72具，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参加这次起义的130人中，除少数幸存者外，战死和被捕牺牲的总人数在100人以上，其中华侨30人（广东华侨29人）。

黄花岗起义尽管以失败告终，却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大起义。它准备和两湖三江的革命党会师长江，实行全国大举，其规模之大、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同时，革命派在历次起义中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他们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教育和鼓舞着广大群众，促使人民群众逐渐觉醒，对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理解不断加深，大大促进了革命热情的高涨。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黄花岗起义成了武昌起义的前奏，而且为辛亥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积累了一些经验，促成了此后斗争策略的转变。

## 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与大本营

作为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回顾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广州在其中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广州是辛亥革命运动的酝酿地和策源地，是最早揭开辛亥革命序幕的地区。在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反对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的斗争中，广州自始至终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成为当时革命的重心甚至大本营。无论是在辛亥革命的前期，还是在辛亥革命中期乃至后

期，广州一直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这里不但产生了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还产生了一大批辛亥革命的精英，如陆皓东、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他们都是孙中山参加革命初期的坚定支持者、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同志。还有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和孙中山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策划、领导了广东和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狭义上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具体是指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其实在辛亥这一年（1911年）有三件大事：第一是黄花岗起义；第二是革命烟火蔓延至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运动，以四川最为激烈；第三是武昌起义。这三件大事有着必然的联系，广州黄花岗起义是揭开辛亥革命的序幕，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武昌起义则是总爆发。

广州是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重心和大本营。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革命的成果很快落到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之手。孙中山等又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在这几次革命运动中孙中山都十分重视广州的作用，广州人民也给孙中山巨大的支持，始终充当重要角色，起到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二次革命”最后失败了，但这毕竟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南北战争，是维护民主共和的一次武装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总结失败的教训，组织中华革命党，1914年就派朱执信、邓铿到广州、澳门等地成立指挥机关，策动全省反袁。

孙中山高度评价广州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自乙未以来，大小数十

役，……数国内革命之军，敢死之士殆往往有吾粤志士从事期间奋其义愤。辛亥一役，遂涤荡数千年专制之瑕秽而建立民国，此则吾父老昆弟大有造于国者也。”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后持续二三十年的时间。其中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时光是在广州酝酿准备的。孙中山一生为实现民主共和奔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追求。一直到晚年，孙中山对广州仍寄予厚望。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上发表演讲：“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重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要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

### | 第三章 |

## 黄埔军校： 影响一个国家和时代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一所新型的陆军军官学校。虽然校名曾多次变更，但由于校址设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洲岛，故通称黄埔军校。

几十年来，这个名字一直震动着中国人的心灵。人们敬仰她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黄埔精神，佩服她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她所培养的毕业生影响了中国的命运。鉴于黄埔军校在中国军事史上的显赫地位以及她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人将她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相提并论，并称世界著名的四大军校。

### 将帅摇篮“黄埔系”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她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和政治人才，被誉为“将帅的摇篮”。徐平《兴衰荣辱“黄埔系”》一文说：“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军事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

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人民解放军中获少将以上军衔的有40余人，其中上将以上有徐向前、林彪、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周士第、陈明仁、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郭天民等；国民党军方面，任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6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黄杰、桂永清、郑洞国、邱清泉、王耀武、胡璉、廖耀湘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4—1927年），黄埔共招生6期，加上武汉分校，学生有近万人之多。这些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中的骨干将领，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而光耀史册。从全国各地选派到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绝大多数不辱使命，不负组织厚望，刻苦学习军事知识，从事军事实践，为后来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准备了干部资源，积蓄了军事力量。许多党的优秀分子从黄埔毕业后，即被分派各地充任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参加了南昌起义。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统计，参加南昌起义的黄埔教职员有20人，参加南昌起义的黄埔学员共有209人，其中一期生有43人，二期生21人，三期生42人，四期生88人，五期生9人，六期生6人。同时，参加南昌起义的黄埔教职员和学员都在起义军中担任着重要职务。如黄埔军校教官中，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的核心机构——中共前敌委员会中担任书记，是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者。

## 黄埔精神：为主义英勇奋斗

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她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采取了全新的教育理念。首先，黄埔军校是为革命目的而创办的。她以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为宗旨。一次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借人之力量干革命事业终不可靠，在建军问题上非另谋出路不可。他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才有出路。其次，黄埔军校实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开中国新式军事教育的先河。黄埔军校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教

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革命精神。孙中山为黄埔军校规定的教学方针是“军事与政治并重，人格与技能训练共进”。这是她与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再次，黄埔军校还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制度，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孙中山希望借此培养出有主义信仰、有军事知识、有实战能力的革命军骨干。黄埔军校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打破地域观念、宣传团结精神和国家观念。黄埔第一期毕业生654人，来自黑龙江、吉林等22个省。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派系林立、民族国家意识缺乏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对树立统一、完整的大中国意识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何为黄埔精神？简而言之，是为主义英勇奋斗的精神，为国家一心一意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顾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和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正是凭借这种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一批批黄埔人前仆后继，不断传承、不断开拓。

在大革命时期，黄埔人并肩战斗，参加了平定商团军、两次东征、消灭杨刘军、北伐等战争，并均以全胜的纪录载入史册。

在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学员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共同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取得平型关之战、台儿庄之战、反“扫荡”作战、1939年冬季战略性反攻、远征军入缅作战、长沙战役以及1945年大反攻等的胜利。

从这种意义上说，黄埔军校及其培养的将领，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 第四章 |

## 红色摇篮： 新的开辟与探索

### 中共“三大”与大革命热潮

春天的恤孤院路，绿意盎然，盛开的木棉花像一片红色祥云。一座座小洋楼古朴宁静，是闹市中一处难得的静地，但这里的中共“三大”旧址，却是宁静乐章中的激越与豪情之地。

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来广州，同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的40名代表集聚广州，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河，掀起了大革命的波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三大”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这是有其客观原因和历史必然性的。众所周知，“一大”“二大”都是上海召开的，“三大”是在党的诞生地之外的城市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特别是经历“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北

方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加大了社会控制力度，而南方特别是广州的革命情绪却不断滋长，各种革命力量云集，正在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策源地。

在“三大”召开前一年，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在广州东园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青团前身）正式成立。当时出席大会的“团一大”代表有25人，代表15个地方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会议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等六项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的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三大”上，陈独秀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份3500字的报告中，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二大”以来近一年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意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批评整个党的工作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指出“没有组织”“缺乏知识”“观点各不相同”等；一方面是对包括陈独秀本人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由于陈独秀在报告中带头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次会议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最后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等决议案。

出席“三大”的代表有40人，他们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全体共产党员要不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一种意见以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马林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还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

另一种意见以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淆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最后21票赞同，16票反对，3票弃权。按照“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这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共产党的队伍在3年内增长60倍，党员由400余人猛增到5.7万余人。在工农运动上，出现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潮。实践证明，“三大”确立的党内合作形式是正确的，没有“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决策，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三大”会址在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直到1971年，当时参加“三大”的一位代表根据回忆才找到了当年的标志物，最后才确认了会址。由于建筑材料、风格等细节已无法考证，2006年相关决策部门遂放弃了“原址重建”方案，而是在遗址旁修建了如今的现代化陈列馆。当年的墙基和地板所在地，现在整修后上面都用玻璃镶嵌起来，供游人观看。2006年7月1日，“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来此参观学习，缅怀先烈，接受精神上的革命洗礼。

## 第一次携手：国共合作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见证地。至今，国民党“一大”旧址静静地坐落于广州市文明路215号。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肃穆的大厅里主席台中央挂着孙中山像，其下是一排排整齐的黑色木椅，背面贴着与会代表的名字，依稀可见当时开会的情景。

国民党成立之初，组织涣散。1922年，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与孙中山接触，希望推动国共合作，以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中国国

民革命的发展。同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1923年，“三大”之后，中共党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三大”决议》）。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合作中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治党”。比较了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孙中山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因此，国民党“一大”从会议的形式到规程都仿照俄共（布）。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里，中共党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席位。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民党最高权力中心的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中共党员谭平山也成为其中一员。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年轻的共产党开始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建立其分部，大量年轻有为的学生、工人等优秀的革命者加入国民党。广州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赤都”。

在这里，工农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国共两党领导的“沙面罢工”使全国的工人运动走出了“二七惨案”的低谷，两党组织的农民协会将广东21万农民引入了组织，共同倡导成立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让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新阶段……

名震天下的黄埔军校更见证了当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峥嵘岁月。随着大量军事人才的培养，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创立，在成立的八个国民革命军中，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全为共产党人。周恩来也被安排在蒋介石任军长的第一军任党代表，叶挺还出任独立团团长直接指挥军队。

年轻的黄埔军校学生和国民革命军用东征、北伐的胜利证明了自己的成熟，年轻的共产党人也通过自己的实践真切感受到被动员起来的工农力

量的强大。

1927年的国民党已由1923年前的广东一隅发展到饮马长江。就在国民革命将要取得成功的时候，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历史总是令人扼腕。但从1923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却在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它使得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党员的数量成倍增加，党的理念得到宣传，大批革命精英加入共产党。同时，这还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按照列宁走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模式进行革命，而是采取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致力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联系实际，坚持中国特色。

## 农讲所：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从广州地铁1号线农讲所站出来，走到相邻大约50米的中山四路42号，可以看到一组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的建筑群。这里原是番禺学宫，清代用于培养秀才，后来却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摇篮。现在门楼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横匾。走进农讲所纪念馆，站在曾作为课堂的大成殿内，可以想象当年300多名学员一起上课的热闹场景。

农讲所最初选址并不是番禺学宫，而是在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或东皋大道1号。由于第六届学员人数较多，1926年移到此处举办。农讲所的历任负责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人均为共产党人。彭湃是首倡者。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讲所开学，当届共招生327人，学员来自近20个省。农讲所注重将系统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第六届理论课程授课13周，军事训练时间达到10周，并且到农村参加农民运动实习也是必修课之一。根据第六届农讲所课表，25门课程把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革命理论作为主课，涵盖农民运动的理论及方法、中国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宣传训练等内容。

农讲所实行军事化管理，把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然后分2个中队、6个区队。第六届学员郭绍仪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天清晨，军号一响，学员们迅速起床。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进行演习，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还到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这些学员后来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或者回到原籍，发动、领导农民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

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队伍十分强大，除了毛泽东，还有萧楚女、彭湃、周恩来、阮啸仙、恽代英、赵自选等。毛泽东主持所务工作的同时，还负责向学员们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共23个学时，是所有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广州农讲所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据不完全统计，1925—1928年，广东、福建、江西以及两湖地区等，先后举办了40多个农讲所或农训班。这些农讲所和农训班，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运动骨干，有力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不断蓬勃发展。

## 广州起义：“东方的巴黎公社”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等人在广州发动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东省立公安局，12日下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此宣布成立。广州起义失败后苏维埃政府随即废止。虽然广州苏维埃政府仅存三天，却是中国大城市里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准备再行北伐。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要求除了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暴动。

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

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2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系由大革命时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编的，在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国民革命后，武汉分校的学生们险些被何键解除武装，叶剑英得知，便通过张发奎，把分校学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

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前夕，由于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人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

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四军第十二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



广州起义纪念碑

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四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幢寺第五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第七十八团，驻东江地区的第二十五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一师第一、第二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

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纽曼拒绝采纳叶挺“保存实力，将起义军民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的正确建议，起义军和工农群众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乘车督战，途中遭敌袭击阵亡。

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徐向前等一千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

###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

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决心跟共产党走，她改名“铁军”。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汪精卫的官邸“葵园”门前集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

周文雍被捕后，中共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陈铁军派人把关押周文雍的地点搞清楚后，又让人设法告诉周文雍不饮茶水，以引起“高烧”，说是患了伤寒；再发动狱中难友起哄，迫使敌人把周文雍从监狱送进医院；随后组织便衣武装，把周文雍从医院救出。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他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心底的爱情公之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的婚礼。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年轻

的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2009年9月14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 商贸之城

谁统治了供应链，谁就统治了世界。

——（美）帕拉格·康纳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在两千多年前就通过商贸活动与世界连接。西汉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南亚诸国进行通商贸易。唐代，广州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长的海路航线“广州通夷海道”的起点。到13世纪，广州已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中国对外贸易，在唐宋时期都是由市舶司来负责管理。明清时期，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明末出现了十三行，贸易转向商业资本经营阶段。梁廷枏《粤海关志》云：“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桅。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船长曰大班，次日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广东开放对澳门的陆路贸易。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立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事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为防止西方海上殖民势力北犯危及国防，清政府宣布撤销闽、浙、江三关，仅留广州一口贸易，使广州十三行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一口通商”的特殊时期。此后的八十五年间，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聚集广州运往世界各地，开启了广州经济的兴旺时期，也使得广州在18世纪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之都。

# 商都 | 千年

——世界贸易版图上的独特地标 Canton

| 第一章 |

## 商业文明： 独领风骚

### 独一无二的滨海商都

纵观中外，历史超过两千年、一直是纯粹商都、始终绵延发展、从未衰落、今天仍繁盛非常、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超大型滨海商都，世界上或许只有广州一城。

自西方看来，其主要滨海商都，要么开发早如今已衰落或者重要性下降，如威尼斯、鹿特丹等，要么开发较晚而衰落也早，如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等。历千年至今仍繁华的滨海商都大概有伦敦、马赛、汉堡、里斯本、巴塞罗那等，但逾千余年而至今未衰的滨海商都恐怕只有伦敦和里斯本，只不过伦敦和里斯本并非纯粹商都，同时也是政治中心。

自东方来看，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滨海商都，如元朝“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在明清时期已经未能持续。今天繁盛的滨海商都，多半开发较晚，有的历史虽极久远，但作为港市或商都大多在近代，如香港和上海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被迫割让或开放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天津

则是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被迫开放后发展起来的；台湾第一大港高雄的开发则是在20世纪初。

其他国家历史较为久远的滨海商都，还有日本的大阪、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但它们主要是政都（大阪多次成为日本古政都），而非纯粹商都。广州历史上虽然曾作为偏安政权的政治中心，但时间都很短暂，其底色还是商都。基于此，广州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滨海商都了。

### 历史悠久的重商传统

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广州是千年不衰的通商港口城市。一直拥抱着以商业文明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从汉代就有了海上贸易，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是通达波斯湾和东非等国。沿海上丝绸之路远来的商舶帆影与海风相伴，为这座城市带来文明的滋养。

广州拥有最早开放的港口，很早与海外保持商贸往来。海上对外贸易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

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南越国时期更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出土遗物以及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番禺（今广州）作为主要的贸易港，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史籍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成为南北商贸中心。“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即现在的广州。秦汉以后，岭南的海外贸易不断得到

发展。到唐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唐政府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当时的广州，俨然是一个国际商贸中心，外国商人云集。黄巢起义时，流寓广州的波斯大食人共十二万之多。梁启超感叹当时的广州，“交通之盛，不让今香港，而外人居留之多，今日举国无能与京矣。”

宋代，广州与五十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元代，广州更是与14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明代万历初年，即1573年，为了适应岭南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明政府在广州设立三十六行，改变由官府治理广州商品贸易的传统，由民间性质的组织三十六行管理，负责招商等事宜。三十六行到清朝就演变成有名的十三行，他们每年冬夏两季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即是今天广交会的前身。

清代，岭南商品经济极其繁荣，甚至出现中外各种货币通用的局面“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曰北流锭，曰镪，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墨西哥。又有鬼头之名，盖外人往往以其国王之像印于钱面也，今民间呼为番面钱，以西像如佛，故又号佛番。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胡朴安《中国风俗》）这种在一个地区使用多种外国货币的现象，在旧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岭南商贸的国际性。

明清一度闭关时，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商品交易中心。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认为：“粤省与外人通商最早，又最盛，地又殷富，故其生活程度，冠于各省，而省城地方，则殆与欧美相仿佛，较上海且倍之。”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统计了过去一千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包括比尔·盖茨。中国有6人入选，前5位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乾隆的宠臣和珅、民国宋子文。第6位是广州十三

行商伍秉鉴，他在1834年以2600万两银圆家产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被认为是粤商的代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广州作为岭南商业文化的中心，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的重商传统。广州商业在中华文明的范围内长期独领风骚，必有其优良的商业文化传统。

## 从重商意识到商道精神

千年商都有自己的历史，更有自己的文化。

一年又一年来自海洋那腥咸温暖的季风吹过，迎来送往的不仅是奇珍异宝、四海信物，还有文明的交相辉映。世界几大文明都是通过海洋在广州港口登陆，而大海、通商是千年商都广州的灵魂，商贸文化成为广州深植骨髓的DNA。

自古粤商就与浙商、鄂商、豫商、徽商齐名，今则京沪粤商纵横于天下。尤其是海外经商，现代以前几乎由粤人一统天下，许多人海外“往蕃”而成“蕃客”，这也是广州特有的。说广州人是“商人的后代”，可能绝对了些，但很传神。

20世纪80年代爆发于广州的“全民皆商”壮举使全国为之惊愕，人们将此归因于重商意识。于是许多逸闻趣话流传开来。比如，没有广州人不敢赚的钱；广州人发现商机的眼睛比谁都亮。广州女人爱做生意也成为有力佐证。有人对广州三家交易大厅进行调查，结果女股民竟占78.6%。于是有这样的描写：成千张粉脸朝着一个方向，“飘红”和“飞绿”不时引发一阵尖叫和叹息。开商铺是广州人最习惯的方式，算是小菜一碟。因此广州私营和个体经济最为发达。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对饱受贱商传统浸润的内地人来说，是很难跨越的一道槛。



外销画上的各国贸易船只

然而，重商在广州不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精神，是在岭南这一地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精神特质。广州人敢于冲破一个个传统禁区，“用好政策，用足政策”，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商道精神。

重商作为文化精神，还在于它渗透到广州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是广州最早形成市民社会的动因，而不只是与商人相关联。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注重实务、实利和世俗生活，讲求感官享受而淡化儒家和传统理念。

满街皆商的“西关商廊”展现出岭南最有代表性的市井风情画。它从明代开始就是集衣、食、用、玩、购物、交易为一体的老商业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行街”、购物和做生意是广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感受到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市民生活及岭南社会的各个层面。

商业和消费文化强力催生了广州经济奇迹，岭南商业文化和平民文化以当代中国强势的地域文化大举北上，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互相补充与砥砺，构成三足鼎立之势。

重商文化不仅渗透于市民生活中，还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平民意识、平等观念和市民社会最早在广州形成，近代商业文明使广州最先成为西方文化的登陆点，由此引发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

重商性和平民性是岭南文化特质中起主导作用的两个内涵，而重商性是基础，它们共同造就了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性、实用性心态和观念文化中的开放性、冒险性、求变的动态心理和兼容的胸怀。

| 第二章 |

## 广州十三行： 近代国际商贸中心

### “一口通商”成就世界商都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是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描述当时广州商贸的繁华景象。

十三行并不是只有十三家洋行。广东布政使官达在雍正五年（1727年）调查洋行贸易情况的报告中说：“查广东旧有洋货行，名曰十三行，其实有四五十家。”据统计，自康熙五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1720—1839）一百多年间，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年）及道光十七年（1837年）两年洋行之数恰为十三家，其他各年一般在十三家以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多至二十六家。

十三行实际上是商办洋行，以承担保税保证的外贸功能。乾隆至道光八十多年中，十三行实为中国的中西贸易中心，亦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场所。林立的十三行洋商夷馆，成为当时广州最突出的人文景观。

据1832年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所做的文字简图显示的各个商

馆分布状态，从西面的西濠（东南小溪）起，分别是小溪行（怡和行）、荷兰行、英国行（宝和行）、周周行（丰泰行）、老英行（隆顺行）、瑞典行（瑞行）、帝国行（孖鹰行）、宝顺行、美洲行（广元行）、明官行（中和行）、法兰西行、西班牙行、丹麦行（德兴行）等十三家洋行，中间纵贯猪巷（也称新荳栏）和中国街（也称靖远街）两条街道。在这段江水较深的码头区，集中了去往澳门、香港的火轮，通往恩平、江村、石井渡埗头的也在此。所以清代的十三行区范围北以十三行街为界，南以珠江岸为界，东以西濠为界，西以联兴街为界，四至整然。

一口通商之后，广州外贸迅速发展，商货俱集，海舶辐辏，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当时有人记载广州贸易的繁盛情景：“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汇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于此城。”还有诗为证：“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粤海关认为，广州外贸的发展需要有由政府选任的“总商”来总理外贸事务，建议政府“于各行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公正者，飭令总理洋行事务，率众商与夷人交易”，因此公行开始实行“总商制”。当时充任总理的有伍浩官、卢茂官两家。这意味着，政府不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事宜，只负责任免行商，设立海关收税及缉私等事宜。

广州进出口贸易中，除了一些手工业品，如扇、刺绣、皮靴、瓷器和象牙等，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可允许外商与散商交易外，其他大宗进出口商品完全由行商垄断经营，且一切进出口税饷亦由行商负责缴纳。

西方各国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明朝正德、万历、崇祯年间就与中国取得了贸易联系。

清代广州的十三行贸易在沿用明代已开通的印度洋航线、南洋航线、日本航线、欧洲航线和拉丁美洲航线之外，还开辟了三条航线：广州—好望角—北美航线，广州—大洋洲航线，广州—俄罗斯航线。1637年，英国人威德尔率领的商船首次来华，17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对东方国家进行殖民侵略活动的机构，享有经营中英贸易的专利权，独占英国对华贸易，加上其在印度建立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成为对华贸易中居于首位、最具实力的西方国家。

中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对象也是英国，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统计，鸦片战争前的33年里，经由英籍商船运出的茶叶多达25万担，占广州出口量的75%—80%。19世纪，英国社会从上层到中下层，都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对中国多地的茶叶需求量增大。而在生丝出口上，19世纪初广州每年出口量在1100—1800担之间，其中对英出口部分占95%以上。此外19世纪初，土布出口在对英出口中占很大份额。

对美贸易方面，美国在18世纪70年代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但须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中介，以英国为转口地点。当时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北美土特产人参，而中国输入北美的商品则以茶叶为主，中国茶叶也影响了北美人的生活饮用方式。

1883年，经过八年独立战争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式独立，宣布建国。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涉重洋到达广州黄埔港，完成了首次从纽约到广州的航行，开拓了中美之间的联系，建立了直接贸易和文化交流。此后，美国各主要港口，如纽约、波士顿、撒冷、费城、普洛维德斯等，都开始与广州直接通航贸易，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

1784—1841年的五十八年间，美国驶来广州的商船有1271艘之多。这一时期，美国在广州的进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渐达到20%左右。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贸易国家。美国的对华贸易不是单纯的直线贸

易，还带有贩运贸易的显著特征。以广州为中心，美国商船在返程途中一般会将商品辗转贩运至欧洲、东南亚等地沿途销售，在沿途港口以获得厚利为原则进行辗转贩卖。同样，美国商船运来中国的货物也不完全来自美国本土。

由此可见，在美国与广州的贸易航线中，广州真正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商港，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坐标。

广州十三行在中国对外贸易、沟通中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趋势。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十三行制度也被废止。但仍有行商继续经营茶丝等业务，只是已经不是原来十三行的性质了。

### “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今天，当我们站在国际化的角度回望18、19世纪的广州，仿佛看到一个先行的国际商贸中心。两广总督阮元在《唐荔园》一诗中这样描述广州外宾往来、精英云集的情景：“方今承平岭海盛，夷宾十倍唐昆仑。贡献屏绝尤物贱，百蛮共仰朝廷尊。节使公余但缓带，荔湾一任开园垣。士民竞赴半塘社，家家画舫倾芳樽。”

交易的是商品，交流的却不仅如此。广州在鸦片战争以前“东学西渐”之风最盛，是中西文化交流最密切、最全面的时期。

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历程中遥遥领先，曾以“中学西传”著称于世；但是由于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渐趋落后，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汇过程中又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趋势。在“黄飞鸿”系列电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广佛、香港等地中医与西医、国货与洋货、汉语与西语碰撞交融的情节，这并非完全虚构。由于大

半个世纪的世界商贸重镇地位，广州已成了19世纪中西方经济文化碰撞交流的中心。

以医学为例，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人将接种牛痘的技术带至广州，由行商郑崇谦翻译出版的《种痘奇书》，成为我国最早译出的西方种痘术的医学著作。郑崇谦还招募邱熹、梁辉、谭国等多人学习接种牛痘的方法。经过几位行商多年的努力，终于打破了国人的禁忌，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种牛痘的医术。邱熹还根据自己接种牛痘的经验撰写了《引痘略》。接种牛痘技术后来得到北京医生的争相学习，逐渐推广到全国。此外，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得到部分行商的支持，在广州创办了一所“眼科医局”，成为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和广州人学习西医的源头。

1815年，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医学硕士合信，到十三行旁的沙基金利埠开设惠爱医局，相继撰写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论》等医学书。

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国防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广东的一些洋商也捐资制造洋枪、洋火药，修建炮台，同时伍敦元、潘绍光、潘仕成等行商还购买、仿制大批英美兵船，仿制破坏兵船的水雷，希望改变广东水师的装备，增强作战能力。

魏源《海国图志》“议守”之策中写道：“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并对广东行商仿制的外国战船大加称许。行商潘世荣不仅培养工匠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蒸汽轮船），还在鸦片战争中帮助中国军队擒斩入侵英军。十三行的爱国行商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抵御外侮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西方在科技、军事、制造、天文、物理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影响了粤人开放、新奇、实用的观念，著名学者朱次琦、陈澧倡导的经世致用，维

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等，无不从十三行的中西贸易中得到滋养，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发生了积极影响。

## 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首富”集群

十三行制度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商业精英，其中许多是“家族企业”，最有实力的莫过于嘉庆年间的潘、卢、伍、叶四大家。同文行及同孚行的潘家、怡和行的伍家，更是繁盛数十年的近代巨贾。据说潘家在1820年的财产高达1000万银圆，1840年末则达到2000万银圆；伍家则在1834年自己估值约有2600万银圆的财产。当时，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世界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据法国杂志社记述，同文行的创始人潘振承的财产超过一万万法郎，“富于一国王之地产”。潘振承早年家贫，习商贾，青年时期从福建来到广州，从事海外贸易。因为饶有眼光，独具胆略，生意越做越大。他曾三次往返吕宋（菲律宾），并于1770年到过瑞典，贩卖生丝、茶叶，积有余资。后在广州为十三行陈姓行商做事，深受信任，被委以全权。在陈姓行商获利归里之后，潘振承便开设了同文行，承当行商。

从乾隆九年（1744年）开设，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九年里，同文行商务兴盛，在广州中西贸易中居于显要地位。潘振承做生意的对象很广泛，除了与英国、法国、瑞典的商人往来外，还一直与马尼拉有生意往来。

潘振承多财善贾，精明过人，在中西贸易中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当时行商最主要的交易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潘振承几乎垄断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丝贸易。因在价格和质量上压过竞争对手，同文行每年都有1000—2000担生丝交给东印度公司。为了完成合约，潘振承派儿子到内地采购生丝。乾隆四十年（1775年），同文行交售生丝1000担，价值276250两。

潘振承还制定了同文行的信用制度，对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文行退赔的废茶达到1402箱，价值超过10000银圆。由此，退赔废茶在行商中成为通行惯例。

1770年，潘振承协助英国东印度公司促成中国政府取消了中国商人的“公行”组织，1780年又协助中国政府处理两位破产行商张天球（裕源行）、颜时瑛（泰和行）的债务，成为中外公认的洋商领袖，在官方文书中被称为“商总”或“首名商人”，“夷人到粤必先见潘启官”。

鸦片战争后，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被打破，十三行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也被取消。英国人却将一位行商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托萨德名人蜡像馆，他便是世界首富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祖籍福建武夷山，是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的第二子，小名浩官。嘉庆六年（1801年）兄长伍秉钧去世后，伍秉鉴接替了怡和行的业务。当时，怡和行的贸易额在行商中居第三位。伍秉鉴接手后，伍家的家业得到巨大扩张，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怡和行已在行商中排第二，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设立总商，伍秉鉴成为总商之首。伍秉鉴在四子伍受昌接手怡和行后还继续掌控着怡和行和行商组织公行的实权。伍受昌去世后，其五子伍崇曜接任行商和总商。经过伍家三代人的经营，至道光十四年（1834），伍秉鉴宣称拥有资产2600万银圆，是富甲天下的豪商。

行商世家伍秉鉴、伍崇曜父子均是长袖善舞、善于经营的商业人才。同治《南海县续志》载，伍秉鉴“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资利枢机者数十年”。英商则称他为行商中最精明、有用的人，美商在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也愿意同他做生意，因为他在时间和商品质量上都有保证。

在行商竞争倾轧、官府盘剥勒索、洋商实力强大的复杂关系中，伍秉鉴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好各方关系，保持伍家总商地位不坠，与他善于货

殖、放债、理财和精通人情世故，有很大关系。

伍家父子既是封建官商，又是依靠西方商人贸易发财致富的“食夷利者”。他们同外商联系最紧，在英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伍秉鉴还是英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

十三行在世界商贸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瑞典、加拿大、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商业组织考察团和研究机构曾来广州考察十三行历史，或拍摄纪录片。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美中贸易博物馆、日本国立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以及丹麦、瑞典、荷兰等国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均收藏有大量反映19世纪广州十三行历史的外销画和相关史料。

| 第三章 |

## “中国第一展”： 广交会

### 广交会——连接世界与中国

创办于1957年春季的广州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2007年4月第101届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单一出口平台变为进出口双向交易平台。

广交会在广州四易其址，历经海珠广场、流花路、琶洲三大主要时期。2014年6月19日，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四期扩建后，展览面积达50万平方米，整个琶洲地区会展面积达66万平方米，规模世界第一。

1952年至1957年，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化建设中，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很难得到。

为了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1956年11月，长达两个月的中国出口商

品展览会在广州举行。活动汇集了当年近万种我国主要出口商品，各个交易团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千多客商达成了5000万美元的交易额。《人民日报》对此发表社论，阐述了展览会的重要意义，这成了创办广交会的预备会。1957年，中央决定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应运而生，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广交会也获得了“中国第一展”的美誉。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广交会是中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最主要通道。1957年首届广交会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3位客商到会，出口成交额达1754万美元。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当年春交会到会美商有42人，这是中美贸易中断二十多年后美商首次到会。1980年广交会开始了对台贸易。1983年中外合资企业首次到会。1984—1985年广交会分别获得意大利“国际墨丘利金奖”、西班牙“国际贸易奖”。

广交会是公认的中国会展业长子，即便是在“文革”时期，广交会出



广交会琶洲展馆

口成交量每届虽有升有降，但仍保持了总体增长的趋势，撑起了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广交会逐渐成为万国博览交易会，参展国家越来越多，国际化水平也越来越高。1999年获自营进出口权的私营企业首次亮相广交会；2001年春交会到会客商超过11万人，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2002年，从第91届开始，改为一届两期，每期六天，两期将间隔四日举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广交会展馆面积不断扩大，参展商、采购商到会人数和成交量不断增长。2006年4月的第99届广交会，来自211个国家的近20万名客商到会，出口成交330.02亿美元，创下广交会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2006年10月开幕的第100届广交会更是邀请客商30多万名。广交会见证了“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中国商业文明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2009年春季的第105届广交会取消了多年来针对内地采购商的“进场”禁令，首次开设了“出口转内销”专场，当年秋季的第106届广交会又首次设立了国内采购中心，帮助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性价比比较高，吸引了大批的参展商。

广交会官方的网站数据显示，广交会的全年总成交额在1989年第一次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2016年的总成交额是600亿美元，是28年前的6倍。随着外贸企业日常业务渠道的拓宽与畅通，广交会的作用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成交数据显现“疲态”，总成交额几乎连年处于负增长，2015年的总成交额实际上更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尽管2015年中国整体的进出口贸易额双双下降，但中国仍然保持住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面对国内地区性、专业性会展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横扫中国的各类电子商务门户网站所带来的竞争，广交会正努力寻求转型，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向贸易强国进阶。

## 中国推动世界经济最持久的引擎

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层次最高的国家级展会，在提升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形象方面作用巨大，显示了其积极的效应。

国际会展业的经验表明，展会收入与其所带来的相关行业增加值之比为1:10。因此，广交会对会展所在地广州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带动效应，这包括带旺食住行等消费、刺激相关行业迅猛发展等。根据专家对第99届广交会参展商等数据测算，广交会每年至少可为广州创收117亿元。正因为如此，广交会成为广州金灿灿的名片。广东省近水楼台先得月，基本上每年都是广交会成交额最大的省份。以第100届广交会为例，从省市成交情况看，排名前三位的广东、浙江和江苏分别成交88.5亿美元、48.5亿美元和33.6亿美元，三省共占总成交额的50.1%，而广东省独占25.98%。巨大的出口量带动了广东省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活跃。

第89届广交会，美国沃尔玛集团副总裁亲自在广交会举行论坛，这届广交会还邀请了联合国采购团来广交会参观和考察。除了买家数量多，广交会的买家质量高也是表现其国际化水准的重要因素。广交会初期，受邀请和到会客商以中国的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转口贸易客商为主，所属国家和地区也相对集中。后来，全球许多知名的连锁店均到广交会采购。以第91届广交会为例，国际著名大型百货连锁企业有2556家，国外有1799家，本土有757家。饮誉全球的大型连锁店如美国的沃尔玛、西尔斯，法国家乐福，德国Metro（麦德龙），瑞典H&M以及中国香港的百佳等都与广交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与国内企业相比，跨国投资企业有更强的出口能力，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在广交会的外贸成交额中，绝大部分是由大型跨国企业来实现的。1985年广交会外资企业涉及的出口仅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1%，

30年来，该比例一直在稳步提高，到2004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已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7%，进口额占到全国进口额的58%。据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为8317亿美元，占总额的57.3%，比2004年增长25.4%。广交会将众多的跨国公司吸引到了一起，为我国的外贸事业拓宽渠道，开拓市场。2016年，第12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境外采购商到会数量恢复性增长，成交额呈初步回稳态势。

2018年5月，第123届广交会成功举办，本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1891.97亿元人民币（折合300.8亿美元），比2017年春季广交会增长3.1%，为4年来春交会最高水平。来自各大洲的采购商人数全面增长。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成交96.7亿美元，增长8.8%，占总成交额的32.2%。品牌展区成交良好，共成交100.7亿美元，占总成交额的33.5%。

在中国对外贸易、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中的引擎作用下，广交会得到了历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指导，周恩来从第一届开始多次视察广交会举办情况；1973年春天，第33届广交会刚闭幕，当时刚刚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不久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也“秘密”视察了广交会；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历届总理均曾出席广交会开幕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届国家主席每年都会给广交会发来贺电，彰显出广交会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会展”的重要地位。

广交会也得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重视。2002年4月18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索科维茨率领近百名“重量级”企业代表团空降广州，出现在广交会会场。这一批特殊的客商正是应朱镕基总理在中俄总理第六次定期会晤之邀而来的。时任美国副总统布什、英国前首相希思等都曾亲临广交会。

在全球贸易低迷的大环境下，广交会在外贸领域积极引进竞争力较强的品牌企业、创新企业。近年来，加快技术创新，尤其是加大新技术产品

的研发力度，已经成为广交会参展商转型升级、应对挑战的共识。在第120届广交会现场，以可穿戴设备、VR、新能源为代表的创新产品深受采购商热捧。而传统产业显然也加大了研发创新力度，推出了不少高端化、智能化的升级产品，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如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大件家电，已经迈入智能时代，而豆腐块大小的便携式迷你熨斗、手持型洗衣机等创意家电也让采购商大叹“来广交会真是长见识”。从1957年至今，广交会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它给中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带来辉煌的昨天，如今，广交会又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新起点。

## 专业市场：广州打喷嚏，全国都感冒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州以开放促创新、促发展，已成为现代南中国重要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贸易中心以及国际资本全球布局的重要节点，正从“千年商都”向“现代商都”“网络商都”演变。

谈论这座千年商都的沉浮与枯荣，一定绕不开她生猛鲜活的专业市场。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遍布广州城大小角落的专业市场，就是除了广交会之外，最为国人熟知的商业符号，广州也因此夯实了其“商在广州”的千年美誉。

有论者说，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因政策因素与地缘优势的叠加，广州得天独厚。代表着商贸原始形态的批发市场，最早在这里兴起和发展，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广货”曾经是内地几代人的火热记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广州批发至广阔内地市场的商品，代表着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水准，刺激着中国人的幸福感不断提高。而在这样潜移默化的变革中，广州专业市场、专业商业街功不可没。

多年来，广州已形成了服装、皮革、化妆品、牛仔服、茶叶等众多商

品的全国集散地，这些辐射全国的“广州价格”牢牢奠定了广州全国商贸一哥的地位。如今，遍布在广州城里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已达1100家，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商品的巨大集散地之一。有专家曾这样描述广州专业市场的繁荣：“站西路鞋城的鞋业销量约占全国内销和外销总量的70%，打下了‘全球十双鞋，广东有其三’的江山；中大布匹市场有‘全球面料看广东，广东面料看中大’的美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箱包，有一半出自‘桂花岗’和‘梓元岗’；流花服饰商圈交易量占全国的35%；一德路海味干果批发市场据说是国内最大的海味干果批发集散地，占全国海味干果交易量的70%……”在业界，甚至有“广州专业市场打一个喷嚏，全国都得感冒”的说法。

掀起广州传统商业的“互联网+”发展潮流，支持大型百货企业运用O2O移动互联商业模式开展贸易，已经成为今日广州专业市场的新形态。在广州的几大商圈甚至遍布商业街区的店铺，网络零售平台和生活服务业综合消费平台已经无所不在，85%以上的品牌专卖店开展了网络零售。木材、茶叶、鞋业、皮革皮具等专业市场也逐渐实现了电子商务转型升级，塑料、钢铁、化工等生产资料市场建立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广东塑料价格指数成为全国行业价格风向标。

广州的产业集群优势突出，许多中小企业从10年前便开始大力发展垂直电商平台，促进实体企业供应链一体化电子商务应用，构建采、产、供协同电子商务信息平台，促进家具、橱柜等行业应用电子商务开展个性化定制生产，“广州制造”延续了数十年高品质的良好声誉。

近年来，广州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2016年出台新版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目录，精简行政审批许可备案事项176项。2016年全年为企业减负超过7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比全国、广东省平均水平分别低2.9元和1.9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上线



繁盛的广州百货商场一角

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2.0版，涵盖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外汇、税务、港务等21个部门的相关业务。减轻企业负担，对使用“单一窗口”的上线企业原需支付的海关、检验检疫申报费用给予免除，全面组织实施免除查验没有问题的外贸企业的吊装、移位、仓储费用试点工作。在全国60个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的城市中，广州市业务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广州建设网络商都，不但有力促进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广州将培育一批电子商务产业园区、跨境电商体验店、海外仓、交易平台、物流供应链企业、支付服务企业、金融服务企业，推动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创新发展，这将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电子商务企业带来无限商机。

## 线下的千年商都，线上的超级入口

在商品交易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广州是人流、物流汇聚的线下中心。当知识与技术的流动成为推进全球化的新力量，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和信息交换成为常态。作为传统贸易集散地，广州能否从线下的中心转为线上的

中心？

我们都知道，集聚商流、人流、信息流，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商业的核心气质。前不久，国家邮政局公布的2017年快递行业数据显示，广州快递业务量稳居全国第一，达到39.33亿件。按照2017年广州市常住人口1404.35万人计算，人均收发快递量达280件。

这个数据，体现着千年商都的线下实力。广州靠近珠三角的制造业基地，有着强大的物流枢纽能力。电商巨头在华南地区的仓库、货物分拣中心一般都在广州或周边，这是由物流成本决定的，也是由广州的传统商贸优势决定的。

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座城市的电商企业集聚程度，数以万计的中小型电商企业活跃在广州。在线上，虽然没有“BAT”这样的超级互联网巨头，广州却仍然是线上的超级入口。

作为中国三大通信枢纽、互联网交换中心和互联网国际出入口之一，广州互联国际出口带宽超2000G，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互联网出口，国际局电路可直达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实际上，作为中国互联网发达城市，广州从未与互联网产业脱节过，每当互联网产业的新浪潮扑面而来，广州总有代表性的领军企业快速崛起。

从163邮箱开始，20年前的广州就已经走在互联网时代的前列。广州在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中诞生了网易、21cn等公司，在门户时代和北京遥相呼应。在移动互联时代，广州也拥有微信、唯品会、UC、YY这样的互联网明星企业。截至2017年底，广州市高新企业达到8700家，其中电子信息类的企业占到3699家。

广州天河的科韵路，被人们称为“小游戏帝国”，3.2平方公里创造了天河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的半壁江山，高达近500亿元。以网易为龙头，

天河聚集了5000多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仅次于北京中关村，位居全国第二。

2008年，人们说起电子商务大多只会提到阿里巴巴、京东，很少会关注到广州的企业。彼时，在广州，沈亚和洪晓波迈出创业的第一步，唯品会宣告成立。目前，唯品会的注册会员数超3亿，合作品牌超过20000个。前不久，腾讯、京东8.63亿美元“入股”唯品会，中国电商产业格局也有了新的变数。唯品会的新总部大楼，将坐落在琶洲，微信、阿里巴巴、小米、科大讯飞都将是沈亚们的邻居。

广交会之后，互联网的兴起对广州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就在广交会展馆所在的琶洲，腾讯、唯品会、小米、国美等11家企业已开展实质性业务。根据规划，未来这里将集聚近十万高端产业人才，崛起千亿级互联网和创新产业集群。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与广交会高度重叠，一个线上、一个线下，这是广州这个千年商都的重新出发和再转型。

广州有着商贸中心所必需的一流的地理优势和硬件基础，包括空港、海港、铁路、陆路等，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入口者得天下”。知识经济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流正在变得比资金流和物流更重要，变得像土地、设备、技术那样成为人们组织生产的必备，广州能否像其过去一千年辉煌中所作出的那样，在新的发展潮流中总能塑造新的竞争力？

有人说，杭州出现马云也许是偶然，但是有着千年商业基因的广州，丁磊、张小龙们的不断涌现也许是必然。IDG资本董事长熊晓鸽曾大胆预言——“下一个‘BAT’可能出现在广州！”

也许，不会再有下一个“BAT”的出现，但广州却还会是那个持续兴盛的千年商都，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既然只有一个，就一定有其不断前行的魅力和动力。

| 第四章 |

## 活力全球城市： 枢纽驱动

珠三角地区建设开放创新转型升级新高地、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一再被赋予重任，寄予厚望。

2016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明确定位广州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根据这一定位，广州由“华南中心城市”升格为“国家中心城市”。

在广州“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战略布局中，“三大战略枢纽”及“三中心一体系”建设勾勒出了广州的雄心壮志。未来，在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上，广州将重点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在城市功能定位上，将推进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建设。

此外，规划纲要提出，重点打造珠江新城、国际金融城和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融合发展的“黄金三角区”，优化提升珠江经济带、创新带和景观带“一江两岸三带”，形成多点支撑、联动发展的格局，加快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推动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水平。

### 世界资源配置与财富中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富强，风起于南海。由岭南这片土地发动的改革开放风潮，经过四十年的历程，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今天，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次迎来新的使命，正努力实现从枢纽型城市到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定位转变。

国际经验表明，那些位处世界顶端的城市不仅是国际交往中心和世界文化中心，也必然会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广州建设“三中心一体系”，即是立志在新的机遇下，加快实现从参与国际市场到运作国际市场、从集聚全球资源到配置全球资源的根本性转变，逐步建成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已初步形成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资源配置中心的基础。

从整体上说，广州正在从国家重要中心城市迈向全球重要节点城市。2017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5万亿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62.89亿美元，增长10.3%。世界五百强有297家在广州投资921个项目，至少120家在广州设立了总部或者地区总部。广州从单一中心城市迈向巨型城市区域。广州从空间、交通、产业、城镇体系等维度来看，携领佛山、肇庆、清远、云浮、韶关等周边区域已显示出巨型城市区域的特征。以广州、深

圳为核心的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形成。

从发展动力来看，广州发展从一般要素驱动开始向高端要素驱动加快转换。广州已从依靠低成本土地和劳动力驱动发展阶段开始转向依靠制度文化、高端投资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产业体系已从轻型工业体系转向综合产业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了10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将集聚更多高端要素资源，打造以“I.A.B”为代表的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新体系。

2017年5月，“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国际经验与广州实践”学术会议举办，为广州迈向全球城市建言献策。2017年12月《财富》论坛在广州成功举办，广州顺势而为，将其打造成个性化的国际城市名片。

高水平对外开放，反过来成为催动改革之花层层绽放的力量。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提出适应时代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过去中国推进工业化和竞争力升级进程中，广州一直起到引领作用。今天，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提升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时，广州提出要做全球资源配置的中心，本身也体现了广州在国家战略中的责任和担当。

## 阵容豪华的“世界500强朋友圈”

作为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有着不少的世界500强企业“朋友圈”。本田、丰田、日产、LG、宝洁、安利、龙沙等世界500强及大型跨国公司都在广州设立了大型生产基地。据统计，截至2017年共有297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广州投资设立921个项目。

近年来，广州与世界500强企业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合作水平也节节攀升，并推动着国企与世界500强等国际巨头企业“联姻”。2018年1月，西门子与广州穗开电业有限公司（穗开）成立合资公司广州穗开智慧能源有限

公司。2月，南航集团与波音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的客改货项目成功落户广州空港经济区。此外，世界500强企业主动到访广州并达成合作的还有不少。伴随着广州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前来广州寻找商机的世界500强企业也越来越多。

作为意图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枢纽的城市，广州也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平台，汇聚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公司。广州还推动“世界500强”企业中国铁建在南沙建设南方总部暨国际业务总部基地，在南沙设立南沙投资公司、区域公司管理总部、境外项目管理中心、国际物流业务中心、金融财务业务中心等，建设中国高铁“走出去”基地。

2015年以来，到穗以及通过不同平台与广州市领导会晤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港航、物流、汽车、装备制造、化工、日化、生物医药、互联网等领域。其中金融类企业达7家，约占接触数量的十分之一。港航物流企业、汽车企业、生物医药医疗类企业、装备制造类企业各4家。

广州与世界500强企业频频互动的背后是，广州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努力。

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中，广州位列全国各城市第一。而在过去6年，广州5次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织GaWC公布2016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在入选的361个世界城市中，广州位列第40位，首次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最近几年排名更是大幅度提高。

开放的广州已形成对人才、资源、资金、技术等长期的磁石效应，正迈向全球企业最佳发展地和投资地。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已吸引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并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广州成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布局中国的重要枢纽，超过120家企业把总部或区域

总部设在广州。

近年来，广州频频亮相国际高端盛会，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展示“广州机遇”。而国际创新巨头也积极抢抓广州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窗口期、机遇期，依托广州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从2017年至今，共有334个项目落户、落地广州，涉及投资总额达5312亿元。

如今广州正快步向创新型城市迈进，努力成为新技术、新知识的输入输出和成果转化的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同时充分发挥广州科技人才大量集聚、创新环境优良、科技产业发达等优势，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在专家看来，广州背靠强大的珠三角制造，又有汇聚全球前沿的科技，未来将成为连接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重要舞台。

## 南沙：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门户

2000年，广州南拓战略启动，开发方向直抵南沙。2015年4月21日，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广东自贸区开始向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宏伟目标迈进。

2015年4月确定的广东、天津、福建三个国家级自贸区中，广东自贸区的规模最大，预期达到的国际化水平也最高。在广东自贸区的三大片区中，南沙片区占60平方公里，比前海蛇口、横琴新区片区面积之和还要大，将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性服务枢纽。

南沙港区航道总长131.5公里，其中比邻出海主航道的深水岸线约36公里，已建成12个10万吨级深水集装箱码头泊位、22个5万吨级以上专业泊

位，已开通欧洲、北美、非洲等内外贸航线64条。

航运物流方面，正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形成与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相适应的政策体系。特色金融方面，将推进金融“15+6”等政策措施落地，推动跨境人民币贷款和企业发债、航运保险、航运金融等政策的落地实施等。国际贸易方面，将联手港澳拓展国际市场，建成港澳向内地拓展、内地借助港澳通达国际市场的双向通道和重要平台。高端制造方面，将依托广汽丰田整车项目，打造千亿元级的汽车产业集群。

南沙自贸区还将成为综合性服务枢纽。目前，南沙国际邮轮码头综合体项目正在建设之中，还将规划建设国际高端医疗服务合作区，强化与港澳在资讯科技、专业服务、航运物流、研发制造、金融、贸易等领域合作，探索在通关便利化、社会保障相衔接、金融合作、跨境数据互联互通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近年来，广州成功创建全国流通领域现代物流示范城市、全国首批现代物流技术应用和共同配送综合试点城市。要充分发挥广州拥有大海港、大空港和产业集群的优势，依托白云国际机场、广州港南沙港区和广州保税区及黄埔、新沙港区，重点建设空港国际物流园区、南沙国际物流园区和黄埔国际物流园区，全力推进“3+5”物流园区体系的建设，以广州为集疏运核心平台，以珠三角、东亚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基础，建设国际采购中心、国际配送中心、国际供应链金融服务基地，形成国际物流枢纽和供应链管理中心。

不断创新的南沙正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家战略新区、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战略在这里叠加实施。南沙航运物流、创新金融、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产业渐成集聚态势。南沙邮轮码头项目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国内首个以世

界最高标准建设的专业游艇码头已建成并投入运营。除大型航运外，以第三产业为服务对象的码头基础配套设施已齐备，辐射力与交通优势将为南沙滨海旅游带来庞大的客源市场。

在政府的恢宏蓝图中，“强南沙，高站位”，是南沙关键词。《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草案重申南沙区全域定位为广州唯一的城市副中心与功能完整的滨海新城，发展定位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绿色智慧宜居城市副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服务功能核心区和共享发展区。

南沙区毗邻港澳，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通过“地铁+高铁+机场+港口”的交通网络格局，建起与香港、澳门、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核心节点的“半小时交通圈”，实现30分钟直通广州市中心，1小时对接珠三角，推动南沙实现从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向“交通中心”的转变。一系列湾区重要利好政策，促使南沙区强势崛起。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享有众多利好政策，决定了南沙这个区域价值的高度，也决定了它未来的发展空间。

南沙现代产业新高地优势明显。南沙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特色金融、高端制造，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致力建设现代产业新高地，推动形成国际创新金融中心、国际化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同时将按照自由贸易港理念大力推动业务创新。依托汽车、造船、装备等，临港产业基础，推进南沙港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幅提升港口吞吐能力。

南沙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充满期待。南沙生态禀赋优良，是一座山、城、田、江、海相融之城。早在2011年获联合国“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区奖”金奖时，已初步形成了“一核四区”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新时代的

南沙，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一座魅力之城、智能之城、绿色之城、幸福之城，成为粤港澳优质生活圈示范区。

南沙的今天正风起云涌，南沙的未来正扬帆起航。

# 文化之城

城市文脉就是城市的一部文明史，是形成和积淀城市性格的文化基因。

——冯骥才



1933年，史学大师陈寅恪看了中山大学教授岑仲勉（广东顺德人）的著作后，致函另一史学大师——广东新会籍的陈垣教授：“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陈寅恪对“粤人”“南学”的推崇，从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视为对岭南学术、岭南文化的一种肯定。广州被称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后来陈寅恪也到了中山大学康乐园，在此教书育人，度过了最后的二十年。

近代以来，广州文化蔚为大观，在绘画（油画、木刻）、外销瓷、戏剧（与剧院文化）、电影、现代音乐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紧密对接西方，许多艺术舶来品大多经由广州向国内散播，影响了当时的文化艺术风气。

文艺的发展端赖教育的力量。回望近代广州教育发展的历史，以阮元创办的学海堂开风气之先，可谓功不可没。自此以后“粤人”一直在学风、学制上大胆创新，各科人才辈出。如今，作为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创新城市，高水平的一流大学对于广州未来的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文化影响的外拓得益于其语言载体——粤语。在中国可能没有一种方言像粤语这样影响全国甚至世界华人圈！显然，这与粤语歌、影视作品的流行有关，其流行在一段时期也与香港有关，但广州不仅是中转站，也是内地流行音乐和现代影视作品的发源地，许多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的歌手都从这里走出来。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21世纪以来，广州在传统媒介、新媒介等领域的发展都令世人瞩目。位于广州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三大报团是当代中国报业的黄金地带。而诞生于广州的微信则一方面汲取着广州的文化给养成长起来，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和未来。

——岭南文化中心地



| 第一章 |

## 南学风貌： 与古为新

### 书院学制改革与学海堂新风

广州是个商业城市，很早就与海外通商往来。至明清时期，社会的四民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士、农、工、商变为了士、商、农、工，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由于考中功名的机会有限，而商人的成功对士大夫又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到了清代，“弃儒就商”的现象有了明显的增长趋势，面对这样的趋势，清朝统治者思考有了新角度——即加强政府与商人的合作以争取商业资本，借助文化之力来控制商人阶层的政治走向。当时，广州的学术变革一方面有了政治、经济依托，另一方面又进一步顺应了当时统治者的政策变革。

为了帮助商人子弟提高应举能力，广州地方官府及时创办书院并向商人子弟敞开大门，著名的越华书院就是盐运使范时纪联合商人共同捐资创办的。当时，这所面向商人子弟的书院得到广州官府的高度重视，极大地鼓舞了商人家族子弟求学中举的决心，而地方官府的这一教育作为，进一

步激发了广州商人捐资兴建书院的积极性。学术和商业之间相辅相成，成为广州当时学界一大特色。

随着广州商人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对生活追求也有了变化，对文化有了更大的需求，追求亦商亦儒的丰采。十三行中泰和行商人颜时瑛在扩建自己的住宅磊园时，就专门建筑“静观楼”收藏古今书画和金石作品，又建临沂书屋，其中藏书36架，结交众多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越华书院山长冯成修、恩平知县李文藻等人都经常到磊园聚会，与文人一起赋诗作对。怡和行商人伍崇曜与学人谭莹交情笃深，曾一起合作刻书，故当时有“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的说法。

为了进一步密切官、绅、商的合作，加强商人与官员、学者的合作对话，19世纪初期，文澜书院在广州创办，它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也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文澜书院的创设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发展“由商入仕”战略的范本，印证了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长期位列“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获得了显著提高，商人身份的士大夫晋升途径越发多样与顺畅，通过提升自身儒学修养等方法，成功地加入地方管理，这些变化逐渐促使整个广州社会价值系统发生微妙的调整，而借学制的变革，广州书院的影响力也开始渗透进城市的生活当中。

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地区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地区的各种资源，不光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而且还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都成倍地增加，更有成效地得到开发利用，效率也愈来愈高。广州书院的学制改革，以应试科举为号召，从根本上调动起了社会基层的向心力，也完成了书院对社会群体相对广泛的教育普及。当时，广州书院的发展充分调动官、绅、商所持的权力资本、学术资本和财富资本为书院发展

服务，由此加速了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

事实也证明，广州书院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发展对广州城市的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清代广州曾经历了两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清初顺治帝颁布了“禁海令”和“迁界令”，康熙初年耿、尚两藩入粤，广州城居民流离窜徙于乡，元气大伤，直至30多年后，广州居民数量才逐渐恢复，而当时广州官府复兴广州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在康熙年间新建了六间书院。第二次劫难在鸦片战争期间，直到1861年英军撤出广州，广东政局才开始稳定，这时的广州官府又是从复兴文化事业入手，如补刊《皇清经解》，恢复学海堂课，修葺学海堂，落实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制度，创办菊坡精舍，这一系列的文化举措对广州实现“同治中兴”至为重要。可见，利用学制变革后的广州书院通过文化教育设施来加强对城市建设，其引导效果非常显著。

清代学术中，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嘉庆廿五年（1820年），阮元主政两广，为了促进广东地区文教事业的进步，大兴文事，引进新式的教育思想，并在广东创办学海堂新书院，这对广东影响极大。

当时广州已有“羊城、越华、粤秀、应元”四大书院，但阮元发现，这些书院的设立并不能满足士子们进修学业的需要，因此决定创立一座新式书院，学海堂应运而生。“学海堂”一名看似化用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古语，实则源于东汉大儒何休，因为何休学识渊博，被称为“学海”。阮元以此作为书院的名称，也是希望鞭策学生成为何休那样的人才。学海堂不仅是培养人才之所，也是当时岭南学术重镇，在地方政治事务中充当重要角色。它所开创的兴学体制被同时代及后代人所效仿，为教育界、学术界吹来了一阵新风。

学海堂以“不课举业”“尊经学、倡实学”为办学宗旨。书院不设山

长，而采用学长制，聘用八位学长，“同司课事”。“八学长制”是阮元的最大创举。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即将卸任两广总督，为了让后人能继续弘扬学海堂的学术精神，特地制定了《学海堂章程》。第一条就规定了学海堂有8个学长，相当于校长。“八学长制”的首创，不仅有利于保证学术自由，形成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并对学术见解不分高下、有理有据就可以自成一说的优良学术氛围的养成，起到了很大作用。“八学长制”一直保持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阮元创办的学海堂，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办学思路。阮元认为，很多学问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做好的，关键靠理解和接受，因此他在学海堂创新了开卷考试制度。书院每到学期结束，都要对学生的进行学习情况进行考核，学长把考试的试题贴在墙上，不让学生们立即在规定的时间内作答，而是让学生们回去查资料，十天半个月之后再回来答题。

为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鼓励和倡导学术自由，阮元还在广州创新了奖学金制度，对学生们独到的学术见解进行“现金”奖励，这样就使得很多原本连饭都吃不饱的文人学者能够埋头一心一意地钻研学问，对学术创新起到了很大贡献。

## 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

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广州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而辛亥革命前后广州的新式教育事业，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制度实践，都具有进步色彩，是传统教育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

的幼童赴美留学，其中广东籍学生占到了70%。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在美国的小学、中学接受全新的教育，回国后一些留美幼童已开始认识到近代教育对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后来他们倡导新式教育，造就大批专科人才，力图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不少人之后服务于学术界、教育界、实业界、法政界，多为专业硕彦、社会栋梁。

另一方面，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又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内容，这对当时的书院教学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基本上继承了万木草堂的办学精神。万木草堂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康有为在这里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课程设置和授课方法非常新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练兵处开始在全国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学制三年，每所学堂学员定额为90名至300名不等。1906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清廷下令废科举，兴学堂，试行学制改革。此后，广州学术界一直在不断创新、变革中得以前行和发展。20世纪初期的广州等地已经设立了师范学堂、师范馆、小学管理员练习所、师范班、初级简易师范科馆、初级师范传习所、半夜师范讲习所，并确立了灵活发展新式教育的思路。

在广州，1908年设立的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附设蒙养院），成为女子师范生实习场所，开始研究幼儿的年龄特征、心理状态。1911年，广州还出现了私人创办的慈爱幼稚园，虽然规模很小，但体现了现代幼儿教育的发展精神。1905年、1910年、1911年，在广州先后三次举办全省运动大会，其中第一次大会比旧中国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整整早25年，参加的学校共有47所，大大推动了广东体育事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以新人才、新思路，继续兴办新教育，特别是以钟荣光为代表的教育家，为适应社会新旧更替的形势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令各校设立校评议会，训练学生提倡德育，改变学堂只教书不育人的流弊。同时，他注重实地调查，改进教育，曾召集广州市内各校办学人员到教育司署讨论，共商办法。1922年，由广东教育委员会制定，以后向全国颁布施行的《壬戌学制》，就是以美国教育模式为蓝本，这与当时广州已有的教育基础是分不开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黄埔长洲岛“广东陆军小学堂”旧址的基础上，黄埔军校（全名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闻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在军事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 广州学人与“史语所”才俊

中外学者多指出，中国历史上，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向南转移的趋势。清末民初，广东私人藏书已经蔚然成风。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中所录各地藏家，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仅排在江苏、浙江之后。晚清时期，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一为陈澧，一为朱次琦。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除了曾国藩外，格外青睐粤人陈澧。陈澧，号东塾。他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但在钱穆看来，陈澧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也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广东人赴京求学者更多，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

更是办得颇具声色。据统计，当时国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500余人，而广东就占到了1/6，多达86人，不仅在当时是“全国之最”，而且被认为“自有大学以来，从四方至，执业肄习其间者，惟广东人最多，亦最勤学”。

20世纪20至30年代，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已经形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才辈出，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以致内部再又分别。

提及20世纪广州的研究学风，首先想到的便是当时在广州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它虽不是粤人所创，但创立之地正在广州，而且汇集的学人才俊堪称群贤毕至，辉耀了岭南的文化星空。

首先是创立者傅斯年，他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次年即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他随即延聘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前来中大任教。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所长。研究所成立后，他积极寻找品学兼优的人才，派他们去国外进修深造。

傅斯年努力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引导学术界走出疑古思潮，重构古史。

傅斯年重建古史大墙，得力于李济等人的支持。李济和傅斯年的初次见面是在1928年冬季的广州。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彼此相见恨晚。李济当即决定担任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任所长）的考古组主任。随后李济北上实地考察殷墟，应用现代田野考古学方法为出土器物命名，做出类型学分析，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为今天的中

国科学考古奠定了基础。

在甲骨文领域，不得不提的还有广东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容庚。商承祚曾于弱冠之年编成《殷墟文字类编》14卷，受到王国维的赞赏。1952年，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与商承祚合作在广州开设了当时唯一一个古文字学研究室，并为中大培养了大批古文字专才。容庚不仅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更以无畏敢言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推崇，至今仍是中山大学康乐园和广东学界的传奇人物，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

## 智星闪耀

### 中大史学的“双子星”

成立于1924年的中大历史学系是中山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多位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都曾在此任教，奠定了该系深厚的学术根基。回望历史学系的过去，陈寅恪、岑仲勉这“双子星座”是怎么也绕不过的。

如今，在中大还保留着陈寅恪的故居。在他住进康乐园后，学校为了保护几近失明的他，专门设置了栅栏，并铺设了一条白色的水泥路，这条路从此也成为中大“以人为本”“尊重学术”的标志。

对于陈寅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今，中大历史系的主页就是以陈寅恪的名言开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虽然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与陈寅恪的理想有十分大的差距，但是在腿残眼盲的病况下，陈寅恪却从未停止过对学术研究的孜孜追求。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时期著名的史学大家之一，陈寅恪的整套史学方法都是值得当今史学界借鉴的，特别是其关于敦煌学、藏学研究

之方法，即开拓研究新领域、预于时流，关于史料的对比、甄别的“释证”“补证”“参证”之方法以及“了解之同情”之法，都是值得研究借鉴的。

陈寅恪人生的最后20年在广州度过，在这里，他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他虽然没有拿过任何学位，却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学贯中西，却顽强秉持着中国文化最为纯粹的一瓣馨香。他孤身一人，却成为一代学人集体追赶的学术目标。他虽然并非广州人，但在1949年定居广州后，写就了自己最为传奇的一页，其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被国际汉学界视为其“诗史互证”治学的典范之作，视为其一生学术范式的总结。可见陈寅恪不但适应了广州，并且带着广州赋予其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将其思想和文化传承下去。

在近百年唐史研究史上，唯一能与陈寅恪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岑学术黄金期的十年，便是在傅斯年主持的广州史语所度过，而奠定岑学术地位的学术成果，也是在史语所进行的中古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岑仲勉自言：“我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52岁到62岁，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

裹挟在中国近代社会巨变、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风雨中，岑仲勉在广州留下了其最为宝贵的十年。与陈寅恪世家望族、留洋多年的背景不同，岑仲勉是一位广东土生土长的平民学者。在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名校经历、没有史学科班训练的情况下，他一生都没有摒弃投身史学的理想，独辟蹊径，续中国传统学问之命脉于一线。19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里，中国学人最大的命运就是变革和转型。岑仲勉身处其中，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的治学路径。他学问精深、交际寡淡，直到今天很多写他的文章也不过寥寥数语，他曾说：“窃以为学以问世，不敢自信，则须求教；稍自信，亦期有补于世，非不得已，固不必以文为市。”在学问

上，岑仲勉隔代续接清人学问，冥冥之中维系了传统经史之学在近代的命脉，他的一生更接近于一个书生的姿态：常伴青灯古卷，甘为一介布衣，虽然清简，但这种态度，却在民族文化转折的宏阔历史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背影。

###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那就是詹天佑的塑像。素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的詹天佑，原籍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广东南海（今广州市荔湾区）。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习铁路工程，获得哲学学士学位，著有《铁路名词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

1905—1909年主持修建了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创造的“中部凿井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

这条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长达200公里，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最初清政府刚提出修筑计划，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争夺修筑权，争持不下，最后提出一个条件：清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中国当时没有修铁路的工程师，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

1905年詹天佑出任总工程师，受命修筑京张铁路，举国振奋。但帝国主义者都等着看笑话。因为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山高涧险，悬崖峭壁，外国著名的工程师尚且不敢轻易尝试，中国人又如何能完成呢？

詹天佑毫不畏惧，下车伊始，马不停蹄勘测线路，对地形做了周密计算。詹天佑自我要求严谨，同时也诫勉工作人员“‘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坚持野外工作，实地考察，带领学生和工人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就教于当地的农民。

铁路得经过很多高山，必须要开凿隧道，其中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

道的工程最艰巨。针对山势高、岩层厚的居庸关，詹天佑大胆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而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是居庸关隧道的三倍长。他创新性地提出了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两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外面两端也同时施工，工期缩短了一半。而在青龙桥附近的坡度特别大，詹天佑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线路。列车北上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前一个拉，后一个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解决了火车上山的困难。京张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竣工，比原计划提早两年，给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

###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

冯如生于广东恩平的一个贫农家庭，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目睹美国先进工业，认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他在研制出一些机械的基础上投入了飞机制造。

1908年9月21日，冯如在哥林达市再次驾机试飞。飞机在他的操纵下腾空而起，飞行了2600多英尺（1英尺=0.3048米）以后缓缓降落在草坪上。经测定，冯如的飞机首飞竟达2640英尺（约804.6米），比莱特兄弟的首飞纪录还要远1788英尺（约545米）。飞机从设计到试航成功，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冯如以他卓绝的天才，丰富的创造力，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孙中山感叹道：“中国大有人才呀！”

1910年，冯如又设计制造了一种性能更好的飞机，并在当年10月的旧金山国际飞行比赛中，以700多英尺（约213.4米）的飞行高度和65英里（约104.6千米）的时速分别打破了1909年在法国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飞行比赛的世界纪录，荣获优等奖。冯如也因此成为举世公认的飞机设计师、制造家和飞行家，受到外国公司的重金争聘。但冯如一心想的是发展中国的航空

事业，想的是为中国多制造一些飞机，所以他断然回绝，寻找机会为祖国服务。

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毅然参加了革命军，投入到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洪流中。革命军委任冯如为陆军飞机长，授权他准备组织飞行侦察队，配合北伐军进行空袭。

1912年8月5日，经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冯如在广州郊区作第二次飞行表演。伴随着马达的轰鸣声，飞机升上了高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引得看台上欢声雷动。飞机表演结束后，冯如准备着陆，但他望见远远的跑道上有两个儿童在戏闹，便猛拉操纵杆，脚踩加速器，让飞机骤然腾空。灾难发生了，由于用力过猛，飞机失去了平衡，导致部分零件损坏，最后坠落在草地上，成为一堆残骸。受伤的冯如被送到医院，却回天乏术。他的遗体安葬在黄花岗烈士墓的左侧，与开创民国的英雄们一起长眠。

那一年，冯如才29岁，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创造了“六个第一”，提出了航空战略理论，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对中华民族航空事业和人民空军发展有着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航空百年暨空军建军60周年之际，中国空军授予冯如“中国航空之父”的称号。

### 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

除了文科基础学科外，在广州也诞生了不少专科领域带头人，他们不畏艰辛、实地考察，坚持理想，在全新的领域开疆拓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被誉为中国稻作学之父、“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周恩来语）的丁颖，出生于广东农村的一个贫家，从小的境遇促使他思考，中国农民的穷困，其原因除了国家不太平之外，就是耕作落后，种子低劣所

致。于是，在同学相约去报考文、法、理、工科之时，他却选择了农科，立志“要使吃亏吃不尽的中国农民开始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以解决温饱”。他先是考取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与农科相近的博物科。1912年秋，又获得公费留学日本。自此起前后12年，他三次东渡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他曾四处奔走呼吁，请求政府增加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研投资，以解决广东稻作生产、水利、肥料、品种和提高栽培技术问题。1926年，他在广州东郊发现野生稻，随后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之一，并首次把水稻划分为籼粳两个亚种，运用生态学观点，按籼—粳、晚—早、水—陆、粘—糯的层次对栽培品种进行分类，为生产培育许多个优良品种，对提高产量和品质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广州兴办农业教育，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华南农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共同组成的。在他的领导下，三校师生不分彼此，融洽相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逐年提高。这是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成功范例，也使同行晚辈深受感召。

“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经常对师生进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的言传身教，对青年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深入基层、艰苦朴素、踏实工作的作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 眼科泰斗：陈耀真

陈耀真是我国现代眼科奠基人之一，他是广东台山人，1934年他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从事医学教育事业，1964年在中山医科大学（现并入中山大学）建立眼科研究室，并在次年建立了中国高等医学院校中最大的一所眼科医院，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集眼科教育、医疗、科学研究

和防盲等任务于一身的新型眼科综合体——中山眼科中心。如今，中山眼科中心已成为世界20大眼科中心之一。

直到1986年在广州逝世前，陈耀真都始终坚持在医学教育岗位上，热忱地为祖国培养眼科人才。他深入医疗工作，通过查房、病例讨论、读书报告等培养年轻医生，第一代学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成为国内著名大学或医院的眼科教授、主任等，其第二代、第三代学生也大都成了国内眼科的骨干力量，其中有我国眼科界首位工程院院士的李绍珍教授。直到80岁高龄，他还培养着第四代学生，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在国内，他也是最早接受各地眼科进修医生的人。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作为知识创新高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面临诸多挑战：学科发展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融合”，知识生产从“学科中心”走向“问题导向”，人才培养也从“专业教育”走向“跨学科教育”。在这一背景下，学科交叉是推动大学知识创新的内在驱动力，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陈耀真在回国后的52年里，一直想着发展中国的现代眼科学，建立一个能将基础医学科学与临床眼科学融合发展的新型眼科教学、医疗、科学研究体系，有规划地培养各种专业骨干，配备防盲、视觉生理、眼生物化学等各种干部，还建立了眼科病理实验室，并最早在中国眼科学领域培养了交叉科学人才。

从1965年起，他把生物物理学、化学专业人才引进到眼病和视觉研究中，以培养交叉科学和边缘科学人才。1983年后，这种人才的培养已形成了一个体系，先后有光学物理—眼科、生物化学—眼科、生物学—眼科、生物力学—视觉、无线电工程学—视觉、化工—眼科等多学科结合的人才，在医学领域里也培养起耳鼻喉科硕士—眼科博士的高级人才，中山眼科中心也成为培养这类特殊眼科人才的重要基地。

## 广州大学城：华南文化教育高地

辛亥革命后广东新式教育的理念及其实践，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环节中的重要内容，为后来广东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教育体制下，广东新式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岭南学校、广东公立政法专门学校等，后来经过发展或合并，发展成为著名的岭南大学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

进入21世纪，人们都在考虑，怎样的学校和学制是适应新世纪发展的？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传统才是当下社会发展需要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学人才在不断地更迭，学科在不断地更新，环境和社会都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广州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对学校认同的最核心部分还是学校的历史文脉和人文精神。

这期间，广州大学城的设立意义重大。2004年，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10所高校组成的大学城校区正式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首批近4万名学生进驻大学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象牙塔”。衡量一所大学的综合实力和教育质量，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指标。统计显示，广东各高校大学城校区拥有30多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多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广州大学城各高校全部具备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其中7所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近年来，还新增软件与信息技术、材料与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工业设计等面向战略新兴产业的学科专业。

21世纪以来，中山大学广州超算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一个

个重量级的科研平台，在广州崛起，为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添砖加瓦。这十多年间，广州高等教育获得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其人才聚集优势愈发明显，配套设施日益完善，高水平科研平台纷纷落户，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基地相继建成，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素质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下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成为广州创新发展的最佳助力，也将成就广



广州大学城鸟瞰

州的城市文化品牌。在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广东有8所高校上榜。其中，科学进步奖方面，汕头大学有1个项目获得了特等奖，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分别有3个项目获得二等奖；同时，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以及南方科技大学分别也有1个项目获得二等奖。而在科学发明奖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和深圳大学分别获得1个二等奖。广州高校获得国家级的科学技术表彰，也足以证明广州具备一流的学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大学是城市发展的人才库。一流大学不仅源源不断地培养优秀人才，同时，也是吸引全球人才、助力城市发展的前沿阵地。作为华南的教育中心，广州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截至2017年，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6人、两院院士79人，“千人计划”专家281人、“万人计划”专家95人。

一流的城市离不开一流的大学。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不遗余力，大力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在广东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公示的2018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工作资金和创新强校工程资金安排方案中，34所公办本科高校将获得36.39亿元支持。2017年初，广州也下发《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实施意见》，提出两年内投入首期建设经费21亿元，建设高水平大学。

当然，建成高水平大学，还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优秀的学术团队、灵活的学术机制等等。巨额投入足以体现出政府的态度，体现出广州在创新引领发展的竞争中对优秀人才的渴求和信心。

## | 第二章 |

### 文化特质： 从容淡定开放包容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刚到广州，都会因公交车前长长的队伍感到惊讶：居然不抢着上车？上了车就更惊讶了：竟然没有售票员，每个人却都自觉投币。如果正好身边有一位老人，立刻还有人主动起身让座。

无人售票、坐车不抢座、主动为有需要的人让座，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习以为常的场景，90年代初的时候，在内地却还是广州独有的风景。很多人认为，9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流行音乐，是广州文化的巅峰，因为只有那时广州的文化才走向了全国。

而其实，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州的强大正在于其极具生命力的草根文化。无人售票、饭后打包、AA制，这些当年让初到广州的人无不瞠目结舌的行为习惯，如今已渗透到了全国。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改变着每一个来到广州的人，他们慢慢接受并慢慢被改变，然后又被他们带回家乡，进而改变了很多地方的生活方式，影响至今。

2017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广州为什么成为全世界唯一千年不衰的商业城市？地理环境、地缘优势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广州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张力以及她给这座城市的人们所带来的从容、淡定、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难得的“规则意识”，并且把这种“规则意识”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带来了商业的持续繁荣。

## 骨子里的包容，深藏于民间的开放

1995年，24岁的青年丁磊从宁波来到广州，创办网易。8年后，他成为全国首富。他曾坦诚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心目中，广东是一片真正的热土。我在广州的城中村住过，从零起步，广东包容我、接纳我，给我机会。”

1992年，许家印从河南舞阳钢铁厂辞职后先到深圳，在站稳脚跟后，他自告奋勇到广州成立一个新的分公司，许家印带着一个司机三个员工奔赴广州，在城中村租了三间小屋子，随后凭借珠岛花园项目一战成名。1996年，许家印在广州注册成立恒大地产，开始了独自创业，这年他38岁。22年后的今天，恒大足球两次夺得了亚冠联赛的冠军，一时风头无两。

这个城市的舞台中心，似乎一直都是外来的创业者处在聚光灯下。而本土成长起来的知名人物，你记得几个？

这并不是偶然。在黄埔古港的南海神庙，有一座达奚司空塑像——一位皮肤黝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左手举于额前，作望海状。传说，达奚司空是唐朝波罗国（今印度）的一名海员，回程时经广州到南海神庙游玩而误了返程的海船，于是望海悲泣而立化。

为一个外国人塑像，说明那时的广州人就已经把全世界来到广州的人

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忌妒、不计较、不算计，一起发展、一起做大，甚至从不忌惮别人比自己做得更大，跑到自己前面去。

也难怪微信创始人张小龙从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毕业后来到广州，一待就是24年。在天河充满市井味的软件园区旁，他带着团队开发出了“连接一切”的微信，如今微信成长为月活跃10亿的社交巨头。

声名远扬的长隆集团让很多人“为了长隆拖家带口来到广州”，但其创始人苏志刚于外界却一直是模糊的存在。他从“一辆自行车、一块砧板、一杆秤”做起，到坐拥世界一流旅游集团，却低调到网上几乎找不到他的照片。“只要你不怕苦，做一行爱一行，也一定会成功。”这是苏志刚常说的，其中也道出了广州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在各行各业的精英中，成长在广州的年轻人似乎总是最早吃螃蟹的人。20世纪80年代，当外企刚刚进入中国时，最早进去工作的就有很多广州年轻人的身影。广州还有中国内地第一家现代购物中心天河城、第一家自选超级市场友谊商店、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第一个扬手即停出租车公司广州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等等无数个“第一”。

甚至在你身边的同事中，那个低调、踏实、经常工作到凌晨的人，说不定就是家里有着好几套房的“广州仔”“广州女”。就像东山少爷的那首《广州仔》里唱的：“这里的风光，你我的依归，常常地为她着迷。光阴似箭，碌碌无为，我哋觉得失礼。”

同事西西，曾在重庆、上海生活多年，来到广州两年多，就被这座城市“圈粉”了。她说，这个城市有亲切感，思路很简单，在广州，不管你来自哪里，你都不会被见外，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好，没有那些无形的束缚和包袱，过得轻松自在。

广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提供着公平的机会、事业乃至话语的空间，而一直成长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好像少有站到

舞台中心时，但却从来没有失去自我的追求。

## 潜移默化的张力，接轨国际的文化

AA制、“吃饭打包”，是从广州走向全国的又一民间文化。

老朱是北方人，2002年，他到广州读大学，与同宿舍的老广一家吃饭。酒足饭饱，山珍海味犹剩半桌，服务员拿着饭盒来问“要唔要打包”，令老朱十分惊讶。惊讶的不止这一次，为同学庆祝生日，买单时，招呼大家聚餐的同学说：“每人交30元。”老朱有些不解：招呼吃饭却不买单，有那么小气吗？

广州还有一项风俗，在网上被誉为“业界的清流”。有人戏谑：如果你接到的“红色炸弹”来自广州的朋友，那么，恭喜你：钱包可以放心了。放眼全国，“份子钱”普遍为500元到5000元，而在广州100元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番顺地区，甚至一分钱不收，把红包折个角代表受礼便还给你。

这些生活细节，把广州文化中务实、低调的作风显露无遗。此外，还有很多影响全国的日常习惯也源自广州，比如现在各地都已经能自觉做到的“公交让座”，也是由广州最早引领的。1986年，广州一汽巴士5路线就和沿线12个单位一起发起“友爱在车厢”的倡议活动，号召人们从自身做起，相互礼让。现在，广东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的调查显示，广州公交让座率超过95%，在高峰期也有80%，在全国名列前茅。

广州妹阿霞在北京读书7年。每次过年从广州买的新衣服，穿去北京都遭到班里同学“强势围观”，新潮的喇叭牛仔裤、时尚的宽松毛衣，甚至阿霞烫的一头卷发，都引领学校潮流。

其实，一直以来，与上海相比，广州人的时尚可能更本土，西关小姐

的时尚也往往不是欧洲或者好莱坞形象的翻版。

20世纪90年代，全国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无人不识广州。一出广州火车站，聚集着各类服装批发市场，有着当下最流行的服装款式。阿霞说：

“印有李小龙头像的T恤、三七分的发型、广州总要比别的地方提前流行大半年。”

“如今，广州人或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易中天在《读城记》里这样描述广州文化带来的影响。易中天认为，广州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且已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

在知乎上，“如何评价广州这座城市”，这一问题有无数个回答和点赞，爱上广州的核心点都是广州开放、包容的文化。

世界文化论坛秘书长保罗·欧文斯就认为，综合广州的开放、包容和活力充沛的实际表现，其文化竞争力有望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

| 第三章 |

## 传承与革新： 绽放海内外的岭南艺术

### 绘画：融汇中西，引领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受到“西学东渐”思潮冲击的广东诞生了许多伟大人物。在美术领域，受到现代思潮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广东诞生了一大批“引风气之先”的变革者、先驱者，如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第一批赴西方学习油画的近现代大师之一李铁夫；中国近代传统笔墨变革者、岭南画派鼻祖“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中国美院首任校长、倡导“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林风眠等。他们无论从思想观念、个人成就还是艺术教育上，都深刻影响了百年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

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氛围下，广东美术界出现了西化派、传统派、折衷派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一时期，广东美术处在时代潮流的中心。其代表人物有“二高一陈”、李铁夫、林风眠、丁衍庸、黄般若、冯钢百、关良、梁锡鸿、胡根天、赵兽、黄君璧等。



高剑父 《枫鹰图》



高奇峰 《老虎》



陈树人 《岭南春色》

“二高一陈”人生经历与艺术理想相似，早年都深受岭南画家居廉、居巢熏陶，继而游学东瀛，投身辛亥革命。他们共同倡导“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探索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国画”，充分调动传媒与教育的力量，为岭南美术界培养出一批革新性的艺术人才，影响岭南画坛超过半个世纪，在中国美术界亦有相当的声誉。“二高一陈”开启了现代美术的风气之先，堪称岭南现代美术的“一代宗师”。

“折衷中外，融合古今”，是“岭南画派”最重要的主张和艺术原则，其革命精神、兼容精神和时代精神，造就了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在艺术发展中，岭南画派后辈秉承优秀传统，信奉同一艺术原则，出现了风格各异的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如第二代的杰出大师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现代的杨之光、陈金章、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著名画家，使岭南画派传人突破“岭南”地域，不仅在内地，而且在港澳台乃至欧

美各地也很有影响，成为一支宣扬华夏文化的重要力量。

20世纪初期，不少中国艺术家都试图从西方寻求方法，为沉寂的中国画坛添上朝气。其中，徐悲鸿和林风眠在1919年负笈巴黎，刘海粟则在1926年将西方美术教学法如裸体模特教学引入上海。然而在他们之前，李铁夫已于1887年就在海外学习油画艺术。他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首个成熟学会西方油画语言的中国人。

从1931年日本侵华至新中国建立的近20年间，中国美术思潮的主题是救国救亡和反黑暗。不论何种艺术观点或艺术形式，艺术家无不投身于时代的浪潮中。这一时期的广东美术界人才济济。版画、漫画、油画和国画各领域都出现了重要人物。如黄新波、赖少其、李桦、古元、陈望、廖冰兄、方成、江有生、司徒乔、符罗飞、庞薰琹、李金发、傅天仇等。

其中，廖冰兄一生中重要阶段的作品都得以完整地展示给世人，而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的“变体画”——即“重画”的作品，则尤其显示出廖冰兄一生中紧贴时代语境，对社会现象和自身毫不留情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这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最好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国美术发展到以现实主义手法为政治服务的革命美术时期。这30年中，广东的美术家如胡一川、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潘鹤、黄笃维、刘仑、尹积昌等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

20世纪广东的“美术革命”是直接和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相对应的，艺术家们直接将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轨迹也直接投射到美术创作中去。20世纪广东艺术家是最早具备现代意识的艺术家，他们最早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的尺度的觉醒。从抗战时期司徒乔、符罗飞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时代动荡之下，广东艺术家在创作中产生了个体灵魂的搅动，这个关于“人”的尺度无比重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这让中国人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之大，必须“开眼看世界”，从整个世界的格局对中国进行定位，这就是一种“现代意识”或“世界意识”。当高剑父、林风眠等广东美术先驱带着他们的乡音和传统的价值观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遭遇到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出于这种意识，让广东美术家在一百年来引领全国风气之先。

## 粤剧：驰名世界的“南国红豆”

粤剧与岭南画派、广东音乐被誉为岭南三大艺术瑰宝，又被视为广东的三张名片。三者之中，粤剧是历史最为悠久、衔接古今文脉、浸润着广东最本色风骨与韵味的艺术形式。粤剧又称为大戏或“广东大戏”，是融合了明清以来流入广东的海盐、弋阳、昆山、梆子等诸腔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以梆子（京剧称为西皮）、二黄为主的我国南方的一个大剧种。周恩来总理曾经说：“昆曲是江南的兰花，粤剧是南国的红豆。”因此“南国红豆”成为粤剧的一个特别的美称。2009年9月30日，由广东、香港和澳门联合申报，粤剧成功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粤剧流行于广东、广西和港澳，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叶。在粤剧诞生的四百多年里，梨园传习，弦歌不辍，诞生了许多香闻尺谱、情托管弦的粤剧艺术家和剧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粤剧戏班常在广州沿海巡回演出，为方便行程，故栖身于红船。此类戏班皆称为红船戏班。

新中国成立后，粤剧艺术得到健康的发展。剧目创作多姿多彩，主张继承艺术前辈的流派唱腔并加以发展，提高既能慷慨高歌又擅浅斟低唱的艺术魅力；伴奏音乐提倡中西结合，努力突出民族和地方特色。建立导演

制度，净化舞台艺术形象，注意整体艺术的创造，发展多种风格的舞台美术设计。全省专业粤剧团最多时发展到73个。1953年成立广州粤剧团；1958年，广州地区9个粤剧大班合并成立了广东粤剧院；1960年成立了广东粤剧学校及其湛江分校。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曾三多、靓少佳、罗品超、文觉非、郎筠玉、红线女、罗家宝、林小群、陈笑风、谭天亮等分别主演了《搜书院》《关汉卿》《柳毅传书》《十奏严嵩》《三件宝》《寸金桥》《金鸡岭》《红花岗》《刘胡兰》《山乡风云》等优秀剧目。其中，《山乡风云》在全国被移植成20多种戏曲剧目，还曾组团到朝鲜和越南进行友好访问演出。薛觉先“万能老倌”的艺术造诣，马师曾的“乞儿喉”唱腔，白驹荣的“平喉”，罗品超的文武生，陈笑风的“风腔”，红线女的“红腔”，文觉非、罗家宝等人的唱做念打深受观众喜爱。20世纪80年代粤剧代表作有《三脱状元袍》《袁崇焕》《昭君公主》《南唐李后主》《魂牵珠玑巷》等。美国华、林锦屏、卢秋萍、倪惠英、冯刚毅、丁凡、郭凤女、陈韵红、彭焯权、曹秀琴等成为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剧团还频繁地到港澳地区和一些国家演出。

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内约有各类粤剧团300多个，活跃在佛山、东莞、中山、湛江等地，登记在册的私伙局多达1140余家。从英国伦敦到法国巴黎，从美国旧金山到加拿大温哥华，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粤剧团每年在海外奉献200多场演出。

在岭南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粤剧的生命力从未须臾中断或衰落，而是不断吸收社会变革与人民生活的鲜活素材，借鉴世界音乐、戏剧的优异元素，不断创造着反映中国社会变革和新时代人民情感的新佳作。2012年以来，广东粤剧院新编剧目《梦·红船》《风云2003》《南海一号》，广州粤剧团创编的大型新编粤剧《碉楼》，佛山市顺德粤剧团粤剧《铁面青天》，南方歌舞剧院的原创音乐剧《六祖惠能》先后上演，几部剧作均以



深受民众喜爱的粤剧开发出了不少文创衍生品

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地方人物为原型进行舞台和艺术的再创作，新编故事更加动人，掀起了新粤剧的高潮。

此外，国内的粤剧创新一直在进行，比如网络游戏与粤剧的跨界融合创意。2015年，一众年轻的演职人员、资深游戏玩家、COSPLAY玩家、道具制作师等组成了一支跨界主创团队，将首部“互联网+粤剧”《决战天策府》搬上了舞台。粤剧的魂加COSPLAY的包装，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决战天策府》的艺术价值达到了“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效果，大受观众欢迎。

源远流长的粤剧艺术，早年随着我们先侨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落户世界各地。家乡的粤剧成为他们当年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据《美国华人史》记载，当年从旧金山请来的戏班经常来往于矿区之间，为当地华工演出传统的折子戏。其中鸿福堂剧团则拥有123名演员，并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剧场。如今在温哥华，仍有不少十分活跃的粤剧社团，很多同乡会或宗亲会都设有粤剧组及乐队，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唱戏，自娱自乐。这便是南粤文化能够扎根海外的土壤。

正如多位粤剧艺术家所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粤剧的海外影响甚至超过国粹京剧。可以说，粤剧不仅是广东文化的奇葩，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代表之一。

## 广东音乐与流行音乐

广东音乐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自明清以来，经历了萌发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等阶段，曲名和乐谱可稽的乐曲现有五百多首。代表性曲目有《雨打芭蕉》《旱天雷》《双声恨》《三宝佛》《步步高》《平湖秋月》《娱乐升平》《赛龙夺锦》等。其乐队有多种组合，最典型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五架头”（又称“硬弓组合”，即二弦、提琴、三弦、月琴、横

箫）和“三架头”（粤胡、扬琴、秦琴），各种丝竹乐器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全面展示了岭南丝竹音乐的精微和华美。

在长期的创作表演实践中，广东音乐开放性地选择、吸收了外来音乐及国内其他民间艺术的有益成分，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间音乐品种。它拥有一批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和代表性乐器，与粤剧、岭南画派并列为“岭南三大艺术瑰宝”。

在海外，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广东音乐是海外华人与祖国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为海外华人传承优秀中国文化传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百年来，广东音乐家为中国音乐发展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以冼星海、萧友梅、吕文成、马思聪、“何氏三杰”为代表的广东音乐家，更是在音乐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东音乐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诞生于抗日救亡浪潮中的《黄河大合唱》和《思乡曲》，更凭借深切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化和拓展了广东音乐乃至中国民族音乐的内涵及范畴，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不朽传奇。

据中国音乐史经典教科书和资料记载，在中国音乐发展进程中，重要的音乐家里面，可圈可点的广东音乐家就有30多位，其中有多位来自广州，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按照1990年做统计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在全部315位音乐家中，岭南音乐家有51位）。

番禺人冼星海，是萧友梅的弟子，他以气势恢宏的《黄河大合唱》蜚声海内外，在四十年的人生中紧随中国革命的节奏，冼星海用一系列振奋人心、融合中西元素的交响乐作品，震荡着民族的脉搏，被称为“人民音乐家、作曲家”，除了《黄河大合唱》，他的作品还包括数量众多的声乐、器乐作品。

中国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马思聪，是广东

汕尾海丰人，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他是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将民族音乐素材运用到小提琴音乐创作中的作曲家。他几乎每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思乡曲》更是其中的典范，也是我国第一首真正走上国际舞台、被外国大师演奏的小提琴独奏曲。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国小提琴教学中的必备曲目，在各种音乐会上久演不衰。

在广东音乐发展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家族名垂青史，那就是以何博众、何柳堂为代表的广州沙湾何氏家族。《何氏家传秘谱》以手抄本形式，记载了《饿马摇铃》等运用琵琶轮指技法发展旋律的创编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更因其在粤乐创作、演奏、教学上的杰出成就而被后人尊称为广东音乐“何氏三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何柳堂发表的《赛龙夺锦》，更被视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广东音乐开始朝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并逐渐走上成熟阶段的标志性作品。

改革开放后，中国流行音乐逐渐发展起来，它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进行的。作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其流行音乐的发展也同样走在各省份的前列，广州由于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流行音乐创作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广州音乐人摸索出了一条个性化、现代化、民族化歌曲创作之路，并使广州成为与北京并列的南北两大通俗歌曲创作基地。《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春天的故事》《我爱你，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广州这块开放包容的热土上孕育了一首又一首主旋律音乐佳作。它们优美的词曲饱含着对祖国繁荣发展的歌颂，将艺术性、思想性和群众性完美结合，散发着独特魅力。

1984年，歌唱艺术家李谷一在央视春晚上演唱的这一首《迎宾曲》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具有浓郁的广东风格的歌曲，常用于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好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迎宾曲》就在宴请各国领导、元

首时播放。每当提起《迎宾曲》，人们总能唱出那熟悉的歌词：“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鲜花伴美酒，欢聚一堂抒情怀……”其实《迎宾曲》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电影《客从何来》的主题曲。《客从何来》在1980年上映，由广布道尔基导演，反映20世纪70年代广交会的情况，讲述了当时广州鲜花如海、中外宾朋相聚一堂的精彩故事。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是刘长安的作品。刘长安自1969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专业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广州市歌舞团工作，在工作不到两年后，便创作出了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在歌舞团担任专职作曲的十四年期间，他创作的音乐作品达千余件。

出生普宁、长居广州的陈小奇最为经典的代表作是《涛声依旧》。多年来，陈小奇坚信，广东依然是最适合流行音乐生长的地方：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流行音乐的摇篮，广东最宝贵的是它源源不断盛产的新观念。这块既有本土岭南文化的深厚沉淀，又张开双臂拥抱多种新鲜元素、经济形式多样化的宽广地区，必然促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崛起。

提起李海鹰的名字，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的旋律曾经深深地打动过几代人。李海鹰认为，这首歌不是诉说思乡，它表现的其实是一种回望——一种从现代社会向农业时代的回望，一种现代人向传统精神家园的反观，这种回望或反观，与文学思潮的寻根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但又不是纯粹寻根。近年来，他还将“流行”与“古典”进行有机的融合，实现了“流行音乐交响化”，如《亮剑》《黑冰》《背叛》这些影视作品的音乐，现在又以管弦乐形式再现给观众。经过多年的积累，2016年，李海鹰创作了大型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广州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城市，一大批流行歌手和歌曲从广州辐射到全国。如当年的毛宁、杨钰莹、陈明、陈汝佳、黄格选、王子鸣、陈妃平、李春波、陈明、甘萍、林萍、高林生

等，都曾是红遍全国的歌手和明星。幕后的制作人如陈小奇、朱德荣、李海鹰、兰斋、浮克、李广平，以及很少露面的苏拉、陈璐、何沐阳、张超等，一起打造了当年南派音乐的盛况。

1992年到1993年，大陆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了市场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推出的新偶像。如广州的杨钰莹、周艳泓、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上海的王焱、甄凌、石云岚等。尽管这些歌手包装方式大多未能摆脱港台的模式，所演唱的歌曲在开掘的深入、描摹的精细上还未达到港台歌坛鼎盛时期同类作品的水准，但已经在国内青少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消费市场的局面。

1994年，内地的MV开始发展，王子鸣单曲《伤心雨》为他戴上了“伤心王子”的皇冠，捧回了众多音乐奖项。谢东发表单曲《笑脸》，传遍大街小巷。而毛宁、陈明、麦子杰、杨钰莹、甘萍、林依轮这些从外地来到广州的青年歌手，在两三年中都迅速走红，贴着他们照片的磁带和碟片，动辄售出数十数百万份，并大量涌向全国各地。这批流行歌星是20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乐坛的中流砥柱，也共同缔造了20世纪90年代最光辉的广东乐坛，将大陆90年代的流行音乐推向了鼎盛。

在这期间，广东流行音乐所创造的“中国第一”，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中国第一家现代音乐茶座、中国第一家影音公司、中国第一次评选十大歌星和十大金曲、中国第一个音乐排行榜、中国第一个流行音乐组织、中国第一个歌手签约制度，全都由广州首创。广东在唱片的加工、制作、发行方面依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唱片加工、制作、发行都在广东。

21世纪以来，广东流行音乐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在新媒体时代，广东流行乐坛率先完成音乐文化的载体革命，许多网络歌手和网

络歌曲再度引领中国流行音乐潮流。

今天，广东音乐在产业建设、“互联网+音乐”、国际化演出、传承粤曲、惠民服务等方面，走入了更为多元化的时期。不久前，广州大型原创舞剧《沙湾往事》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第十五届文华大奖。《沙湾往事》作为一部舞剧，讲述了广东音乐人薪火相传创作经典名曲的故事，核心内涵是展现广东音乐精神，展示广东音乐人传承发展民族音乐的不懈努力。2016年两次进京演出并获得广泛赞誉的音乐剧《烽火·洗星海》同样是广州艺术家们的经典之作。

## 引领潮流的南国影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的影视作品除了紧抓时代脉搏、极好地向全国展示了各个时代的广州风土人情，还让人了解到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以其平民性（岭南特色）、开放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引起广泛的关注。

粤派影视作品，自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在各种“细腻”的地方下了功夫。剧本中情感的细腻、镜头的细腻、音乐的细腻……这种细致入微的特色，也保证了粤产影视作品能够在观众中形成强烈的共鸣。比如20世纪50年代时，蔡楚生和王为一所拍的《南海潮》中，当时已经是中国电影领军人物的蔡楚生甚至细致到每个分镜头都要硬抠好多遍，直到能够最完美地体现故事。而像著名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在电影艺术高度网络化的今天依然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这部电影作品中无比细腻的人物情感。

富有南国特色是粤产影视作品风靡全国的主要原因。像20世纪80年代的《雅马哈鱼档》《外来妹》《情满珠江》等作品，无一例外是描述发生在广东大地上的、普通人身上的事情。由于岭南文化本身最大的特色就是

平民化，因此这些影视作品也极好地向全国展示了整个广东在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更是让人了解到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像《外来媳妇本地郎》这样的精品情景剧，更是拍摄过千集，不但受到本地人的喜欢，国内其他地方的观众同样反响强烈。

广州的文化特色除了平民化之外，还具有海洋性文化的兼容并包。具体体现在广东的影视作品上，就是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先锋特色，即所谓的“敢为天下先”。比如，在还没有人敢于公开宣传个体户成就的时候，珠影就敢于拍出《雅马哈鱼档》；在全国并没有几家电视台敢于译制国外电视剧的时候，广东人就引进了《血疑》；而在内容方面，广东的影视作品更是无所不包。从伟人领袖（《邓小平》《孙中山》等领袖传记电影）到贩夫走卒，名导演、名演员都可以在此得到最好的发挥，获奖无数。军旅题材（《和平年代》等）、公安题材（《英雄无悔》等）、谍战题材（《潜伏》等），无一不是精品，对于中国类型剧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电影《雅马哈鱼档》改编自作家章以武的同名小说，是最有影响的岭南电影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通过雅马哈鱼档的兴衰变化，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广州个体营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展现出高速建设中的城市新貌，以及一代新人的崛起与他们的理想、情操。该片歌颂改革开放，不写大人物大事件，而是小百姓勤劳致富的发家史，符合广大民众的“二次解放”愿望，切中社会热点，以小见大，引起全国观众的强烈共鸣。在许多观众眼里，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电影正式上映将近20年的今天，《雅马哈鱼档》都只是一部“代表小市民”的通俗电影而已，然而文艺界给予该片的评价却是沉实有力：这不但是“广东改革开放的第一张名片”，同时还成为其他国家改革的示范性教材。

《情满珠江》是一部反映广东改革开放十年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这部

以南方某电风扇厂从乡镇小厂到国际集团为蓝本的划时代巨作，艺术地再现了中国人与中国经济痛苦而傲世的蜕变历程。该剧所展现的20世纪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以及回城创业的故事，似乎更能引起如今四五十岁人的共鸣，但其中所蕴含的爱的真谛、生活的韵味以及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同样吸引着年轻一代。在改革开放起步不久的时期，这部电视剧摒弃了宏大叙事而写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广东人的群体性格和广东人的精神风貌，获得了飞天奖一等奖和最佳编导奖，也获得了极好的收视效应和社会反响。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的影视产业曾引领时代潮流。毋庸置疑，影响广州文化产业最深的地方就是香港。作为“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的出口量一度仅次于好莱坞。香港电影产业发展中的基因也在广州企业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那就是：敢于创新，并且具有敏锐的商业意识。

最大的上市文化企业奥飞动漫就是最好的例子。尽管最近遇到了盈利上的瓶颈，但是无人能够否认坐落在广州的奥飞是“中国动漫+衍生行业”的先行者，在多年前国产动画还无法大规模商业化时走在了所有人前面，创造出了“喜羊羊”这一经典IP。

## “动漫之城”领跑全国

全国首家上市的动漫企业、首家市值超百亿元的是诞生于广州的奥飞；全国最大的动漫衍生产品销售批发市场在广州一德路；全国最大的动漫音像制品版权代理与销售商是广州天艺，拥有全国六成半动漫音像制品……

早在2005年，以广州为代表的部分地市就出台动漫产业扶持政策，时至今日，以《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等为代表的“动漫粤军”，不断刷新动漫票房、收视、授权、衍生产品销售等各项业绩纪

录，其强大实力被誉为半支“动漫国家队”。

而在这支队伍中，广州军团更是出类拔萃。2015年8月11日，广州奥飞动漫以9.04亿元收购有妖气，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动漫产业最大的一场收购案。这家以玩具起家的企业，如今不仅拥有“喜羊羊”“十万个冷笑话”“倒霉熊”“铠甲勇士”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且涉足影视、游戏、玩具、鞋服等多个领域，是中国动漫行业一颗耀眼的新星。

奥飞的崛起是广州动漫行业的一个缩影。回望这一行业巨头的成长历程，可以让我们对广州动漫企业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

奥飞动漫前身是成立于1993年的广东奥迪玩具实业有限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始人蔡东青通过一款大喇叭玩具挖得第一桶金。当其他玩具生产商还在沿袭传统玩具生产模式时，蔡东青开始了品牌经营之路。当时，蔡东青一方面与国家体育总局等官方机构合办全国性四驱车竞技比赛，另一方面，引进日本热播动画《四驱小子》，通过主流媒体播出刺激四驱车销售增长。四驱车的成功经历让蔡东青首次尝到“动漫+玩具”模式对销售的引爆力。

2004年，奥飞开始尝试制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漫内容。第一部自主知识产权动画片是《火力少年王1》，该剧情节围绕一种名为“悠悠球”的玩具展开。这种“衍生品先行，内容辅助”的模式打破了之前大部分动漫企业“内容先行，衍生品收回成本”的模式，开辟了行业发展的新模式。之后，奥飞用同样的方式打造了铠甲勇士、果宝特工、巴拉拉小魔仙等动漫形象，并带动玩具、图书等周边衍生品销售的增长。接着，奥飞开始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进程。一个动漫大咖形象，呼之欲出。

奥飞之外，广州动漫还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广州天艺拥有全国六成半动漫音像制品，其中光《喜羊羊与灰太狼》影视光盘便销售了近3000万张；广州主办了被业界誉为“中国动漫第一奖”的金龙奖，引领行业风

潮；广州一德路是全国最大的动漫衍生产品销售批发市场……可以说，在中国动漫业发展上，广州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

广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交融中西的岭南文化，为创作者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有良好的商业基础和商业文明，动漫IP搭载在华南商圈庞大的消费品流通和销售平台之上，可以更广泛地接触到消费者，成功概率较高。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动漫文化逐渐形成，本土原创力量开始涌现，产生了《乐叔与虾仔》《乌龙院》《爆笑校园》《猪猪侠》《喜羊羊与灰太狼》等脍炙人口的时代佳作，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引领了中国动漫潮流走向，锻造了中国动漫行业的“梦之队”，使广州动漫产业规模晋身国内三甲。动漫艺术事业成长与发展的轨迹，成为广州改革开放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

喜羊羊、灰太狼、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超级飞侠……这些动画片明星角色都出自广州动漫企业。同时，广州本土动漫企业获得各路资本争相追逐——华闻传媒、光线影业等上市公司先后入局，带动广州动漫版权交易活跃，来自各界的动漫定制服务需求日益旺盛。

| 第四章 |

## 融媒之城： 时代新绽

### 晚清和民国的报业摇篮

广州的报业传媒历史悠久，根基深厚，植根于商业化的市民市场，反过来又养育了近半个世纪的广州文化修养。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许多高品质报道及其文化思想，常常轰动世界。可以说报业传媒是广州文化产业的强项，是广州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和支柱。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9月到达广州，成为近代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来华传教曾做过长期准备，因清廷严禁传教，马礼逊选择了南洋马六甲作为基地，与英国教士米怜一起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它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杂志。此后，外国传教士在广州、澳门、南洋等地创办了第一批近代中文报刊。

而近代国人办报的开端，或可追溯至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所组织的译报活动。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之职办鸦片走私时，一到广州就立即进行调查研究的，亲自详考禁令，检查海防，并立即着手在其

官署组织了一个专门从事外文书籍报刊的班子，想方设法罗致翻译人才，从事编译工作，以便“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定控制之方”。当时装订成册的译稿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或《澳门月报》，属参考消息性质。它们一般都取材于当时在广州、澳门等地发行的外文报纸，如英文的《广东记录报》《广州周报》《中国丛报》等。这些资料逐渐改变了中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保守风气，使国人了解西方各国情况，开启世界知识的视野，乃至对近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其《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也提出了设新闻馆、兴邮亭、兴新闻官、准卖新闻篇（即报纸）或暗柜（即检举意见箱）等新闻制度理想，可惜并未实现。

由于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从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先是在香港，而后是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主持、创办的最早一批近代报纸，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

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内地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由国人自办的近代报纸，其中包括1872年在广州创办的《羊城采新实录》，1873年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1874年在上海创办的《汇报》，1884年、1886年分别在广州创办的《述报》《广报》等。

甲午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救亡图存思潮风起云涌。在维新运动期间，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1895年至1898年的4年间，全国新出版的中文报刊约120种，其中80%左右为国人自办。以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扩大影响，鼓吹变法图强的主张，积极推进政治改良运动，先后办了近30种报刊，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苏州、无锡、汉口、长沙、重庆、桂林、太原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出版，在我国新闻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的机关报《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摘编选译国际、国内报纸的新闻，介绍资本主义国

家政治经济情况，刊载朝廷奏章，以供朝廷官员了解世界。1895年，强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强学报》随之创立。两报虽然很快遭封禁，但被称为康梁变法时期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报纸。“百日维新”时期，是改良派维新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也是改良派报刊宣传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其间最重要的报刊是梁启超主导的上海《时务报》。《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及翻译外报为主要内容，刊行数月，便风行全国，深受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最高发行量达1.7万余份，成为当时影响极大的报刊。《时务报》振聋发聩的言论，使朝野为之震动，其所译外报外电，又使人们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当时官员也以购阅《时务报》为时髦。封疆大吏或主动捐款，或代为推销，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都曾下令订购，发至下属官府及书院阅读。

尤其是主笔梁启超的论说文，观点新颖、文字通俗，“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由此与其师康有为齐名，人称“康梁”，而后成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不仅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界的一介奇才。他的一支健笔，曾反复搅动中国政潮，人称“舆论界的骄子”，是我国新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从23岁（1895年）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到48岁（1920年）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在长达25年的办报生涯中，他先后亲自主编了10个报刊，包括《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

梁启超报刊活动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他主持《中外纪闻》《时务报》和《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1898年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先后在横滨创办并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发表大量文章介绍西方

学术文化，批判封建思想，抨击当政的守旧派势力，推动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启蒙运动。他逻辑清晰、饱含情感的“新文体”或“新民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极易打动世人的心，以致“学者竞效之”。

梁启超的办报生涯形成了“去塞求通”的思想，比喻报馆为“耳目喉舌”，指出报馆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两大天职，并提出了“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等新闻的原则和功能，并最早提出了“党报”“机关报”等概念，对近代中国新闻业的成熟所做的贡献不可谓不重大。

## 当代中国报业的黄金地带

改革开放后，广州市场经济发达，经济实力强大，政治文化宽松开明，同时广州具有务实求新、开拓进取的精神个性，这一切都大大激发了报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报业精神，最终铸就了报业辉煌。

在当代中国报业格局中，广州报业开风气之先，发展迅猛，在不少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广州报业拥有众多的报纸品牌，主要包括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无论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在国内都名列前茅，成为中国报业的三大领军品牌。多年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被评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之一，《广州日报》的广告收入稳坐国内单张报纸广告收入的头把交椅。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广州报业的强劲实力。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身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1998年5月18日正式挂牌运作。2005年7月18日更为现名。主报《南方日报》诞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一起披肝沥胆，见证和解读时代的精神风貌。自1963年《南方日报》的第一份子报《南方农村报》诞生后的近半个世纪，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

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通过“龙生龙、凤生凤”的多品牌战略，密集打造了一系列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三大报系和知名子品牌媒体，目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力推报、刊、网、端、微、屏协同融合，力图通过两条路径（深度融合、全面转型）、三大战略（移动有限、数据有限、用户优先）、四大平台（党媒宣传平台、立体传播平台、数据服务平台、产业拓展平台）建设智慧型文化传媒集团，被同行誉为中国报业“定位最清晰、结构最合理，综合运营能力最强，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业传媒集团。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多品牌战略，使南方报业成功打造了在多个细分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品牌媒体：《南方日报》在省级机关报中近30年来影响力、发行量和广告额都居于第一位；《南方周末》志在记录时代进程，自1984年创刊以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脍炙人口，一纸风行，独步报林，2008年被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主办的评选活动评为最具品牌价值的报纸。而在都市类报纸方面，《南方都市报》是面向中国最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主流人群所办的综合类日报，后来居上，2006年和2007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定为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财经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以分析国际形势、透视中国经济、观察行业动态、引导良性发展为目的，是中国最大的商业类报纸媒体以及商业报纸的领导者；在人物周刊类杂志方面，《南方人物周刊》稳居前列；2003年由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新京报》，是中国首家获得正式批准的跨地区联合办报试点，也是中国首家股份制结构的时政类报纸……这种战略使得南方报业拥有了抵御市场风险的强大动能，在多年的新闻业变革中保持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017年8月，“从纸开始 向云出发”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最新宣传片惊艳亮相。《羊城晚报》诞生于1957年，是新中国创办的首份大型晚报。从降

生之日起，羊城晚报即身负摆脱“《真理报》模式”、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办报道路的使命。它以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移风易俗又指导生活，不仅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也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

“文革”期间羊城晚报被迫停刊，直到1980年春才复刊。经过十年的力量积蓄，在新的历史时刻，它首开舆论监督的风气，宣传广东“先行一步”，鼓舞全国改革开放，很快一纸风行，连续三十余年发行量超过百万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传播品牌。

2015年，羊城晚报进行重要战略转进，整体搬迁至羊城创意产业园，开始探索“园区聚要素”“产业促融合”。如今，羊城晚报从单一报纸向多元集群和平台转变，它既是融合羊城晚报、金羊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羊城派”客户端，并联通户外多屏、手机报等多种新兴媒体形式的立体传播平台，又是依托创意园区，实施产业生态重组和再造，探索园区为主体的复合型产业运营模式的平台。

荟萃众多文化传播产业资源的羊城创意园、以创业和城市更新为基调的“羊城同创汇”和以文创为特色的南沙项目，共同构成“一园多区”的格局，是独具“羊晚”特色的转型之路。

传媒与创意园，为羊城晚报提供“双轮驱动”，互融互联。同时羊城晚报将服务延伸至云端，与该领域内顶尖的高科技公司合作，建立起了自有品牌的“智慧信息研究中心”，合资成立生态型云孵化器平台，联合打造众创空间，涉足音乐文化产业，打造“虚拟创意产业园”，大大丰富了原有的内容产品线和服务产业链。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1996年1月15日，是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其主报《广州日报》创刊于1952年12月1日。身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日报》，在全国报业市场上创造了诸多奇迹。1987年，在全国地方报纸中，《广州日报》划时代地由4版扩至8版、12版、16版，到日均64版、日发行

量 185万份；《广州日报》最早实行广告代理制同时也是全国最早自办发行的报纸之一；2003年8月12日和2005年3月1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先后与星岛日报集团和明报集团合作，推出了《广州日报·大洋洲专版》和《广州日报·北美专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拥有技术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印务中心，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印刷厂之一。《广州日报》也是国内最早实现全彩印刷的报纸，是中国最早自办发行的报纸之一。

一直以来，《广州日报》的创新活动，往往贯穿着“重视读者体验、重视市场规律”的理念。它既是产品又是平台，与读者的“对话”比别的商品更直接、更多维。它将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活色生香的生活呈现得如此生动、大气，又在立足本埠的基础上包容了一种世界性的热情、活力与眼光。

《广州日报》产品创新跳出“产品复制”的老模式，而是以360度全方位地去理解用户、洞悉市场，从内容到报相，从采编模式到产品拓展，从市场活动到对外合作，360度全方位地去滋养母体。目前，广州日报已构建起了“报刊+网站+移动端”的全媒体矩阵和立体传播格局。广州日报手机数字版成为全面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融合矩阵的移动媒体阵地。

《广州日报》的成就与影响力，是广州人务实、商业、开放、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的文化产品体现。它的内容创新、经营创新为全国的城市党媒树立了一座标杆。

## 微信在广州

广州有一张“金名片”：腾讯微信，“连接一切”的微信。在今天的中国，微信已不单单是一个充满创新功能的手机应用。它已成为中国电子革命的代表。使用率覆盖90%以上的智能手机，被称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使用工具。

广州文化开放且包容，求变且创新，在不断地变化流动当中，力求传承广州本地文化的精髓。正是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文化精神，让广州人一直在承继传统之中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将更多的惊喜带到世界面前，把广州打造成一座奇迹之城。各行各业都孕育出影响世界的实例，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字都离不开广州。无论是微信的诞生，还是广州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崛起，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 广州为何能诞生微信？

现在微信已经走进了千万百姓的家，无论什么年龄层段的人，都认为微信技术是最为方便使用的软件。人们很难想象，这个团队创立几年来，却有这般惊人的成就。可以说，微信的诞生与崛起，代表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速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微信就诞生于这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并落户昔日的黄埔古港所在地——琶洲岛，成为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连接一切”的核心资源。微信团队组建8年后，2018年全球活跃用户首次突破十亿人，中国有十四亿的人口，有一半人以上，选择了微信这个软件。微信的用户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它的忠实粉丝。对于年轻人而言，不使用微信，那就是与世界脱轨。

广州是一个具有优越地理优势的城市，这里有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拥有一个互联网公司需要具备的创新环境，这里也有着非常多的华南高校。不缺乏创新性人才，是广州能够发展互联网的一个最大优势。腾讯董事长马化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更加确认将微信落户广州。广州能够孕育微信这样的行业佼佼者，是必然而不是偶然。

广州为什么能够诞生微信？位于深圳的互联网巨头腾讯，为何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核武器”微信总部落子海珠琶洲？在微信企业再度选址之时，

广州如何洞悉微信商业前景，没有错失机会？

答案藏在广州的商业基因中：广州具有区位、人才、创新氛围等若干优势。比如，作为华南地区高校和院所聚集的广州，这里从来不缺乏互联网人才；作为千年商都的广州，历来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中国互联网发达城市的广州，从来未曾与互联网产业脱节过，甚至可以说是中小微互联网公司的沃土……

谈及微信，不得不提其创始人张小龙，他用10年时间在广州完成了从程序员到产品经理、再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在广州走入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之时，张小龙在这里开启了他的互联网工作生涯。他的第一个东家是目标思维软件公司，从事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系统的研究开发。由于种种原因，目标思维公司后来解散了。不过，这一时期的磨炼使张小龙的软件开发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久之后，张小龙就开始开发Foxmail邮箱，这款后来被腾讯收购变成QQ邮箱的产品，也是孕育微信的“沃土”。

2000年是互联网泡沫开始的第一年。年初，张小龙将Foxmail卖给博大公司。2005年，中国国内互联网用户刚刚超过1亿。当年3月，腾讯收购Foxmail时，Foxmail用户已经达到500万，版本更新至Foxmail 6.0 beta1。从1994年研究生毕业到2005年被招入腾讯麾下，张小龙待在广州积累10个年头的工作经验。

马化腾将张小龙招入麾下后，并没有让他到深圳报到，而是允许他和他的团队继续留在广州。这个特区般的待遇一直保持到现在。基于此，张小龙组建了腾讯广州研发部。成为腾讯明星产品经理的张小龙，其间四处突围尝试创新，直至2011年微信上线。

微信后来的成长过程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悉。2010年11月19日，微信项目正式启动，十几名来自QQ邮箱团队的研发人员，被张小龙关在“小黑屋”里搞开发。

2011年1月21日，微信发布针对iPhone用户的1.0测试版。微信由此呱呱坠

地。2012年3月29日，微信的用户数突破一亿。从零增长到一亿，微信用了433天。相较于Facebook花费52个月达到一亿用户的时间，微信快了数倍。

2015年，腾讯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QQ智能终端月活跃账户达到6.03亿，比2014年同期增长23%；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5.49亿，比2014年同期增长39%。而据2017年3月22日腾讯官方发布的《2016年年度财务报告》，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跃用户数达8.89亿，同比增长28%；仅2016年12月，腾讯移动支付的月活跃账户及日均支付交易笔数就超过6亿。

今天的微信不仅是移动互联网即时通讯软件，更成为“连接一切”的端口。微信从诞生到成长为具有“连接一切”这一精神气质的产品，每一步均和广州这座具有开放精神的城市相得益彰。

如今，微信周边形成了软、硬件平台生态圈。微信开放平台业务，大量中小微企业通过与微信合作，迅速提高产品利用速度，就像尾随巨鲸的鱼群一样，借助领航者的水流前进。当前，广州有数百家企业正在进行这项对接，推出了微信政务订制、商家微信平台推广、智能家居和穿戴开发等。

在广州，一家微信硬件企业生产出了粤通卡一充值易设备，这个巴掌大小的设备植入微信硬件平台AirSync蓝牙协议，为粤通卡实现空中充值。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微信应用团队为其开通了微信医保付费服务，医保用户先在微信上绑定自己的医保卡，在挂号、缴费时便可自动完成医保支付部分和自费部分的费用支付，节省排队缴费时间。

### 微信的“蝴蝶效应”

广州能否产生第二家微信企业，能否培育类似微信的新兴业态公司？“很有趣的是，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互联网浪潮，广州都是走在前面的。”腾讯公司内部人士如此评价广州的互联网基础。

从163邮箱开始，20年前的广州就已经走在互联网时代的前列，从未与互联网浪潮脱节。广州在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中诞生了网易、21cn等公司，在门户时代和北京遥相呼应，站在了互联网浪潮之巅。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广州也没有落下前进步伐，相反还成了微信、YY语音的诞生地。

这得益于广州为创新提供的开放包容的环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种开放包容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基因，而且人文历史资源丰富，是华南地区不可替代的创新创业沃土。

2013年的微信，虽然自身还未找到商业盈利模式，但已经显示出它惊人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海珠如何对接这个未来的“巨无霸”互联网公司？海珠区政府做出一个决议：密切关注微信成长，但不让体制内力量过多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

2013年，张小龙将腾讯广州研发部团队整体带进海珠T.I.T创意园，一口气租下6幢由广州纺织厂旧厂房改造的办公楼。微信进驻T.I.T一开始并未惊动海珠区政府，直到T.I.T创意园负责人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海珠区招商部门。调研了微信T.I.T办公楼后，海珠区政府着实受到了不小的震撼：花费重金聘请专业装修团队，将办公室环境打造成美国“硅谷”式办公环境。张小龙希望给团队营造一处环境幽静、适合极客办公的场所。

2014年，广州“四馆一园”建设拆迁不断深入，T.I.T创意园部分办公楼被划入拆迁范围，其中有两幢微信办公楼，分别是QQ邮箱研发楼和行政楼。已经习惯于T.I.T创意园创新氛围的微信，找到政府请求在办公场所上给予支持。

当时有三个建议解决方案。第一个建议方案出自微信，建议“四馆一园”拆迁做出适当调整，绕过T.I.T区域。这个建议无法实现。第二个建议来自海珠区政府，建议在琶洲广州信息港找一个合适地块给予微信修建办公楼。这个提议也不了了之，新修一处办公楼耗时耗力，微信团队更希望留在

T.I.T内。位于珠影对面的T.I.T创意园，交通便捷、生活配套齐全，是广州中心城区不可多得的集设计、创意、交流为一体的园区。第三个建议来自政府、园区和微信的共同提议，在T.I.T园内挤出两处新办公场所，这同样困难重重。当时的T.I.T创意园成为广州创意公司最青睐的办公场所，办公室出租已经饱和。在政府、园区的数次协调下，一家服装企业把用于T台秀的场所让出来，另一家会所也做出让步。微信马上对新办公楼进行装修，2015年5月，微信受拆迁影响的办公楼搬入，等待已久的拆迁队伍才进场作业。

而早在1999年，阿里巴巴曾试过将总部迁往上海，迁沪不久，马云发现上海商务成本过高、企业文化难以融入上海，而同时杭州软实力在不断提升。2000年，阿里巴巴重返杭州，就此做大做强。上海政府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何上海产生不了阿里巴巴？

广州没有让微信离开。微信坚持不搬出T.I.T创意园的决心，意外地为广州带来了“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在为微信协调新办公场所中，海珠区政府认识到，T.I.T创意园对于微信来说，毕竟池子太小，未来这条大鱼还要空间腾挪怎么办？

微信的能量已经显山露水。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跟随广州创新发展观察在调研了微信后，毫不吝言褒奖其为高于“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龙企业”。

2015年3月，广州国际投资年会举办之前，腾讯将在海珠琶洲拿地建微信总部的消息对外传开。反复沟通后，广州和腾讯得到双赢结局：微信团队留在广州，广州收获一家高速发展互联网企业。

环顾海珠琶洲，当时只有琶洲A区地块平整，没有拆迁困扰。腾讯微信总部的到来引发了“蝴蝶效应”。唯品会、UC浏览器（随后被阿里巴巴收购）、YY语音和环球国际组团游说广州，成功在琶洲拿地建立总部。随后上海的复星集团和国美也加入了抢滩琶洲行列。至此，一个全新的“琶洲互

联网集聚区”从无到有闪亮登场。

当人们以为微信只是用来聊天、刷朋友圈的社交软件时，微信其实已经走得更远了。2015年微信正式上线“城市服务”入口，广州成为全国首个尝鲜“城市服务”的微信“智慧城市”，市民通过该入口就可以进行医疗挂号、违章缴费、招考查询、社保缴费，甚至报税也可以在微信上完成。腾讯将积极配合广州市电子政务云平台建设，为政府部门提供便捷安全的移动办公服务。微信城市服务、微信小程序、人脸识别、位置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将促进广州市政府在政务公开和政务创新方面的发展。腾讯将致力于医疗创新、交通出行、民生服务三大领域的“互联网+”业务的发展。其中，电子就诊卡、微信医保支付、电子病历、医学人工智能等医疗创新服务将在广州落地，为市民提供在线就诊全流程服务。人脸识别、电子证照、微信支付等能力将在社保、公积金、出入境、交管、民政等民生服务方面投入使用。

腾讯将与广州市政府在业务本地化、产业创新、政务服务、民生应用和创新创业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助力广州“IAB”行动计划（“IAB”指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推动广州产业转型升级。腾讯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和开放平台，利用广州产业园区、产业孵化器等优势，建设广州互联网众创空间，打造广州特色的全要素创业生态。



包容开放的广州深受外国人的喜欢

How does Guangzhou influence the world

# 时尚之城

时尚易逝，风格永存。

——(法)可可·香奈儿



生活在广州，好比阳光照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折射出无穷的光影，映衬着这座城两千多年古城命脉的涌动。广州简约而精致、随性而灵动、传统而潮流、世俗而时尚，有时候她很随意，却让人感觉很新潮，有时候她很讲究、却令人很自在。对于不同的人，广州有着不同的样子。假如你年轻时在广州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广州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这里满街骑楼，河涌波光粼粼，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左邻右舍相互问好、寒暄，守望相助，孩子们在骑楼下嬉戏、玩闹。沿街的老店井然而列，老板与客人也像日日相见的老友，一手递过日用品，一手拍着肩膀打趣、调侃。风声雨声欢笑声，声声入耳，响彻近一百个春秋，熟悉而亲密。

这里摩天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车水马龙，人群川流不息。夕阳下的广州塔熠熠生辉，夜幕下的珠江两岸流光溢彩，将这座城映照得五光十色。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登上珠江夜游的轮船，叹美食、听粤曲，在潋滟的水光和习习的夜风之中享受当下，憧憬未来。

如同一面千年古道，一面新式时尚的北京路，广州人的生活，传统兼具现代，包容推动创新，不断吸纳，不断前进。广州人的衣食住行、文体娱乐，推陈出新，花样更迭，真正影响世界的，是“变”中“不变”的广州。

——衣食住行的世俗与时尚

# 脉动 | 鲜活

| 第一章 |

## 齐“话”广州： 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方言

说到广州影响世界，怎能遗漏广州人的母语——粤语？

粤语，俗称白话、广东话，是全国诸多方言中使用范围较广、影响力极大的方言之一，一般通行于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海南局部、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华人华侨聚居地。广州方言属粤语广府片区，是粤语的典型代表。

她有着自己独立的英文名称“Cantonese”，既是中国内地的一种方言，又是港澳特别行政区、海内外华人华侨地区的官方语言。粤语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全球，影响力堪称中国方言之最。

### 粤语的开放与包容

粤语起源于秦汉时期百越民族与南下的华夏民族之间语言的大融合，成长于魏晋，定型于唐宋，完善于元明清。岭南一带因为地处蛮夷之地，与中原地区有五岭隔绝，使得粤语很早就与中原汉语、中古汉语的发展隔

离开来，独立发展，形成了一套与当今通行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很大区别的语音、词汇、语法体系。

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大批南迁，与百越民族融合，上古汉语“雅言”与古越语进行融合，同时兼并楚语、吴语，形成了最初的广东话（即粤语）。后来，魏晋南北朝与唐宋时期，民族大融合使得最初的粤语与中古汉语的差别逐渐缩小，也使得广州话充分继承了唐宋余韵。后来，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原汉语与粤语的分歧从此拉大。北京官话历经冲击，所保留的古汉语成分大大减少，而这些被普通话过滤掉了的古汉语成分，却在粤语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声调上保留了古汉语完整的九声六调，词汇中存有大量文言，语法结构经常出现倒置等。

将粤语的一些字眼直接写出来，经常会给人造成一种文言文的错觉。比如：食一吃；饮一喝；行一走；着一穿；翳一闷；损一破；面一脸；屋一房。大量的单音节词汇也使得粤语像文言文一样，形式凝练而语义丰富，比如蚁一蚂蚁，纽一纽扣，尘一灰尘，眼一眼睛，相一相片等。

除了承继古汉语余韵、吸收其他方言的特点外，以广州方言为代表的粤语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吸收外来语，这和粤菜的“中西合璧”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广州开放与包容的产物。

广州地处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商贸发达。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年代，这里也是全中国唯一与国外相通的地方。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促进了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大量的外来词融入广州方言。在粤语里，外来词占据着一席之地。普通话中的很多词汇，在粤语中，就像是英语的直译，例如：波（Ball）一球；士多（Store）一商店；菲林（Film）一胶卷；巴士（Bus）一公共汽车；贴士（Tips）一小费；的士（Taxi）一出租车；士多啤梨（Strawberry）一草莓；呔（Tie）一领带；妈咪（Mummy）一妈妈。粤语中还会出现粤语与外来语混杂使用的例子，如广州人习惯称呼女老师为

“Miss”，男老师或男警官为“阿Sir”，提到感觉时直接使用“Feel”等。

## 你说，我说，大家说

作为在广州土生土长的语言，粤语是广州人真正意义上的“母语”，是广州人接触并使用的第一门语言。粤语是广州人日常主要交流与表达的工具，承载着两千多年广府文化的命脉。

谈到粤语，广州人像聊起自家的孩子那般亲切与呵护。纵然现在随着城市的开放与现代化脚步的加快，普通话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工作与生活的首选，但粤语依旧是广州人心中的根。古人尚且“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对于广州人而言，粤语象征着大家对广州生活、广州文化与历史的认同感，就像每个广州人的出生证一样。它在某种程度上囊括了广府文化的特质：有着两千多年汉语雅言的余韵，抑扬顿挫，洋溢着汉语的声调之美，处处体现着汉语构成的巧妙与神秘；又充满市井烟火的气息，各种形象化的词汇与独具广府特色的用语生动活泼，悠闲地回荡在广州的街头巷尾，伴随着广州人的锅碗瓢盆，唱响一代代广州奏鸣曲；时不时还生出些外来语，引我们去发现语言融合背后的历史烟云。粤语古老、独立而开放多元，永远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广州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粤语，还有意识地将粤语引入更多的用途当中。以粤语为语言载体的音乐、戏剧、民间曲艺屡见不鲜，亦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与关注。在公交、地铁报站时，粤语也会与普通话和英语一起，为每个来到广州的人指引方向，不仅拨动着广州人的心弦，也让远来的朋友们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韵律。此外，广州还有使用粤语主播的广播电视节目，以粤语为主的公共社会活动等。还有许多民间学者热衷为粤语“正本清源”，除了鼓

励大家继续使用粤语、教孩子学习粤语之外，还有专门制定粤语的拼音学习、字词学习方案，试图规范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

不过，广州人向来顺势而为，从不刻意去规定什么。粤语是一门不停在变化的语言，它不具备“排他性”。这门传播范围极广、使用人口较多、十分开放与包容的方言，是广州文化最好的推介大使。透过粤语人们透视这片土地，寻找它的文化脉络，然后惊觉，这座以商业与外贸闻名的都城，两千多年来一直以淡定的姿态包容天下。

不同于其他沿海城市，广州对外来的文化一向来者不拒，文化发展像滚雪球越滚越大。秦关汉月与百族求生，唐宋长歌与番邦风情，明清理学与欧风美雨，在广州的时间轴上从来都不矛盾。从古至今，广州人既从博学鸿儒口中习得雅言，亦可从外国商人的讨价还价中学到不少洋词，这期间碰撞出的火花，坠入广州本地的土壤，便生成了粤语。时至今日，粤语也一直跟随着时代，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但永远在吸收创新的文化是不会过时的，承载着这文化的语言亦是如此。

## 粤语行走世界

在我国七大方言中，只有粤语，在华人华侨中被普遍使用；在世界各地不少国家的大中专学校里作为一种外语教授；在世界上不少国家电视、电台的广播中使用；在不少国家或地区还被用作书面语，应用于各类报纸杂志。据统计，全世界使用粤语的人数有7000多万，其中4000万左右来自广东本土，3000万左右来自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

第一代粤籍华人华侨在海外谋生、定居、发展家族，粤语也随之“落地生根”，成为许多外国人最早听到的“中国话”。使用粤语的华人主要集中在英、美、加、澳、新西兰、东南亚等多个国家或地区，据悉在澳大

利亚，粤语已经是使用人数排名第三的语言。事实上在海外，粤语如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一样，逐渐成为世界语言大家庭的一员。全世界使用法语的人数也只有7000多万，足见粤语的使用群基数不逊于一些知名的外语语种。

华人华侨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粤语，也广泛将其运用于商贸活动、文艺表演、社会服务、新闻出版与传播等，这大大提升了粤语的地位与影响力。以美国城市旧金山为例，因聚居的华人华侨多数使用粤语，旧金山的城市巴士甚至会提供粤语广播，这是美国为数不多开放的中文公共广播之一。亦有不少华侨华人主动进行粤语的公共教学，普及粤语，提高使用率，让粤语在“走出去”与“走回来”之间实现游刃有余的转换。

粤语是广州独有的密码，流淌着广州人日常的茶米油盐，折射着广府源远流长且开放包容的文化内涵。一声声“早晨”“唔该晒”“好嘢”里，人们可以看到既“不修边幅”又格外注重享受生活的广州人，看到淡定包容外来文化又坚守广州传统的广州人，看到一边在圣诞节喝啤酒吃炸鸡，一边在冬至夜全家喝汤吃汤圆的广州人。粤语映射着这座城的流动，它一直在变，发音有时会更为轻松简单，用词和语法会更贴近一些普通话的说法，但不变的是音韵里广州血脉的气息。因此，想要真正深入广州人的生活，还是得先花点时间琢磨一下粤语。

## | 第二章 |

### 食在广州： 美食背后的文化

“食在广州”，这句话足以证明广州美食之都的地位。粤菜作为一种菜系，包括了广州菜、潮州菜和东江菜，其中以广州菜为代表。如果把广州比作一棵树，粤菜就像树上伸出去的一根枝蔓，绿叶蓊蓊。两千多年的风吹雨打，水土酝酿，让一道道取材丰富、做法多样、生猛清鲜的美味，不仅在广州家家户户的饭桌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还在世界许多角落里，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

叉烧乳猪白切鸡，梅菜扣肉煲仔饭，这些从广州人口中不经意跳出的词汇，一点点构筑起一个现代化城市里传统民韵的内核。广州人喜欢闲来煮水叹茶，忙时“搵食”解压。所谓民以食为天，粤菜便是广州人心中的“天”。它一直暗藏在广州人生活的每个细节里，融入万家灯火时亲人的笑脸与叮咛里，飘散在新人相拥时一碗糖水的清香里。它不仅是广州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是这座城的脉搏。

随着粤菜在全国逐渐上升为几大主要菜系之一，随着全球各地一家家粤菜馆的崛起，外国人提到中国菜时总会想到粤菜，随着这两千多年一直不忘

包容的态度与菜系的不断创新，随着人们关于广州的记忆与情感化作一道道精致美味的菜肴，若有人问起：“广州有什么影响世界？”粤菜必定是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答案。

## 粤菜的成长与创新

西汉《淮南子》记载，世居岭南的越族人喜爱吃生食，岭南人烹食的物料相当丰富；到了东汉末年，一些世族亲贵为了吃“异食”有招募岭南庖厨，烹制奇特食材来进贡讨好的风尚。不过这只是吃个新鲜，还算不上正统的美味。唐宋时期，随着广州逐渐成为全国扬名的通商口岸，商业的繁荣带动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影响，烹调技术亦随着文化与生活的逐步发展得到了全新的提高。渐渐地，粤菜从“异食”走向“正食”。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农业和渔业的发展，海味河鲜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粤菜的舞台。据历史记载，这时候的水产品类型极为丰富，乌贼鱼、石鱼、蛇鱼、龙虾、水蟹、蚝、水母、鲟鱼、鳖鱼、竹鱼、江瑶柱一一登场，令当时的吃货们眼花缭乱。除了海味河鲜，时人还喜欢拿新鲜瓜果烹调入味，求一个口味清鲜。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进一步奠定了粤菜取材广、重清鲜的两大传统。

到了清朝，广州迎来了对外贸易最繁盛的时期，商旅往来频繁，官绅筵宴不断，给饮食业打了一剂最好的兴奋针。从此，粤菜跟随着广州的发展，走入了它的黄金时期。

借鉴与创新是广府文化保持新鲜血液的关键，广州人做菜也是同样重视包容，喜爱创新。在中国的各大菜系里，粤菜绝对是一个勤奋好学，谦虚上进的好学生。除了岭南本地的特色吃食，粤菜不断向其他菜系与世界



一盅两件“叹早茶”

名菜取长补短，一步步打通粤菜与世界的联系命脉，让粤菜真正成为广州的头号名片。

广州人不仅延续了粤菜从古取材广泛、口味清鲜的两大特色，更是从中原各地的烹调方法中取经，如煲仔、油爆、火锅；而且结合了广州本地的水土特点，做出符合当地口味又紧随潮流的新菜式。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古至今，国内外商人、游客来往频频，带来了各地乃至世界的美食，广州人趁机吸取了西方的调料与烹饪方法，让粤菜焕发出“国际化”的风貌。东南亚的咖喱、胡椒，西方的沙律酱、橄榄油，变成了粤菜厨师的常备调料；世界各地的食品，如西方可口的面包与蛋糕，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还有数不清名目的珍奇海鲜，纷纷加入粤菜的大家庭。

尤其是西方的烹调方法，以空气热传导为基本原理的烤、扒、焗、串烧，和以油传热为主的煎炸深深影响了粤菜的烹调方式。前者酝酿出烤乳

猪、香煎小牛排、中式猪扒、铁扒串烧；后者催生了软炸白花鸽、素烧鹅、香煎茄子、香煎韭菜饼等经典菜肴。此外，从日本菜中学来的锡纸包和铁板，无疑给粤菜增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粤菜博采众长又集齐大成。在20世纪30年代，名厨梁贤在巴拿马国际烹饪比赛会上荣获金质奖章，号称“世界厨王”，粤菜渐渐开始扬名海外。作为粤菜的中心，广州成为世界历史悠久又活力迸发的美食之都，“食在广州”从此家喻户晓。

## 粤菜里的城市性格

### 无“鸡”不成宴

广州人的务实与好钻研的特点在粤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粤菜一方面选料丰富，不分贵贱，物尽其用；另一方面又极其讲究，在同类原料中，厨师们极力挑选出最好的一种下锅，力求能烹调出理想的味道。粤菜的口味讲究鲜嫩爽滑，材料上讲究优质新鲜，做法上喜欢猛火快炒，原料刚熟便可上碟，力求菜品鲜中带嫩，嫩中带爽，爽中带滑。

选材的广泛与工序火候上的讲究让粤菜具有相当大的选择性，同样的原料可以有N种做法，而且不带重样。最能代表广州人能吃又会吃的，当属是“吃鸡”了。

据说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就有几百种之多：路边鸡、清平鸡、市师鸡、花雕鸡、手撕鸡、红葱头蒸鸡、脆皮鸡、豉油皇葱油淋鸡……所谓“无鸡不成宴”。如果说粤菜是广州面向世界的名片，那“鸡”就是粤菜中的金字招牌。相传一家粤菜老字号做鸡，不用鸡胸肉、腿肉，单选鸡皮配上虾胶烹制而成，脆滑爽口，称为“江南百花鸡”。连鸡皮都被钻研出独特的门道，粤菜中的“鸡”还真是花样百出又不一而足。

白切鸡与盐焗鸡是群鸡中最有名的两道菜。白切鸡本身的名气已不逊色于粤菜大类，从取材到摆盘上桌，每道工序无不体现着粤菜的“讲究”。取尚未生蛋、两斤以下的小母鸡，洗净后用开水浸熟，待冷却后涂油、摆盘，要保持鸡的造型上桌，配上用姜丝葱末研制的调料，才算大功告成。起先不少外地朋友觉得白切鸡的味道并没有特别之处，还经常在鸡骨里发现鲜红的骨髓，瞬间穿越回“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因而不大感冒。后来人们才明白，一旦骨髓熟透，便说明这只白切鸡火候太过，鸡肉煮老了，因此掌握火候分寸的功夫可不得有马虎，这是道技术含量杠杠的菜。

相比白切鸡，盐焗鸡不分南北，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盐焗鸡通常是把鸡洗净，弄干水，然后用炒熟的生盐把鸡焗熟，是一道兼济中西烹饪手法的名菜。较之白切鸡，盐焗鸡的工艺更为烦琐，对调料与烤炉要求也很高。虽然现在出现了一种将调料一抹，直接煮熟白切的山寨手法，但精益求精的粤菜并未舍本逐末，依然有不少小食店用心创新，制出青胜于蓝的惊喜。

### 叹早茶：粤菜的日常表达

喊上三五好友，或叫一家老小，齐聚大大小小的茶楼或馆子，点一盅清茶，尝几道点心“吹水”看报，温馨又逍遥——这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一天的正常打开方式。

广州人将其称为“叹早茶”，“叹”有享受之意，喝茶并不是重点。广州人喝茶讲究“水滚茶靚”，还需要一大批与各色好茶相配的粤式茶点。琳琅满目的茶点是粤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虾饺干蒸糯米鸡，肠粉猪红叉烧包，随便去一张广州人清晨齐聚的桌子上瞄一瞄，都让人垂涎三尺。这是广府文化最亲切的表达。

叹早茶是广州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环。哪怕是在“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样分秒必争的时刻，广州人也乐享美食中的清闲。与今日广州发展的

“快”相比，这似乎有些背道而驰，可恰恰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多元化。薄皮鲜虾饺、干蒸、烧卖、糯米鸡、粉果、芋角、马蹄糕、叉烧包、蟹黄包、奶油鸡蛋卷以及名小吃肠粉、炒河粉、艇仔粉、及第粥、猪红汤、伦敦糕、萝卜糕、咸水角、凤爪、卤牛杂、薄脆……上至六七十岁的阿公阿婆，下至在快生活里抽不出脚步的年轻职场族，都对这些多如繁星的名目简直不能更熟悉。周末假日，不管吃了多少次，还要放开胃口，尽情享受一回。

诸多茶点里，粥是粤式早茶的精髓之一，甚至不少食客把粥看作是广州人的饮食至尊。广州人戏称“粥粉面饭”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粥”排在榜首，可见其在广州人心目的分量了。在全国各地的粥品中，广州的粥名目繁多。尤其是用煮开的明火白粥做底，放入各种新鲜配料，现煮现卖的生滚粥，风味独特。本地老广与外来的朋友们都叹为一绝。

粤菜向来求变求新，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变的是广州人对美食的喜爱与包容，对生活的热情与享受。因而，粤式早茶久经沙场而不衰，融入粤菜经典菜式中，化作广州生活的一大标签。在广州过周末，如果不喊上家人或朋友去茶楼喝个茶，总感觉缺了什么。它渐渐成了广州生活的一个品牌，并随着城市的发展被推向世界各地：在英美的唐人街或东南亚的华人聚集地，也不乏粤式早茶的身影；在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很容易找到广东茶楼；就连偏远的南太平洋小岛上，也经常看到中餐馆的门前挂着“天天早茶”“全天供应早茶”的牌子。作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粤式早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 老火靓汤：“住家饭”的招牌

“住家饭”是广州人的一个地道老词，特指家里人做的且只有在家里才能吃到的饭。除了各大酒楼与小店的经典粤菜，茶楼里琳琅满目的粤式点心，广州人另一项爱吃的就是“住家饭”。

晚饭前，一碗香味四溢的老火靓汤，是对劳碌了一天的人们的最好慰藉。老火汤在广州人的“住家饭”中地位可谓神圣，成为广州人心中“家”的符号。重生活品质的广州人深谙饮食养生之道。广州春夏炎热潮湿，秋冬干燥，水质较硬，再加上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快，人们不但要承受繁忙的工作压力，还要应对内心越发沉重的精神压力，若不注重在生活上多加调节，身体很容易出现问题。老火靓汤便是老广人进行日常饮食调理的法宝。

老火汤即用瓦煲与小火细熬慢炖出来的汤，炖制时间愈长，汤水味道鲜美。广州人会根据时令与人的身体状况，采用不同的食材，或选些温和的中药材，一方面注重口味鲜美，另一方面让汤水起到防治时令疾病的功效，或强身壮体，或养颜美容，或清补滋润，或消暑清热。老火汤是广州人平衡身体状态的得力助手。在广州，“先喝汤，后吃饭”已经成为各大宴席与家庭晚餐的传统。

跟着最早出国谋生的粤籍华侨，粤菜在世界各国安家落户，成为外国人最早认识的中国菜系。有人曾说，世界上凡有华侨的地方，就有粤菜。

以包容与创新为精髓的粤菜，综合了中西的烹饪特点，结合本土气候与食材，永远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粤菜逐渐成为扬名全球的大菜系。在国外，相当一部分中国菜馆就是粤菜馆，英美唐人街更经常是粤菜的天下。而随着广州籍华人与华侨的增多，广州人的日常饮食，如粤式早茶、煲老火靓汤等，近至东南亚，远到欧美，深深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成为外国人透视中国文化、岭南广府文化的一面放大镜。

### 亦古亦新的生活习俗

在普通的生活小处，广州人也能搞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广州民俗传承了岭南文化的一贯特色，在多年来的飞速前行中不忘传统，一直重视各

种传统习俗的承继，并翻新花样，取其精髓，去其糟粕，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化都市里，拥有全新的风貌。

比如传统的迎春花市是广州最著名的风俗，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广州“花”文化与春节文化的双重代表。据调查，新老广州人都认同迎春花市是广州过年最重要的民俗，而无论是广州本地人还是父辈移居、已辈定居的新广州人，都很喜爱迎春花市。在这个过程中，迎春花市无形间增强了人们对广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维系广州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情感纽带。随着时代的发展，花市的花样也不断翻新。手机花市、电子花市等新形式的出现，便捷了人们的生活，也让传统节庆与当下生活节奏相契合，有利于推进花市发展；近年来广州市荔湾区的水上花市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延续了岭南水乡的历史余韵，还给花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冬至也是广州人一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广州，人们相信“冬大过年”。以往旧时广州人过冬至，要敬神明、拜祖先、饲耗、食汤圆、做腊味糯米饭、剖鸡杀鸭炖八珍，还要给家中的牲畜准备一顿香喷喷的糯米饭。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大大加快，在冬至祭祖供神的人家少了，但广州人依然秉持着“冬大过年”的传统，阖家老少围桌而坐，吃一锅热气腾腾的汤圆，或围在一起“打边炉”、在酒楼置一两桌美食，一千多年过去，冬至在广州人心中依然是家家户户团圆的神圣时刻。

赛龙舟是广州最盛大的端午节庆活动。广州人将赛龙舟称作“扒龙船”，并有着“初一龙船起，初二龙船忍，初三初四游各地，初五龙船比”的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每年五月初五，河涌两岸人头攒动，一条条龙舟绑着红绫，在珠水上肆情竞逐，浪花飞溅。1994年，广州市政府将农历五月初五设做龙舟节，广府龙舟渐渐扬名于外。广州及附近的佛山、顺德等地的龙舟代表队，经常参加海内外的龙舟大会或职业性锦标赛，并数次夺魁，将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活动发扬光大。直至2011年，“扒龙舟”更是被收入广

州市的非遗目录里，成为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除了这些知名的节庆活动，广州人的许多日常生活习惯，也随着海外移民的步伐带入了世界，被更多的人所知。其中最有意思的，便是广州人对“意头”的讲究。

意头，即吉利、好运之意。广州人讲意头是出了名的，日常生活里，大到购买房产时选择方位的讲究、举办婚礼时对时辰和诸多习俗的讲究，小到平日说话里避讳死、散，讨个口彩的讲究，衣食住行处处要讲求吉利。与其说广州人封建迷信，倒不如说在千年的开放与创新的浪潮里，在这个被誉为“南大门”的现代化大都市里，广州人依然会坚持本土的一些传统风俗习惯。

如迎春花市，处处彰显着广州人对意头的讲究。花市上的花背后都有自己象征的彩头。比如买一盆金橘放在门口，象征大吉大利；桃花寓意大展宏图，是广州人必买的品种；还有水仙花、蝴蝶兰、步步高等花卉，因为代表平安如意、万事吉祥，也是广州人买回家装点新年的不二之选。花农们给鲜花取的名字，也力求叫起来既吉祥如意，又朗朗上口。如凤梨叫“招财进宝”，佛手叫“黄金果”，还有富贵竹、发财树、节节高、长寿花之类，光是听名字，就让人感觉到洋洋的喜气；买花讲价也要讲究意头，如“3”“8”这些数字，寓意发财致富、生生猛猛，可以多用；但像“4”，谐音不吉利，花农与市民们都避而远之。

逢年过节，做菜也要讲意头。像烤乳猪“鸿运当头”、清蒸鱼“年年有余”等，已成了家喻户晓的“意头菜”；广州人将压岁钱称作“利是”，“利是”有“利事”之意，寓意大吉大利。红包是“利是封”，将吉利封存，祈求顺心如意；再诸如舞狮采青等庆祝活动，更是有讨吉利、求多福的含义。

哪怕在广州人的一句口头俗语里，我们都能听出对意头的执念。粤语

里将草莓叫作“士多啤梨”，因为“莓”与“霉”同音，直呼会触及霉运；广州重视商业，做生意的最怕“蚀本”，因此与“蚀”同音或近音的字最好都要规避。如“吃饭”为“嗌饭”，“舌”为“𦘒”等；血乃死亡的象征，更是不吉利的东西，广州人以“红”字代之，如把“猪血”叫作“猪红”，“见血”叫“见红”等；破、散、碎都被人们视作不祥之兆，广州人从不说“雨伞”，而说成“遮”。有东西摔碎了，广州人会赶紧来一句口彩话“落地开花、富贵荣华”，化解戾气，求得平安。

广州人把“苦瓜”叫作“凉瓜”，“鸡爪”被称作“凤爪”，“狗肉”成了“香肉”，“竹杠”变成“竹升”……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每一个词汇都折射着老广们对生活如意顺遂的期盼。

除此之外，为求吉祥，广州人喜好遇神则拜。佛教、道教，抑或是神话传说里的主神，在广州的庙宇里都是香火不断，如广州的佛教名刹光孝寺、道教圣地三元宫、供奉妈祖的天后宫、供奉海神祝融的南海神庙等。许多广州人家里也会供奉土地或祖先的牌位，每逢节庆或红白之事都会参拜，祈求祖先或地神保佑子孙后代，代代平安。

广州人讲意头之烦琐，不仅让不少海内外友人感到眼花缭乱，就连许多年轻的本地人都未必弄得清楚，但他们还是坚持代代传承这些鸡毛蒜皮的意头，乐此不疲。这些生活日常的细节，融汇的是广州最原汁原味的生活人情，也是岭南地区数百年来不衰的重要文化遗产。最日常的生活，最广州的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同理，越是融汇了地方特色的文化，越能代表广州走向世界。随着海外移民的步伐，它们被带往世界各地，成了一面万花镜，映照出广州人在瞬息万变中坚守不移的晨夕。

### | 第三章 |

## 时尚魅力： 一席流动的盛宴

### 西化与新潮，时尚的桥头堡

如果说粤菜是广州的名片，粤语是广州的密码，那广州服饰与时尚则是深入解读这座城的暗语。从民国时的衣香鬓影、蓝白校服、中山长褂，新中国成立后渐渐走向多元的服装新式样，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服装大业与品牌设计，再到现在本土设计师各种创意无穷的新潮牌，岁月如梭，衣罗轻舞，折射着广州人生活日常的品格与追求：实用、休闲、独立、洒脱、重品质……这些衣帽、首饰、配饰，融入广府生活中的细节，是广州传统孕育的历史暗号，亦是这座城开放、包容与创新的明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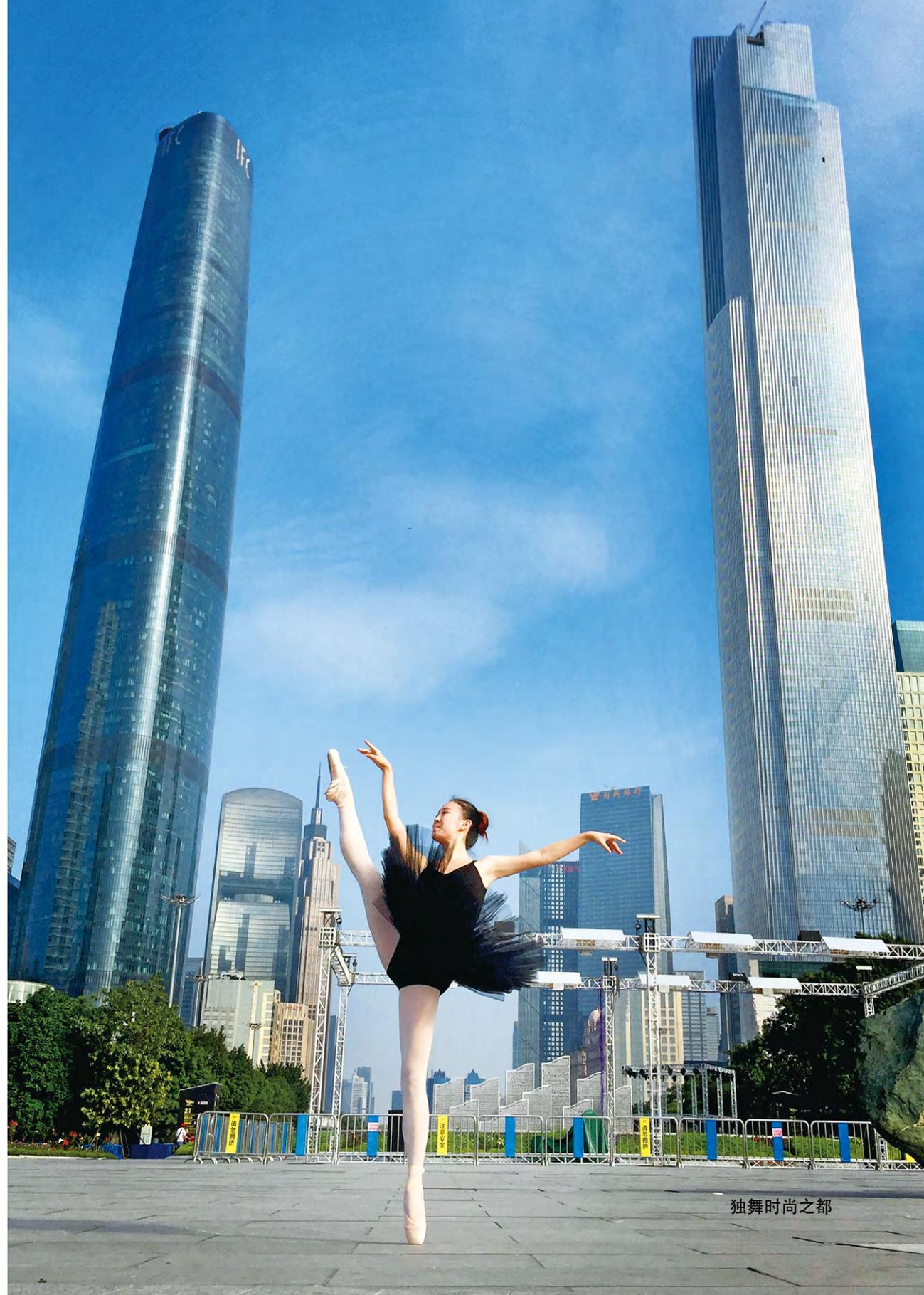
清末民初，广州作为清朝时期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生活中的洋元素越来越多。随着民国的建立与西方文化思想浪潮的席卷，当时广州的青年们在着装上也开始追求西化，将传统的长袍马褂加以改造，讲究简洁新潮。中山装、西装、学生装等成为新式青年的心头好。大批年轻的女性也走出家庭藩篱，来到公共的城市空间学习或生活。她

们所追求的服饰也有别于传统的汉装或旗装，倡导新式文明，以简洁实用又不失大方美观为主。当时广州女性不仅像北京上海一般流行穿旗袍，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兴起一股“文明新装”的风潮。“文明新装”，特指女子不化妆、不缠足、不戴配饰、剪短发，穿上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与黑色长裙，裙子略短几寸。这种“文明新装”被认为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产物，在广州青年中流行一时，影响甚广。

1927年，广州掀起了一阵女子剪发的热潮。取代传统的麻花长辫的，是斜掠钩发式、覆额钩发式、后掠垂叶式等各种不断翻新的短发造型，于是乎，点缀这些造型的新式配饰与衣装频繁出现在广州城的大街小巷，伴随着新时代的气息，城市焕然一新。与剪发热潮同时进行的是“围巾热”。那时广州的女生们，从半冷不热的初秋开始，就流行在薄薄的外衣上套上一条围巾，长短与颜色因人而异，这成了最炙手可热的配饰，连不少男生都冒着被人嘲笑像驼背的风险，也要尝尝新鲜。到了20世纪30年代，围巾、手巾、手袋等小巧又精致的饰物已经在广州的时尚圈里广为流行，是当时摩登女性的标配。爱时髦的女子还用新型的西式手表来替代岭南传统的金玉手镯，成了广府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较之于民国时期五光十色的摩登之都上海，广州虽不是当时全国的时尚中心，但在当时，尤其是1925—1927年间作为华南政治中心的广州，市民们政治热情高涨，对生活也充满着改造与创新的动力。一方面，广州人不断吸收外来的时尚新潮，另一方面又在与岭南传统审美的冲突和交融里，创造出兼具实用功能与新潮外形于一体的广州特色时尚。

时光缓缓流过，从红色的革命岁月到日寇的沦陷区，再到迎来解放的曙光，历经苦难的人们带着新的希冀重新投入新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的审美热潮中，广州也不能免俗。不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再一次打开了时尚之窗，这座创新之城的活力与光



独舞时尚之都

彩随之迸发。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广州不知不觉中已成为全国时尚的桥头堡之一。1993年1月，由广州市越秀地产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正式开业。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家批发市场迅速占据广州服装业的龙头地位，影响力远至黑龙江、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被誉为“白马大厦，服装天下”。全国各地的客商翩然而至，据统计，白马服装批发市场的日客流量破万，年交易额高达20亿元以上，声名远播，乃至全球五大洲的服装市场都与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有过各式各样的合作。这使得以白马服装批发市场为主的服装业，正式成为广州在20世纪90年代的支柱产业之一。

广州有着“时尚会展之都”的美誉，时尚界会展的数目与质量更是毫不逊色。每年由广州市政府举办的广州国际服装节，除了广州本地的服装品牌外，来自五大洲各地的知名服装品牌都会参展；意大利、葡萄牙、韩国、法国等多家国际知名品牌的负责人与设计师齐聚一堂，分享最前沿的流行趋势与设计理念，让广州的服装设计在坚持实用传统中不断融汇创新，引领南派服装的时尚潮流；自2010年起举行的白马品牌巡展，每次展览都会吸引200多家时装品牌的参与，逾万款潮流新款现场展示，不仅在国内时尚界备受瞩目，也吸引到了国外众多品牌设计师的关注。

面对生活，广州人的新鲜点子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能把吃的钻研出那么多门道的人，自然也能将自然、独立、潇洒、新颖的时尚创意融入实用的衣帽与配饰里，打造属于广州创意的潮流品牌。曾有知名设计师感叹，历届全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称号得主和历届金顶奖得主有150多位，其中过半来自广东，而且集中于广州与深圳地区，可见广州设计界亦是人才荟萃。2011年，广州的多家本土潮牌自发成立了广州原创品牌联盟CANTONZ，这是广州年轻的、生机勃勃的原创品牌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合作与交流。这些品牌里，有深受美国街头文化影响的DABOMB，从美国西海岸文化里的宗

教、涂鸦、文身等街头元素中获取灵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重视视觉效果、色彩对比强烈的TEEN TEAM；有追求高端优雅与街头风格相融，款式简洁、风格别致的潮牌Crafted……年轻的设计师团队们聚在一起，在广州开放、包容、多变、求新的文化氛围里，吸纳更加新奇流行的时尚趋势，坚持自己的设计理念与美学风格，为广州的时尚注入了全新的血液，也为广州人的生活带来自由洒脱的青春气息。

如果说粤菜和粤语是世界深入挖掘广州生活与文化的秘径，那服装与时尚便是一扇世界透视广州生活的窗户。这座城市勃发的生机与活力，蕴含的智慧与创意，在各色流行的时装款式与潮流新品中交汇碰撞，绽放出灿烂的火花，向世界映照出广州的朝气。广州人的生活花样百出，人们尽情享受，却不会因此感到迷惘乃至空虚。正如不管买了多少新衣服，广州人依然会喜欢T恤衫、牛仔裤，一双人字拖，走到街头的酒楼或大排档里大快朵颐。

## 白天鹅：现代文明的一扇窗口

诞生于1983年的大型现代化豪华酒店白天鹅宾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成长，把国际先进的酒店管理经验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融中西管理模式于一炉的酒店管理之路，成功铸造了享誉国内外的“白天鹅”品牌，跻身于世界一流酒店行列。

20世纪70年代末，在很多人对改革开放还半信半疑的时候，霍英东先生毅然回国投资，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兴建和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年后，合作期满，资产归广东省政府所有，2004年7月白天鹅宾馆正式由省国资委监管。霍先生从一开始对白天鹅项目就没有功利之心，而是出于爱国爱乡之意。这从他的投资方式、选址中就可以看出。

当初，他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中选一个地方建造这家酒

店。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既无太多的游览景点，也没有繁荣的经济，但它毗邻港澳，是沟通港澳与内地的桥梁，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而且从社会效益与政治效益的角度来看，广州是最需要建涉外宾馆的地方，因此他选择了广州。

在霍英东看来，白天鹅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宾馆，它更是坚定中国人改革开放决心与信心的一个品牌。白天鹅宾馆的成功，推动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世人看到了投资中国的希望。

白天鹅宾馆一路走来，坚持的是改革创新的精神。从诞生之日起，霍先生就提出了白天鹅宾馆的“三自方针”，即“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实践证明比起世界一流酒店，白天鹅宾馆毫不逊色，经过实践，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既代表国际先进一流酒店管理水平又具中国特色的酒店管理模式。开业第三年，便以出色的酒店管理与骄人的业绩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吸收为中国第一家成员单位。

1983年2月6日，开门营业的第一天，白天鹅宾馆便打破酒店行规，店门大开，全方位开放，允许百姓自由出入。一时间，广州市万人空巷，市民蜂拥而来。霍先生还认为，“白天鹅”全方位开放，既是一种品牌的宣传，同时也可以聚集人气，有了人气，才会有财气。这一经营理念，在当时中国的高级宾馆中，是绝无仅有的。

白天鹅宾馆凭着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了中国酒店业史上的18个“第一”：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内地与香港合作酒店（1979年7月）；中国第一家四门打开对群众开放的酒店，成为宣传改革开放的窗口（1983年2月）；中国第一家全面实施电脑化管理的酒店（1983年2月）；中国第一家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的酒店，成功跻身于世界一流酒店行列（1985年7月）；第一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酒店（2000年），至今仍是唯一一个使用在宾馆服务上的中国驰名商标

标；第一家成为“移动信息化酒店”（2008年）等。

每一次开创的第一，都代表了白天鹅的每一次突破，每一次的突破都开启了中国酒店业的每一页新篇章。难怪霍英东对白天鹅有以下的评价：“白天鹅不仅仅是一家酒店，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见证。”

随着世界各大著名品牌纷纷抢滩广州高端酒店市场，广州地区酒店业迎来巨大挑战。白天鹅宾馆以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用新思维、新路径、新举措来谋划了未来之策，推动新一轮大发展。2008年8月7日，广东白天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2010年初，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打造白鹅潭经济圈，白天鹅宾馆顺势而为，厘清更新思路，提出了“首善之点”创建构想。改造后的白天鹅宾馆，以“首善之点”新典范为引领，以白天鹅宾馆为龙头，以沙面岛为主体，建设时尚高端、现代水准、欧陆风情和岭南人文历史风貌的地标性建筑群和旅游休闲商务区。

## 广州会议与世界论坛

2017年12月6日至8日，《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召开，主题为“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这也是该论坛自1999年诞生以来第五次选择中国城市。就这样，在世界经济大变局中，《财富》全球论坛迎来了广州时刻。

如果分析22年来共14届《财富》论坛的选址，会发现几乎每隔一届就会选择一个亚洲城市（两年一届的亚欧首脑会议，也有类似规律）。而从1999年在上海的第5届论坛算起，10届论坛里有5届是在中国召开，充分说明了“中国市场”和“中国会议经济”对于论坛嘉宾的吸引力。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对于中国和广州来说，本届《财富》全球论坛更有特别的意义。

时隔4年，《财富》论坛重回中国，距离上届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财富》论坛，已经过去两年有余，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让许多人目瞪口呆。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上届《财富》论坛的预见性——它在2015年就将主题定为“赢在颠覆性世纪”。

“2016年才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法国学者尼古拉斯·当泽尔认为，一个没有规则和界限的国内政治秩序，一个缺乏预防无序状态所必需的可靠标准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纪的新常规。当“全球化大船”航经“21世纪的政治风暴角”时，原来的航海图已经不管用了；坚持“探索新航路”是正确的，但航向、航程都需要重新设计。2016年，许多顶级机构预判错了美国大选，这给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在“熟悉的世界消失不见”之际，财富500强代表们有愤懑、疑惑和反思，亟需倾诉、表达和总结。

“春江水暖鸭先知”，相较于建制色彩浓厚的G20峰会等政府间组织，凝聚了全球商界精英的《财富》论坛，更能及早地洞察市场变化，并灵活地表达民间的立场。

“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是广州《财富》论坛的主题。论坛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最大城市广州召开之前，先在达沃斯、巴黎、香港等全球12城开展宣传推介会，并筹备在广州设立《财富》论坛创新奖和《财富》国际头脑风暴科技大会。这些举措正是看中了聚合式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可能超越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高地的爆发式潜力。

22年前，首届《财富》论坛在新加坡奏出“同一个商业世界”，吹响了经济全球化的强音；而本届《财富》论坛，可以让我们看到广州“打造全球重要的国际交往中心”、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风潮”、世界“探索崭新的财富大陆”的宏大愿景，并领略其不同凡响。

本届世界经济论坛，众多《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政府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齐聚广州，以论坛为平台，探讨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及创新的方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构建世界经济新格局。

由于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广州《财富》论坛成为重要接口。在短短的半年间，从北京到巴黎、香港、纽约、华盛顿、东京、新加坡、台北、芝加哥、慕尼黑、伦敦，广州《财富》论坛在全球举办了11场推介会，中外近1500家企业参与，《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成为“标配”。11场密集的推介会向世界传递“广州故事”，也引发了全球媒体从各自视角报道广州、解读中国创新案例的高潮。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广州的“显示度”正在不断提升。《芝加哥论坛报》以“美国企业在广州”为视角，向全球读者展开了广州“I.A.B.”蓝图：作为拥有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中国重点城市，广州基础稳固，能够推动机器人和智能设备产业的未来发展。德国《商报》介绍，“中外合作区建设行动方案”于2016年开始实施，广州将自己的聚焦点对准了美国、欧洲、以色列、韩国等先进制造业国家和地区，建立汇集了近4万项国外先进技术的企业项目库。随着广州关注度的日益提升，世界知名媒体也在寻求与广州的进一步合作。比如，全球第一财经新闻媒体CNBC特别制作了《live Guangzhou》的专题片，并向广州提出希望在广州建立国际演播厅的建议。面对新的全球化进程，广州抓住机遇，用国际化语言说出“广州故事”，力图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更强大的功能。

近年来，广州举办、承办国际会议数量在亚运会后大幅提升，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并提出打造高端国际会议目的地。2015—2016年，广州举办了近50场高端国际会议，平均每月有2场重大国际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广州不断抓住机遇用国际化语言说广州故事，不仅积极参加冬季达沃斯、夏季达沃斯、博鳌亚洲论坛、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等国际顶级会议，成果

丰硕，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由“局外人”变成“合伙人”，还加入国际性城市组织或机构，站上国际舞台“借船出海”，积极参与全球城市治理，提升国际城市话语权。目前，已有59个国家在广州建立了领事馆，领事馆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作为世界大都市协会的创始会员和世界城地组织联合主席城市，广州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交往和组织核心事务研究，并开创了中国特色城市参与国际活动的新模式，进一步巩固了广州代表中国城市在UCLG的核心领导地位。“2020年世界大都市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将在广州举行！”随着世界大都市协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长德尼思·柯德尔在大会上宣布申办结果，全场向广州代表团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也是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2018年世界航线发展大会、2019年世界港口大会落户广州之后，又一项高端国际会议与广州“牵手”。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大会被誉为“世界城市决策者盛会”，每3年举行一次。一直以来，广州充分发挥特有的城市外交资源优势，活跃于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城地组织等国际城市多边组织，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交往和组织核心事务研究，极大地提升了广州的城市国际话语权，独创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简称广州奖）、三城经济联盟等，利用各种国际平台和渠道讲好广州故事，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 创意产业园的勃兴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新知识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具有高附加值、高度融合性、高度创新和集约型特征的新型产业，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在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

广州市的总体创意产业实力在全国位居前列，在打造国家中心城市过程

中，尤其是广州开展旧城改造与“退二进三”产业升级以来，各种创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蓬勃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涵盖文化、研发、设计、咨询和时尚消费等5个大类，包含工业设计、电影电视广播和录像、咨询服务等23个种类的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创意产业体系。其中软件、动漫和工业设计成为广州文化创意产业最大亮点，设计类和咨询类创意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广州目前共有各类文化产业园、创意产业园约62个，其中国家级文化产业园6个，省级10个（包括4家省直文化单位），主要分布在越秀、天河、番禺、海珠、荔湾、黄埔等区域，主要有羊城创意园、T.I.T、289艺术、创意大道、信义会馆、华创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园区，正成为广州经济转型的亮点和经济增长点。全市文化产业园入驻企业近3000家，形成了文化创意、动漫、工业设计、广告等产业集聚整合，相关产业整体发展的局面。

广州文化创意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多与旧建筑、旧码头、旧厂房的改造利用相结合，一般属于广州实施“三旧”改造的项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用地往往来自该项目中的低效用地（旧厂房、旧城镇、旧村庄，约有100平方公里左右），这种新旧结合既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城市的历史风貌，又创造了新的价值。

2017年8月发布的《广州蓝皮书：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广州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487.7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2.73%，在国内主要城市中处于前列，这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广州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羊城处在传统与国际化环境滋养中，在广州市政府旧城改造和“退二进三”政策出台的契机下，原来分布在城区内大大小小的旧厂房迎来了它们的春天。各个创意园吸收以创意为经济利益点的企业入驻，形成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力求构造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发挥集聚效应，推动各个企

业的发展和整体园区竞争力及影响力的壮大。入驻创意园的企业以服装设计、工业设计、动漫、建筑、广告策划、现代艺术、摄影和影视为主。

羊城创意产业园是旧工业转变为文化产业的成功范例。经过四年的培育和发展，羊城创意产业园获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功晋身“国家级”，是目前广州唯一一家国家级的创意产业园。目前园内进驻的企业有60多家，以文化和设计类企业为主，且凭借良好的艺术氛围多次成功主办大型文化创意展示活动。

在广州纺织机械厂原址改造的T.I.T创意园，则继承了纺织工业和岭南纺织服装业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服装文化和时尚创意成为其最大特色。T.I.T创意园以服饰、时尚、创意、文化、艺术为主题，提供新产品发布、时尚设计、信息咨询、专业培训等多功能服务，最终成为集聚服装创意的高端要素和引领文化时尚的全国知名的中心领域，成为引领时尚文化的风向标。

289艺术PARK，由原生活楼、生产楼、印报楼、印务楼组成，过去，《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农村报》，带着墨香从这里的印刷车间走出289号大院，赢得在国内、国际上的盛誉；2016年起，以“文创+科技”、互联网融合消费、体验、展演、办公、孵化、投资，成为创新的人文艺术生态园区，成为一站式艺术生活消费体验目的地。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这是一个由广州市文联和南方报业289艺术倾力打造的文艺志愿服务创新平台，地处广州核心地带，占地3万平方米，包含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影视等14个空间。自2016年启动以来，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已开展文化惠民活动400余场，“跟随二十四节气诗意生活”“大师下午茶”“大师艺术课”“生活艺术大家谈”“生活美如诗”“花样生活节”等品牌深受市民喜爱和参与。全国、省、市700余名艺术家、上千名文艺工作者、文艺志愿者和4万多名市民参与互动，超过200万市民通过新媒体

传播了解和体验空间的活动内容。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已成为广州城中“永不落幕的艺术发生地”。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进行了四大方面创新：创新领域，延伸手臂，推出新时代文艺为民新平台；创新机制，常态运行，打造全天候文艺惠民新天地；创新形式，荟萃名师，满足多样化文艺乐民新需求；创新渠道，孵化复制，拓展各区域文艺育民新空间。2017年11月25日，广州文艺市民空间被授予全国首个城市“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基地”，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姜昆、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廖慧进行授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前光来到空间，与艺术家、市民一同体验惠民活动，肯定空间是全国文艺为民的典范。广州市文联“一家亲”文艺志愿服务项目荣获2017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广州文艺志愿者协会荣获2018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在全广州一枝独秀。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是广州市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探索，也是广州市文联拉近艺术家与市民距离、提升文艺服务的探索。未来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将继续加大“文艺为民”文艺志愿活动的探索力度，为服务人民群众、服务文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为传承岭南优秀文化、打造广州文化软实力、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发光发热。

| 第四章 |

## 冲出亚洲： 广州恒大与体育精神

广州在体育上向来是强市，不但有着良好的体育传统如武术、龙舟，还有着良好的民众基础，尤其是2010年广州亚运的成功举办。但最为提振士气、也足以代表广州的是恒大足球王朝的构建。

### 广州亚运：拥抱亚洲与世界

继北京1990年举办第11届亚运会之后，广州成为中国第二个取得亚运会主办权的城市。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洲运动会，被誉为有史以来最精彩、最完美的亚运会。广州亚运会以“激情盛会，和谐亚洲”为口号，会徽则以广州的象征——“五羊雕塑”为主体轮廓图案。跳跃的火焰，灵动而飘逸，展示出生命的力量。

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唤起了全广东人民的热情，自提出申办亚运会的申请开始，广州市就开始了全民动员，尤其在申办成功之后，广州调动了全市乃至全省人民的集体力量，从场馆和道路建设、火炬传递活动、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开闭幕式筹备、志愿者招募和训练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仅以比赛场馆而言，除了主体育场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之外，广州体育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越秀山体育场、广东省体育馆、广东省人民体育场、燕子岗体育场、沙面网球场、黄埔体育中心、广东国际划船中心、芳村体育中心、大学城体育场馆、花都新体育馆、花都区体育中心体育场、番禺英东体育馆、番禺英东体育场、宝岗体育场、南沙体育馆等17个分场馆全部投入使用，堪称一场盛大的全民体育大赛。

2010年11月12日，第16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广州海心沙隆重举行。金秋羊城，和风习习，百花绽放，为各国运动员和游客们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从11月13日上午8:30中国武术运动员袁晓超在武术男子长拳比赛中以9.78分成功卫冕，摘得首枚金牌，到当天中国选手沈宏、梁瑜洁获得华尔兹舞单项冠军，取得中国军团亚运会史上的第1000枚金牌，从张琳大战朴泰桓到乒乓球女团决赛，从斯诺克男单决赛到羽毛球男单决赛，从飞人刘翔以13秒09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成功卫冕并成为亚运会该项目历史上首位完成三连冠的运动员，到激动人心的男篮决赛、女排决赛，中国军团表现出了出色的素质和体育技能。中国军团主场作战获得了骄人的战绩，一共拿到了199金119银和98铜的惊人成绩。此外，广州亚运会还实现了另一个突破，即“90后”运动员的集体爆发。根据统计，在中国代表团的199枚金牌中，有127枚由第一次参加综合性运动会的年轻选手获得。

2010年广州亚运会各项投资总计超过1200亿元，其中九成投入城市基建项目。广州城市建设速度比原规划至少加快了5—10年。

亚运会的举办也给广州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亚运会开幕前，广州新开通6条地铁线路，全长超过85公里。当年广州地铁运营总长度已超过235公里，紧跟上海、北京。得益于亚运会的推动，广州新城在市区南部迅速崛起，由天河新城市中心、广州新城中心与奥体新城、大学城、白云新城、花

地新城组成的“两心四城”成型，广州城市布局豁然开朗。

亚运会还带动了广州各个产业的发展，比如给广州带来旅游业总收入23亿元，拉动2010年旅游业总收入增长2.3%。宗旨亚运会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据广州市统计局统计，亚运工程投资对广州当年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20%左右，即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00多亿元。广州市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也做过研究，亚运会除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外，与亚运会间接相关的投资，也为广州额外增加地区生产总值约7120亿元。

## “南派”武术与精武之魂

孕育于岭南大地上的武术具有独具特色的技术风格 and 历史文化，世称“南派”武术。广东是南拳发展的中心地区。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民间习武之风从秘密到公开，愈演愈烈，以至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国武术被称“KONGFU”，即是广东人对武术称为“功夫”的译音。

民国初年，国人为雪“东亚病夫”之耻，武风为之一振。1919年广东省体育精武会成立，主张体育救国，振兴中华，培养了不少武术骨干，精武会的影响直至海外。随后香港一些单位也要求成立精武会，并不断来人参观、咨询，促成了香港精武会成立，1946年还成立了“南洋中国精武总会”，以统一领导南洋各埠精武会。孙中山重视武术，曾邀名武师蔡桂勤到大元帅府任自己的武术教师，民国十年（1921年），以大总统名义向武术家林世荣颁发银质奖章，民间练武之风更盛。随后成立了两广国术馆、国术社等，当时武馆林立，先后有近50家，武术流行于各界。

广东南拳五大门派流行于清初至清中叶，现在仍在流行的只有洪门一家，刘、蔡、李传人很少，莫家拳仅流行在东莞、惠州等个别地区。除洪拳

外，首推蔡李佛拳，咏春拳、侠拳、龙形拳、白眉、练手拳等仅在某些地区流行。而近几年，随着电影《叶问》的公映，以佛山为中心的咏春拳知名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赢得了社会较高的关注度。

广东南拳的五大门派中，洪拳是最负盛名、生徒最多的一家。岭南武术的传奇人物黄飞鸿、铁桥三都是洪门传人。香港电影《黄飞鸿》的播映，将其渲染成无往不胜的武林大师而家喻户晓。

国家体委为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曾多次派武术考察团到世界各大洲考察。考察结果表明，海外的中国武术活动，练南拳的占大多数，其次是太极拳和长拳。广东是中国开展南拳较广和较早的省份之一。各南拳武馆的门徒在武艺学成后，不少到海外谋生传艺。在岭南传统武术向海外的传播过程中，精武会在对外传播传统武术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南洋华侨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武术运动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国家体委对南拳的比赛套路和比赛办法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把南拳正式列为竞赛项目，与太极拳、长拳并列为三大项目自选拳术。而广东南拳大胆改革，重新编订套路，采岭南各家南拳之长，如蔡李佛拳的多变手法，侠家拳手的大开大合，客家拳的小巧发劲，莫家拳灵活的腿法，洪家拳稳健的步法等等；同时吸收北派拳重视基本功训练的长处。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和技术改革，广东南拳套路不但符合国家体委的新规定，而且又有特点，有难度，使人耳目一新，在比赛时占有一定优势。

## 广州恒大的崛起

从2010年以来的六年里，中国职业足球的头号热词非“广州恒大”莫属。能从假赌黑降级的阴霾中，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多名国脚、世界级外援和豪门教

练组成的实力过硬足球俱乐部，最终走向亚洲之巅的王者之位，并带动整个职业联赛的繁荣发展，广州恒大让无数的球迷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

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宣布出资1亿元，全资收购广州俱乐部，抛出“五年夺取亚冠冠军”的目标，拉开了恒大时代的序幕。

恒大集团将其严格的商业管理经验移植到俱乐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俱乐部成立之后，广州恒大的许多“规则”成为吸引人们注意的一个焦点。例如，实行主教练负责制，规定“行政人员不准进更衣室”，董事长带头执行；实行“513”奖惩制度，即赢球奖500万，平球奖100万，输球扣300万，2011年夺得中超冠军之后调整为“303”；实行“三个五”军规——“五必须、五不准、五开除”，其中包括“比赛中必须尊重对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比赛中必须无条件服从裁判员”，恒大以严规塑造队伍严明的纪律，



广州恒大首夺亚冠冠军

同时也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一次次震撼中国足坛。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广州恒大在短时间内网罗了一大批实力超强的国脚。从此之后，每年圣诞，恒大宣布新援加盟成为惯例。

从恒大接手广州足球队后，广州恒大从磨合走向稳定，从成熟走向亚冠之巅，用一次次精彩的比赛和大赛奖杯刺激了亚洲球迷对足球的疯狂，书写了一段段传奇而辉煌的足坛故事，成为中国足球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恒大的强势崛起，给中国足坛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大地震，以及刺激其他国内俱乐部的蝴蝶效应。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第一个吃螃蟹”的广州恒大，不仅自身豪掷数十亿真金白银，更推动整个中超的投入量翻了十倍有余。如果只看投资金额和关注热度的话，中超已经被推上了“世界第六联赛”的高位，这是六年前国人对中国足球“全民讽刺”时代所不可想象的。

因为所取得的诸多冠军头衔和成功经验，广州恒大被许多人称为“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王朝球队”。随着恒大足球俱乐部的飞速发展，其对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不少业内外人士的肯定。

如今，在恒大的启发和刺激下，无论上港、鲁能还是苏宁，都有了与日韩豪强一较高下的实力和底气。中超和亚冠比赛在广州、香港、南京、重庆、杭州和石家庄激起无数热血球迷的激情。中超的热度甚至超过20年前引发万人空巷的甲A联赛。同时，广州恒大为了培养未来中国足球的苗子，斥资数亿与皇马俱乐部合作打造的“皇马恒大足球学校”，也即将进入青训人才的丰收期。

不可否认，恒大改变了中国足球，也改写了亚洲足球的格局。而在中国足球水平整体提升的同时，广州恒大还能取得多少次中超和亚冠冠军，这一切都让人们无比期待。

# 宜居之城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广州是北回归线穿过的唯一一座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世界一线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综合性门户城市。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部署的实施，使广州宜居宜业宜游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更加突出。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南部，气候宜人、四季常绿、花团锦簇，拥有山、水、城、田、海的自然格局，生态要素丰富齐备，城市形态错落有致。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勤劳务实，又善于改造自然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近年来，广州市围绕建设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和有文化底蕴、有岭南特色、有开放魅力的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科学规划，注重长远，打牢基础，重点推进，形成城市靓丽、众人点赞、有口皆碑的“广州环境”。抬头可见蓝天白云，各种“广州蓝”的靓图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拍照背景，刷屏朋友圈。

白云山、云台花园、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帽峰山、莲花山、聚龙山森林公园、黄山鲁森林公园、南沙湿地、海珠湿地、花城广场……一年四季花香鸟语，过年的花市更是令人流连忘返。在这里，可以穿越西汉，感受南越王墓的精美，“重返”唐、宋、明、清，触摸千年古街的脉搏，五羊遗穗的神奇故事也给这座城市添上了神奇的色彩……在这里，可以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资源，“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副其实。

人们生活得更安心更开心，就是这座城市最好的未来！花城广州将以更绚烂的姿态绽放世界！

北回归线上的明珠



| 第一章 |

## 千年羊城： 北回归线上的璀璨明珠

世界版图上，广州位于东经113°17′，北纬23°8′，地处中国大陆南部珠江三角洲，濒临南海，北回归线从北部穿过，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以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长、霜期短为特征。

古代称为“夏至日长线”，即“北回归线”。广州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北回归线的核心区，屈大均所观察到的立杆无影现象，正是北回线上夏至特有的天文现象。

北回归线是太阳能够垂直照射北半球的离赤道最远的纬线。大约在北纬23.5°。北回归线穿越地球上四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自120°W起由西往东，北回归线穿越的国家依次有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马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尔、乍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印度、孟加拉、缅甸、中国、美国、墨西哥、巴基斯坦、古巴（海域）、巴哈马等国家和地区。北回归线上有中国，印度，埃及等多个文明古国。大中华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化都集中在这个区域里，是人类文明最早

出现的地区之一。

从世界版图上看，地球北回归线上的其他地区几乎都是茫茫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或戈壁，只有我国东南部地区成为“回归沙漠带上的绿洲”。原因是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大，东部地区深受来自海洋的夏季风影响，形成季风区，季风气候显著，雨热同期，呈现阳光普照、雨量充沛、江河密布、植被繁茂、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景象。北回归线不但是北温带与热带分界线，而且是南北交通的交会点。

广州正好位于太平洋西岸生产性地带的枢纽位置，连接着中国腹地和东南亚。以广州为中心画一个圆，可以发现，众多竞争力强大的全球城市都在不远处。往北是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往南是香港、深圳、新加坡、吉隆坡，往西则是孟买、迪拜。作为中国陆地版图与东西方大动脉距离最近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广州自然而然地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自古以来均为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福建的泉州、广州的十三行、广西的合浦、云南的茶马古道、台湾的著名港口等都在北回归线区域之内。

如果镜头进一步拉近，看中国版图，则从地形上可以找到有趣的发现：在中国地理位置上，广州处于我国北回归线五省区中间，西面有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面有福建省和台湾省。地缘优势是建城两千多年历史的广州一直保持长久不衰的重要财富密码。坐标广州龙穴岛，主岸线长5.7公里的港区内，驳船岸线长达2.7公里，多艘当今世界上最大型的集装箱船都曾靠泊这里。广州站立在珠三角甚至是中国南方最佳的地理位置。东边携手深莞惠和香港，西边拥抱佛肇、珠中江和澳门，进而辐射粤西地区，左拥右抱的广州拥有更为广袤的经济腹地。从东到西，物流、人流、资金流快速融通。好位置，好气候，少灾难，少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成就

了今天广州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为广州带来各种财富要素的汇聚。

广州是北回归线穿过的唯一一座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世界一线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综合性门户城市。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部署的实施，使位于北回归线核心区的广州，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广州这颗北回归线上的璀璨明珠，正向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

## 五羊衔谷，风调雨顺

广州简称穗，别称羊城，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北部，濒临南海，为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是中国南方最大城市。

羊城这个称谓，有一个家喻户晓美丽的神话，即流传甚广的“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大约在周朝时，广州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口衔稻穗的仙羊，降临广州。仙人把优良的稻穗赠给了广州人，并祝愿这一地区风调雨顺、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在广州山坡。从此，承仙之愿，稻穗飘香，年年丰收，广州便成为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五羊城”“穗城”“羊城”名称的由来。

关于五仙降临的年代，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发生于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有人说五仙降临是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候，是为战国时期。还有一说是，晋朝吴修为广州刺史，有五仙骑五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为祥瑞和纪念。

据说今广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观就是五仙降临之地，广州人在此为纪念五仙人专门修建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在今五仙观

东侧，还有一块巨大的红砂岩似脚印状的凹石，被称为“仙人拇迹”（拇迹指脚印）。

广州历史悠久，周朝时，楚国派大臣来到这一“百越”人聚居的地方，“百越”归服于楚时称楚庭。周赧王时，在南海之滨筑城，称南武城。秦始皇三十三年，派任嚣率兵统一岭南，设立南海都，广州当时称番禺。任嚣任南海郡尉，筑番禺城，在今广州仓边路旧仓巷一带，俗称“任嚣城”。汉初，赵佗接管南海郡，并吞附近地区，建立了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其王朝历经五世长达93年。

唐为岭南道治。五代梁贞明三年，南海王刘龔在此称帝，改元乾亨，国号大越。翌年改称汉，史称南汉，升广州为兴王府，作为都邑。三国至唐末五代时期，广州城曾向南扩大，因临近江边，常为洪水所淹，南海王刘龔凿禹山，取土垫高，拓展城垣，名为新南城。

宋代为广东东路治。明代为广州府。1646年，朱聿鏼曾在广州建立了为期44天的南明小王朝，改元绍武。清沿明治。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为广州正式建市之始。宋代时广州城垣修建多达十数次。北宋时先后修筑了中、东、西三城。

明代广州是当时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洪武和嘉靖年间，曾两次扩建城墙。第一次扩建时，把宋代三城合而为一，称老城，周长10.5公里。明后期，又在老城南增筑新城，今万福路、泰康路和一德路为新城的南界。

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外城南面加筑了较小的东西两翼城。辛亥革命后开始拆除改作马路，至1922年全部拆除，现仅残留越秀山上五层楼附近一段城垣，供人观瞻。

2000多年来，广州一直是中国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 风水宝地，气贯长虹

广州，在地理条件上，就是全世界少有的“福地”。两千多年前，老祖宗挑选这个地方建城，历史证明是极其有眼光的。

每年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台风的侵袭，广州却很少受到台风的直接侵袭。网上流传最多的是，广州几千年均无正面台风冲击的历史。

珠江河口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水系与独特河口系统——河网相连，潮流交会，三江交汇，八口入海。而两千多年来，广州一直处于三角洲的中心枢纽位置。

广州在古代称为番禺，《史记·货殖列传》里说番禺“处近海”，就是说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而广州能够坐稳地缘中心的位置，除了靠海，还有另一项厉害的优势——有靠山。旧时越秀、番山、禺山三山之脉自白云山蜿蜒而来。山海相连，背靠着宽厚的山体、陆地，面对着广阔的海洋，坐拥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出海口，广州由此拥有双重的依托，也成为珠江三角洲和粤东粤西粤北的枢纽。

虽然司马迁把广州划入滨海城市之列，但是，珠三角低山丘陵罗列，台地纵横，为置身枢纽位置的广州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口袋”。海洋学家这样解释：当台风风圈遇到陆地时，风场与陆地地形作用形成摩擦力，由于广州地区地势比较平坦，周边地区多山脉，风场与粗糙山脉地形作用的摩擦力大于平坦地形，在大的摩擦力作用下，台风就会向东或西偏转。与此同时，伴随着珠三角的发展，高楼大厦林立，增大对风的摩擦阻力，风力也被不断削弱。

好位置，好气候，少灾难，少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今天广州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为广州带来各种财富要素的汇聚。东边携手深莞惠和

香港，西边拥抱佛肇、珠中江和澳门，进而辐射粤西地区，左拥右抱的广州拥有更为广袤的经济腹地。从东到西，物流、人流、资金流快速融通。

可以说，广州站立在珠三角甚至是中国南方最佳的地理位置。地缘优势是有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广州一直保持长久不衰的重要财富密码。

## 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人文湾区

滚滚珠江，东南入海，历经万亿年，冲击出一块5.6万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平原。位于出海口位置的广州，一边连着珠海、中山、佛山、江门、肇庆，一边连着深圳、东莞、惠州。9座城市在祖国南大陆的边缘围出一片的海湾，著名的大亚湾、伶仃洋等都是这个大海湾的一部分。这个海湾里，还坐落着紧挨深圳的香港和紧挨珠海的澳门两个举足轻重的特别行政区。大珠三角“9+2”，构成了一个“粤港澳”，人口总量达6672万人。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是由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超过1.8万亿美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以广东、香港、澳门为核心区域而形成的湾区。

“湾区”指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便是世界公认的知名三大湾区。当今世界，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由此也衍生出了一个被称为“湾区经济”的经济效应，具有经济高度发达、创新资源集聚、生活环境优质、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发展格局功能明确等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部署，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

丰富“一国两制”内涵的重大安排。

粤港澳大湾区将中国南大门进一步打开，它的一端连接着世界，另一端连接着中国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人口密集带超过4亿的人口。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链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超级枢纽”。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广州在经贸、交通和物流等领域的传统优势正在不断强化，而科技创新实力也在不断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具有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意义，更是加强粤港澳三地文化交流、人文合作的一大机遇。只有达到文化上的认同与融通，才能形成大湾区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融合。作为“千年商都”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正发挥文化纽带作用，当好大湾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中心，共建人文湾区。从“联文脉、筑平台、兴产业、树品牌、促交融”五个方面着手，广州将为人文湾区赋能。

随着交通的便捷，粤港澳1小时生活圈初具雏形，粤港澳大湾区正在走向现实。近年来，港澳青年到广州创业人数急增，问他们为什么来广州，他们表示来广州最重要的是因为广州文化底蕴深厚，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氛围很浓厚，而且又是国家中心城市，综合交通基础好，对出行领域的创业是一个利好。还有，我们同声同气，语言习惯上与广州相通相近，又不用改变饮食习惯。所以，在和港澳的人文生活对接上，广州存在天然优势。

广深港高铁和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把粤港澳大湾区连在一起、串联成环。地理上的距离缩短了，必然引起体制机制的创新联动。中央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同胞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的政策措施，如何将这些便利政策举措落地，充分释放国家政策红利，以及推动湾区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这是广州参与大湾区共建的重要一步。其中，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建设，将积极探索更多先行先

试举措。

根据权威机构预测，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1.2亿至1.4亿。庞大的人口规模对湾区而言既是发展的机遇，也对湾区的人居条件提出了挑战。发挥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优势，广州加快推进港澳创新创业基地建设，营造便利港澳居民在穗学习、工作、生活的环境。密切医疗卫生合作，加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深入推进新闻、出版、影视、文化创意、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合作，积极参与构建休闲湾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广州将逐步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 第二章 |

## 临水照花： 绿色宜居的万花之城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上写道：“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对于傍海依山临江、气候总体宜人的广州而言，地理条件对其政经、文化、生活的影响极其深远。如果说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认定，坦荡的冲积平原、湿热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构筑城市山水格局的珠水云山，是影响广州城市性格的三大因素。

山水是中国古代建城的必备要素。一山一水，构成了广州的基本格局，也是其稳定发展的基本命脉。无论从军事、经济和交通考虑，抑或从古代风水、气候学等角度考察，广州都是形胜之地。所以三国时交州刺史步骘曾经赞誉广州：“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在其任内，孙权出于军事的考虑，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广州”由此得名，沿用至今。

云山珠水之间，是2200多年前广州建城的原点。秦尉任嚣率军开进岭南之后，设郡置县，将岭南纳入秦帝国统一的版图。这一年是公元前214

年。任嚣选中修筑城池的地方，就在云山珠水间的一块平地，深壁而守，雄视一方。这种考虑主要有二：一是倚仗险要地形防御敌人侵袭，二是便于取用流经此地的淡水。此后数千年，纵使城市的版图不断扩大，几经兴替劫难，广州的方位和中心始终不移。所以常有人将其媲美罗马、亚历山大城，认为数千年城市中心未曾移易的建筑模式，全世界唯此三个。

### 广州的“龙脉”

1983年6月16日下午，本来晴空万里的广州骤然变色，一时间云屯雾涌，电闪雷鸣，随之而来的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从午后一直下到翌日凌晨。这是广州1908年以来有记录的第三次大暴雨。巧合的是，这是南越王墓发现后开掘的第七天。民间都说，这是动了龙脉的缘故。至今仍有民俗学家提出：广州南越王博物馆所处的象岗山，正是广州的“龙脉”。

这自然颇涉无稽，却有其传统的心理基础和传说佐证。羊城有“龙脉”是从古相传至今的。有志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听信术士之说：在任嚣城北，白云、越秀两山间，有“黄云紫气之异”，乃“龙脉”所在，他日或有异人出世。于是派人在白云山脚下凿了几十丈的大口子，地下“涌血数日”。据说白云山南麓景泰坑与横枝岗间的马鞍山凹地，便是秦兵当时断“龙脉”的痕迹。又相传善于追龙的宋朝地理师赖布衣在江西大庾岭发现一条“龙脉”的尾端，便一路向南，追查到广州，发现原来“龙穴”就结于此。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广州的地脉在城北，不敢在城北凿渠，唯恐伤及地脉。

传说固然是传说，但从“十一五”开始，在对广州地质遗迹资源的调查过程中，广州的地质科学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广州确实潜藏着一条十分独特的山水自然脉络，或许也可沿袭前说称为“龙脉”。

这条“龙脉”从广州的最高峰天堂顶出发，一条山势脉络一路向南顺势而来。环绕大尖山，肩托银龙顶，翻越帽峰山，俯身白云山，盘踞越秀山，饮水珠江石，绕行龙头山，倚坐莲花山，倚靠黄山鲁，直入龙穴岛，承载着广州城市文明的历史印记。而且据统计，从1949年开始，广州几乎没有台风直接穿过的情况，广州市地质调查院专家分析，这与广州山水地形脉络有极大的关系。

从行政区划看，这条“龙脉”巧妙穿过广州的多个区，成为连接整个广州行政区域的自然轴心。广州市及广东省的行政中心就正好坐落在其中部的转角位，山地与平原的衔接处。

从水域径流上看，北江、东江两江汇聚，流溪河、增江河两河相依，中间地脉一线相连，刚好成为两江两河的最核心中轴分水岭。

从地貌框架上看，全球其他地方的河口三角洲多是河流与平原并存，地势平坦，像广州这种平原、河流和中轴山脉同时具备的格局十分罕见。

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广州已经基本摸清了全市地质遗迹的“家底”。2015年《广州市地质遗迹保护规划（2015—2025）》审议通过。目前广州已完成全市地质遗迹资源调查、增城市地质遗迹调查、番禺莲花山地

质遗迹调查及从化天堂顶地质遗迹调查等项目，其中既包括了旅游中的山水名胜、自然风光等自然遗迹，也包括了人类与地质体相互作用和人类开发利用地质环境、地质资源的遗迹。

目前，广州有2个国家级地质遗迹，其中番禺莲花山已开放，从化天堂顶国家级地质遗迹则尚未开放；而省级地质遗迹就包括了市民比较熟悉的越秀山、白云山、帽峰山等。

## 珠江与“水城”

“六脉皆通水，青山半入城。”珠水云山，构筑了广州城市的格局。相比于山，广州的水性格或许更为鲜明。

珠江河口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水系与独特河口系统——河网相连，潮流交会，三江交汇，八口入海。而两千多年来，广州一直处于三角洲的中心枢纽位置。

### 珠江蕴润下的广州城



广州依水而生、临水而长，河涌曾经承载过数不清的功能与城市回忆。有人曾做过一番对比，号称水城的威尼斯有177多条河涌，广州却有231条河涌穿城而过，相比而言，广州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如果你站在高高的广州塔眺望那纵横曲折、如渔网般密布的大小河涌，或许更能了然于目，领会于心。

从2006年起，曾因珠江水质受到污染而停止的“横渡珠江”这一传统群众性体育项目得到恢复，成为每年年中的一大盛事。如今，“横渡珠江”已经成为广州城市品牌。“横渡珠江”，是珠江水质逐年好转的表征。

当然广州绮丽的水景，不仅在于壮阔的大江大海，更在于多姿的河涌、湖泊和清湾。《广东通志》说：“内城古渠有六脉渠。渠通于濠，濠通于海。”古时被视为“文溪”的东濠涌是当时广州居民的主要供水渠之一，也是广州治水的缩影和代表。近代以来，东濠涌河涌淤积，日渐浅窄，成了藏污纳垢的臭水沟。但经过揭盖截污、复绿补水、全面整治等治理，东濠涌恢复清泉碧波、成为贯通城中心的休闲水岸，被认为可以媲美韩国的清溪川。

广州的湖泊很多，虽然不如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那么有名，却也自成一派。由汉至清，广州曾有兰湖、菊湖、西湖、芝湖等自然湖泊，但在城市的演进中逐渐淤积消失。20世纪50年代，广州全民义务劳动修建了流花湖、荔湾湖、麓湖和东山湖，这四大人工湖本来是水利工程，如今却变身为广州最受欢迎的公园。

“我不会忘记/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这是诗人冯至笔下的《威尼斯》。我们相信，智慧的广州人会有更巧妙的方法，创造“水世界”，做好“水文章”，让“水城”广州变成世人“不会忘记”的所在。

## 千年花市，生态绿城

“花地接花津，四时皆似春”，处在南国的广州长年湿润多雨，四季如春，最适宜植物的生长。唐代诗人张籍有诗为赞：“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所以，广州赢得了“花城”的美名。

广州与花的缘分，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广州人喜欢买花、戴花，除了用于日常生活中的装饰，也将鲜花用作烹饪、医药、养生、辟邪之用。比如从东南亚传到广州的素馨深受广州人喜爱，被串成一串挂在床帐旁用于驱蚊辟邪，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在广州，花的审美、花的产业自古有之。《广东新语》载：“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时至今日，虽然广州的版图不断扩大，涵括了山、水、城、田、海诸景，但是花依然是诸景中最灿烂夺目的标志。无论城中，或在远郊，无论老街，或是新城，不同时节触目所见就是那满城绽开的三角梅、傲然挺立的木棉、飞焰横天的凤凰花、绚烂缤纷的紫荆。

这是广州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所致。广州有着“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的地理形胜，地势北高南低，气候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其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中国植物研究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模式标本产地。

说起花城，很多人自然要想到秦牧的那篇散文佳作《花城》。秦牧写作的年代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其笔下的广州花市是这样的：

广州的花市上，吊钟、桃花、牡丹、水仙等是特别吸引人的花卉。……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我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异常水乳交融。就正像北京人逛厂甸、上海人逛城隍庙、

苏州人逛玄妙观所获得的那种特别亲切的感受一样。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

迎春花市是广州最著名的风俗。从年二十八到除夕夜，广州各区都会举行盛大的迎春花市，辞旧迎新，为新的一年攒一个好意头。“香街十里一城春，笑语喧声入彩门。疑是层峦采蜜使，幻成百万赏花人。”鲜花给广府人的春节增添了无尽的吉祥和喜庆。男女老少，举家而出，“行花街转运”，人流如织，一直逛到大年初一的凌晨才散去。

随着广州人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广州花市的规模和分布范围越来越庞大，已形成了花城广场和各区的十二大花市，如今更推出了“广州过年 花城看花”的品牌。

其实除了迎春花市，今日花城，四季都是“花时间”。广州的一些微信公众号，每到时令花开，就会有许多摄影爱好者将其美图配上美文晒出来，吸引更多人前往观赏。春天，是广州花开得最旺的时节。城中百花怒放，交织着深红浅碧，开在公园、山林、田野、街头转角处，开在细雨东风中……夏天的羊城，依旧是有声有色的时光。凤凰花从一片绿原烧将出来，接天映日，宣告着夏天的热闹登场。亭亭的荷花，是此时的主角。广州的秋并不尽是郁达夫笔下的“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入秋后的流溪河畔，那绿水蓝天、层林尽染，无疑是大自然丰厚的馈赠。还有绯色如霞的异木棉，让花城的秋冬，有了繁花似锦的明媚肌理。广州的冬天并不是众芳摇落的时节。没有雪，却有香雪。萝岗香雪，自宋朝便已闻名。满山的青梅，簇拥着洁白的花朵，是冬日里岭南最秀丽的歌吟。

这些花木，有些是岭南自有的品种，有些则是异域舶来的花草。而且



花城广州四季花繁似锦

很多舶来的物种都是通过商贸和旅行者带来在此生根立脉，而后在国内开枝散叶的。菩提树据说就是最早在光孝寺落地生根，后来才不断移种，广植于各地的寺庙中。常见的凤凰木其实原产自非洲，如今已燃遍亚热带。

时至今日，还不断有新的物种被引进，在花城绽放。比如日渐常见的甘蓝型油菜花、峭立风中的巴西国花——黄花风铃木、来自南美的蓝花楹，还有传说产自波斯的金链花阿勃勒、原产热带美洲的醉蝶花，来自南

美的向日葵在广州更成规模，形成了百万葵园。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广州就是这样一幅挂在南国的山水花鸟画。

这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广州长期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果。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2%。绿道、生态景观林带等各种绿色廊道，构筑起城市的生态屏障。2016年8月，广州生态文明领域首个综合型发展蓝图《广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6—2020年）》出炉，将从“城市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的高度对生态环境进行考量。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还带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2016年12月1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16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衡量生态投入与人类发展》报告，广州在35个大中城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高居榜首。

城内青山半入城，城外青山延百里。在城中，花城广场、二沙岛、临江大道这些城市公园与街头绿地，是舒适惬意的公共客厅；在郊野，有水网绿洲，万亩湿地，尽显岭南水乡风情；还有苍山叠翠，山水相连，森林公园星罗棋布，生态廊道、休闲绿道延绵连贯，骑上共享单车，慢行其中，四时美景就缓缓铺展。随着一江两岸三带的建设，屹立在南海之滨的广州，将是具有岭南特色的森林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

### 第三章

## 万国衣冠： 超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

1784年8月28日清晨，广州黄埔古港，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33艘船整齐地停靠在洋船停泊点上。这时，又有一艘外国商船沿着珠江缓缓驶入锚地，并鸣放了13响礼炮向其他船只致敬。它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它从纽约出发直到这里，经历了188天的行程。

纽约与广州通航的成功，是历史上中美关系开辟的象征性事件，美国人认为这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打开了太平洋两岸“最古老的和最年轻的”两个国家的通途，开创了两国直接的经贸文化关系新纪元。“中国皇后号”出发之日，美国才刚建国不久。这个新生国家的国民（广州人称为“新国民”）试图冲破英国的经济封锁，非常踊跃地想到遥远的东方寻宝。而他们所筹划的远航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广州。中美关系史上的几个“第一”就是从广州开始的。

此时的广州，已是蜚声国际的大都市、世界著名港口城市，长期与欧洲、东非等地有着贸易往来。唐宋时期，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海直到波



来穗的外国人在五羊雕像前留影

斯湾、东非和欧洲，全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在跨越18、19世纪的百年中，广州已经完成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环球贸易的唯一大港。据统计，乾隆十四年到道光十八年（1749—1838），到广州贸易的外国远洋商船达5266艘，平均每年近60艘。

早在美国人上岸之前，近代欧洲就与广州保持着贸易往来。1516年，葡萄牙人捷足先登；紧随其后的是：1567年俄国，1575年西班牙，1604年荷兰，1637年英国，1660年法国。它们的到来比美国早了一二百年。

自开埠以来，广州一直是商贸往来之所、万国衣冠之地。自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要国际航道后，广州就一直是南部中国最重要的港市，

尤其明清施行一口通商政策，更将其推到了全国最重要口岸城市的地位，有着世界性的影响。

如今，广州的城市版图早已进入世界特大城市的范畴，常住人口也达到1449.84万人（据《2017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市的美好正基于人们的共同创造。一个城市的发展，正借由其所聚居、繁衍的人群而成长、勃兴。广州城的繁荣，或许正应了古圣先贤孟子所说的那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广州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下，我们来看一下生长于斯或往来于此的人们。从古至今，他们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却也是一个和谐的族群。

广州虽然地处边陲，但因其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依山傍海的地利，很早就有南越先民在此定居繁衍。随着南海郡的设立，大量的士兵、移民随之而来。从任嚣城到赵佗城，城域的扩大，使得广州的定居人数剧增。在这里，有本地的土著、中原的移民，以及后来的谪宦士人，还有往来海上的繁忙商旅、立心传教的宗教界人士。他们在此地商贸、旅游、讲经、弘法、定居、学习、婚丧、交流……

## 和辑百越与民族融合

在广州的越秀山上，有一座清代修建的石牌坊，坊上是“古之楚庭”四个隶体字。“楚庭”就是广州的乳名。当然现在说起来已鲜有人知，特别是对年轻的广州人而言。

广州的建城始于何时，学界其实尚未有定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认为，广州最早筑的城称为南武城，“自周赧王初，越人公师隅相度南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海地，始筑”，时间大约就在公元前473年。而“楚庭”则是南武城的第一次扩展，主导者是楚威王的宰相南海人高固。而这座城市文化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五羊传说也肇始于此。

《读史方輿纪要》载：“相传高固为楚威王时相，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城周十里，号五羊城。”这个描述或许过于简略，现在较通行的版本是：当时天空飘来五个仙人，骑着五只羊，各带着谷穗赠予当地人，祝福此地五谷丰登，永无饥馁。后来仙去，羊留，谷生，穗长，从此此地成为一个富庶的地方。民间传说多出于附会，却是古人坚信不疑的信仰，也是生长于斯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蕴藏着广州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密码。羊大为美，穗丰为和，生活和美，自然包容，和美、

包容便成了羊城、穗城的特有秉性。从此，羊、穗成了广州的图腾。至今，耸立在越秀山的五羊雕像仍是广州城最经典的城标。

如果还要往前追溯，则广州建城之前，早有人类定居繁衍。远在七八千年前，便有百越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繁衍，他们群聚成族，进行原始耕作。与中原地区相比，此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当落后，到了秦汉时期仍基本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所以，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持续时间并不长，最后是任嚣带领楼船之士顺北江南下，势如破竹，在公元前214年征服岭南越族，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

任嚣城（番禺城）的建立更多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虽然这是广州确切可稽的建城立廓之始，但实际颇为狭小，存在时间也极为短暂，如今更是难寻踪迹。继任者赵佗在其基础上，凭借着雄才伟略，兼并了桂林、象郡，在岭南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国——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随着管辖版图的扩大，广州作为南越国的都城、政治中心也随之向东西方向扩展，并丰富其他的功能。

赵佗自号“武王”，却尚“和”。他非常明白，开疆拓土固须以“武”镇之，但治理百姓却绝对以“和”为贵。他一方面将中原的生产工具引入南方，大力发展当地生产力，使得岭南避免了人祸兵灾。另一方面大胆启用越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委任其为地方官员，重点发展南方沿海地区的渔业、桑麻等特色产业。他还遵从越人的信仰与习俗，鼓励中原民族与越族通婚。他的侄子、明王赵婴齐就娶越女为妻，所生的儿子赵建德被封为高昌侯。他自己也融入其中，自号蛮夷大长老。后人将他这套治理政策称为“和辑百越”。史学巨擘黄现璠对此赞誉有加，认为“这些民族政策，完全符合汉族和越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长达93年的时间里，越人没有反叛的举动，汉族的先进文化得到推广，促进了越族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然而，民族融合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总是在碰撞中不断融合，绝无一蹴而就。到了三国时期，广州、交州分治，广州之名从此确立。当时俚、僚各族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汉化，已有列入编户之民，但俚、僚人数众多，豪族势力强盛，封建政权并未能牢固掌握统治权。从吴至南朝初时，对俚族的赋税征收既多又频，军国所需，连接不断，剥削过重，俚人反抗不断，征剿也不断。这种情况至南梁未得到多少改善，汉俚关系渐呈对立。冼夫人是当时的俚族首领，却深明大义，她与当时的高凉太守联姻后，没有将自己的行为囿于家族利益或限于眼前利益，而是致力于民族和睦，以当时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民族封建礼制文化同化本族，在俚族中大力推行汉族的封建礼法，用法令来约束豪强大姓。同时，在处理汉族统治政权与俚、僚族的关系上，一方面，阻遏了汉族统治者对俚、僚族的欺压。另一方面，又利用其自身威望招抚民众，缓和了民族矛盾。陈隋两代，冼夫人三次领兵远征广州，平定欧阳纥叛陈之乱和王仲宣抗隋之乱，确保了广州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后人将此称为“怀集百越”。

如果要比较二者的区别，可以说赵佗的“和辑百越”更多的是对入粤秦军的越化而不是越人的汉化，这是北人入粤之初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经之路。而冼夫人的“怀集百越”则是汉化而不是俚化，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如果说赵佗是开其端者，那么，冼夫人应是毕其功者。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下，为广州岭南的民族融合、社会进步、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广州依然是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到广州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广州已成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量大、增幅较大的城市之一。全市55个少数民族族别齐全，少数民族人口超过70万人，形成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格局。不同的民族和谐共处、文化融合，为广

州的经济文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带动城市经济增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但同时融入、生活、适应、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针对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城市日常生活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务工经商过程容易引发涉民族矛盾纠纷，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工作越来越重等问题，2015年3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在市民族宗教局创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联络站，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作队伍，主动联系少数民族群众，深入开展针对性服务，为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城市提供优越的便利，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 华洋杂处：敞开的国门

说起广州，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的韩国商人朴泰元说：“广州最大的特点是包容、实在。在广州买东西省心，店员的报价一般都比较实在，很接近最终成交的实际价格，一般不需要你费很大气力去砍价。对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讨价还价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所以我更喜欢在广州买东西。”

这种说法很朴实，却点出了广州的两大关键词：包容、实在。如果要在之前再加上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开放”。正因为开放的心态，才有了包容、实在。事实上，不单是现在，从古至今，广州在外国人的眼中、笔下，也是这般具有亲和力的城市。

美国人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曾写道：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南方的所有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在其笔下，广州呈现的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城市繁荣



帆樯林立的广州港湾

气象：城市前的港湾帆樯林立，无数的国内外商船如南海舶、婆罗门舶、波斯舶、大食舶、昆仑舶、狮子舶等，中原的客商将北方的商品运销此地，又购进岭南和海外的货物销往内地。那些阿拉伯和波斯等地的外国人则从这里销售香料和药材，同时购进丝绸和瓷器。

到了明朝1515年，随着葡萄牙商船来到广州的商人科尔沙利（Corsali）在发回欧洲的信件中，对广州也大为赞叹。他认为，广州是他在世界上到过的最富裕的地方。坚固雄伟的城墙、宽阔的街道、珠江上穿梭的船只、繁华的商业街道、经销丝绸和瓷器的商行之多，令人目不暇接。

开放的广州，一直是作为中国的南大门被世人所熟知。这扇门千年敞开，从未阖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枢纽之一，广州海上商船来

往十分频繁，当时通过南洋航道经广州朝贡通商的国家主要有大秦、天竺、狮子、罽宾、占婆等十几个，不少海外商人“久停广州”，进而定居，成为早期的侨民。

两汉六朝是广州海上活动形成传统的时期。广州传承了南越族“善舟习水”、亲近海洋的特性。她在海上邂逅不同的文明，也在文明碰撞中认识自我、更新自我，也造就了这个城市开放、包容、务实的性格。

当然，广州作为一个具有显著国际影响的城市，应该是唐代的事情。在唐代，广州达到了古代城市的自身发展高峰，使其成为具有明显独特性和中国重要的国际商贸城市。在唐代，广州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中国在此设立了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还有蕃坊供外商居住。唐朝时期，广州已有20万人口，同时居住着超过12万的外国商人。他们之间联系密切，相处融洽。当时的唐都长安以及南海深处的马六甲之间形成了一条重要的海陆贸易通道，广州就在中间联结着不同文明的两端。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最长的国际航线，从广州出发，到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到达非洲海岸，经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商贸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得广州的城区面积大增，形成了南城、子城、官城的州城三重格局。当时的城区西部是中外商贾聚居之地，在今中山路以南、大德路以北、人民北路以东、解放北路以西一带，还设置了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居住的“蕃坊”，还有部分外国人居住在珠江南岸。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外国人，白天就赶到大市场中，与广州人及唐朝境内的各地商人讨价还价，进行贸易活动。后来还有夜市，万国衣冠，南腔北调，尽显华洋杂处、市井喧嚣的世俗生活图景。如今，光塔就是当时的见证。在不远处，还有六榕寺的花塔。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在同一个城市共生，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具独特魅力的生活景观。

明嘉靖年间，广州被确定为各国来华朝贡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城

域更为广阔，人口过百万，还有大量从全国各省、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来的商人和旅客，工商业、服务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城市功能很齐全，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1793年12月19日，那个不远万里到中国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广州登陆。当时东印度公司的人是不能进城的，所以马戛尔尼为自己能够跑遍这座城市而自豪。他说：“我很好奇，想看看这座城市。我从他的一端穿到另一端。大家说它有一百万居民。看到到处都是人，也许这并不言过其实。”他的副手斯当东也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这样描述广州：“作为一个海港和边境重镇的广州，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说着不同语言，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1836年12月22日，一场名为“万唐人物展览”的活动在费城博物馆进行，商人邓恩展出了他在1818—1831年间在广州收集的1200多件物品。参观者竟达10万多人，邓恩所写的《万唐人物：费城收藏中国文物详细目录》的介绍册子也卖出了5万册。这个120多页的小册子，有专文介绍广州城，并且不吝言辞地赞美广州是“中国南部最古老的城市，中国最伟大的商业市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广州人口稠密，大约有一百多万人口，包括郊区人口和水上人家。超过17000人参与纺织、丝绸业工作，生产各种各样的布料。

虽然近代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广州逐渐从“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沦落，也一度沉寂、徘徊，但长期处于全球史时代的文明与文化碰撞交汇的敏感位置，广州早就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和恬淡的气度。一时的沉寂并没有让它沉沦。相反，低调也是它的性格。在改革开放后，积蓄许久的广州

抓住时机，彰显底蕴，短短三十多年发展创新，再度崛起，成为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

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论坛落定广州的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论坛团队认同广州的国际性发展路径。举办城市是否开放包容、是否具有国际化程度是能否被选中的重要因素。论坛落定广州，说明广州具备这样的条件。二是广州正在探索和实践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当前全球经济息息相关。当前，世界刮起了一股先进制造业风潮。广州在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生物、3D打印、无人机、干细胞研究、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三是广州具有向外辐射和吸附资源的城市影响力。《财富》全球论坛看到了广州能够辐射中国、东南亚及至全球的影响力。

## 孔雀东南飞：不设限的城市

2016年12月21日，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简称海交会）的现场，人头攒动。据报道，前来参会的各地英才或突破七千人。

海交会是由留交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更名而来，更名意味着交流会的升级，一方面体现了广州求贤若渴，一方面又彰显了羊城的聚才魅力。留交会始创于1998年，由广州市委、市政府主办，是中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具影响力的海外人才项目交流平台，被誉为“中国海外留学人员交流第一品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探索，留交会（海交会）已经发展成为“以留引智”的国际性、高层次海外人才交流平台。据统计，截至2015年9月份，广州留学回国人员累计超过5万人，认定高层次人才270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80名，在穗留学人员累计创办企业2000多家，

超过6万海外人才在广州这片热土上创业、创新。一幅新的“孔雀东南飞”画卷正在展开。

孔雀东南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背景下曾是全国一抹耀眼的亮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孔雀东南飞”带动的南下大军助推以劳动力、资源、土地成本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飞”，广州成为全国务工人员向往之地。广州凭借先行一步的历史机遇和敢为天下先的无畏气魄，率先提出“人才不设防”的口号，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培育人才，开创柔性引才新模式，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生动局面。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同年中国有4000万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其中1160万流入了广东。1989年的广州铁路春运发送旅客是680万人次，到2007年，铁路春运人数暴涨到1993.1万人次，日发送最高峰636万人次。

然而，今时今日，“招工难”的问题已经横在眼前。近几年，在全球新一轮资源配置和科技变革、中西部的崛起，以及人才结构的变化中，当年全国青年才俊蜂拥南下求职的盛景不再，广州在全国人才竞争中面临巨大的挑战。一面是部分人才回流内地，全国人才竞争加剧；一面是海归、创客等国际人才的回归，带来了更多的“全球智慧”。广州如何在新的创新格局中抢占人才的制高点？

近年来，广州在来穗人员服务方面探索良多，譬如，针对来穗务工人员的积分入户、申请公租房、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医疗及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政策。

可喜的是，经历十余年产业结构深层变动后，广州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新一轮人才“孔雀东南飞”出现，创新创业发生“裂变式”快速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驱动拐点”正在来临。

广州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再创业阶段，南沙新区、东部山水新城、白云空港经济区等多个新区建设如火如荼。创新事业呼唤全球的人才。2016年

《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出台，其目标任务是：“紧紧围绕广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重点面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决定、人才为先，大力培养、引进并支持一批领军人才（团队）在穗创新创业，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化。”

近年来，广州在创业圈的名号越发响亮。在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排行榜》和《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中，广州连续五年位列全国100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含直辖市）中的第二位。

2018年，广州市人社部门目标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万人，新增创业孵化基地10个，促进创业2.5万人。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方面，将大力实施“校园精准服务行动”，强化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就业创业服务。在广州地区重点高校建设高校毕业生“互联网+”服务站——“创业就业e站”。培育优质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做大做强做优“众创杯”大学生启航赛暨“赢在广州”大学生创业大赛，吸引更多优秀创业项目落地广州。

| 第四章 |

## 匠心筑韵： 城市空间的人文嬗变与流传

1796年，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洋行大班、退休后定居美国费城的范罢览心血来潮，仿照中国的建筑风格，建造了一个“中国退隐园”，里头陈列了东方的古玩、书画等艺术品，让前来观赏的客人对中华文化赞叹不已。无独有偶，1831年，在华13年的费城商人邓恩回国后在新泽西的奥立山建了一幢“中国小别墅”，自此以后，当地的富人群起仿效，纷纷按照中国的方式建筑房屋和花园。

这两个人都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年，他们带回美国建造的中国建筑式样，其雏形、风格多半来自中国三大园林流派之一——岭南园林和建筑。其特点是：艺术与实用兼顾，园林与建筑互融；依托自然山水景色，通过堆土放坡营造微地形，营造连续开放空间，内外映衬，景中套景，凸显生动、别致的风韵；并且广泛应用观花植物、彩叶植物、芳香植物。

广州是岭南园林建筑的发祥地。公元前2世纪的南越宫苑遗迹，是世界上现存可见的最早园林实体原物。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余荫山房，寄托着古人隐逸山林的情怀。这些匠心独具的园林建筑让来华的外国人印象甚深。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特别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号称“岭南第一名

园”的海山仙馆。海山仙馆是行商潘仕成的私家园林，位于十三行商馆西面的泮塘与荔枝湾之间，四处分布着美丽的古树，园里还蓄养着鹿、孔雀等动物。据说外国使节和政府高级官员的会晤常常借这里进行。可以想见，中国富人的典型生活给他们的震撼之深，以至于回国后他们在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上都加以效仿。

园林建筑艺术景观是人与这片土地发生深厚关系的重要见证，是一座城历经风雨的缩影。19世纪的法国大作家雨果说：“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一个城市总是由不同历史时代的建筑组成，这些看上去没有生命的建筑，却因人的创造而被赋予了灵魂。

通过建筑，我们不仅可以触及凝固在建筑之上的精魂，还能感受到其温热的脉动。

每一座城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属于自己文化的建筑。北京有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富丽雍容的颐和园，上海有灯火璀璨的外滩与东方明珠塔、铺满青石板砖的弄堂，苏州有一座座精致奇巧、移步换景的江南园林，西安有六百多年风雨侵蚀仍不倒的古城墙……

广州有什么呢？曾有先哲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如果把广州的建筑比作一部交响乐，那么，传承与创新是它的两大指挥。前者孕育了西关大屋这样代表岭南特色的民居，后者带来了骑楼商业街。两大指挥创造的乐章在历史中摩擦碰撞，随着时代的河流前进，又逐渐诞生了广州塔、广州大剧院、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广东省博物馆、琶洲国际会展中心等地标性建筑。

### 中轴线：城市的地脉文心

广州是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如今，古老的任嚣城踪迹难觅。这主要是因为早期的干栏式建筑难以留存。干栏式

建筑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建筑形式，用竹木材料搭成两层的房子，人住在上层，下面饲养牲畜，这样可以防止潮湿和蛇虫野兽的侵袭。当时城内除了极少数砖瓦建筑，大量的是竹茅房舍和干栏巢居。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建筑早已腐朽，连同典籍记载中的番禺二山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但是，当任嚣城在此画下原点后，广州便以此为圆心，不断向外扩张延伸，直至今天的特大城市版图。

从任嚣手上接任南海尉的赵佗就在老城的基础上从甘溪两侧向东西方向扩展，最终形成了周长十里，东起今中山三路芳草街一带，西至广仁路教育路一带，南至西湖路，北至越华路的都城。1975年发掘的南越王宫遗址，可以让我们大体想象当时的城景。在这里，发掘出了一段做工极其精致的南越国宫署砖石走道，出土了涂朱红色的万岁瓦当和印有公、官、户等文字戳印的筒瓦、板瓦、砖质窗棂，还有多种颜色的砖雕碎片。另外，在王宫西侧，还发现了一片约130平方米的南越国时期铺砌的地面，共有数百块大型的砖块。这表明，赵佗城时期已经有了砖瓦建筑，而且有着较高的工艺水平。

后世的广州城区主要在这条中轴线上延展。从广州上空看，镇海楼、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市人大常委会大楼、市政府大楼、人民公园、海珠桥等建筑连成一线，正好组成了传统的中轴线。

城市之所以需要有中轴线，因为它是一个城市的坐标。城市的道路网络、商业网点和居住街坊，可以根据轴线进行布局。然而相比北方城市鲜明的中轴线，方方正正、四通八达的城内道路，广州则别有风致。许多街道都不是以东西南北排列的，总是呈现九曲十八弯的形态。比如从仓边路到小北，就是一个大弧形，这很容易让有些不明就里的人心生责怪。其实这并不是设计者故意为之，而是当年的文溪就是如此弯曲蛇行，汇入珠江的。如今那种溪风野韵已难领略，但形状却保留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

种自然的状态，是自然馈赠广州的特殊礼物。有人将广州和北京的街道对比，发现北京的街道图是一个规整的田字形棋盘格局，广州则像是撒开的渔网，沿着珠江的河道，歪歪斜斜，呈现自由伸展的状态。对古城颇有研究的专家张驭寰在《中国城池史》写道，平民的街道通常比较混乱，而政治权力中心所在的街道则整齐划一，大抵是出于“权力美学”的需要。这也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弯曲杂乱的街道是“自由民的市场导向的政治结合体所造成的结果”。由此我们看出广州这个城市的平民化。

直到21世纪，随着广州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大，一个由广州东站广场、珠江新城中央广场、歌剧院博物馆前广场、海心沙市民广场、赤岗塔广场、东风生态公园等构成的广州城市开放空间，形成广州现代意义上的中轴线。

新旧两条中轴线，一东一西，却呈现出不同的韵味和风致，值得寻思。

## 骑楼与西关大屋：包容气象，传统骨骼

在广州，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现象随处可见。西方舶来的建筑风格也融合了本地元素，成为被人们接纳的文化现象，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骑楼。

在广州，骑楼是一幅长长的画卷，摊开来，全是广州人鲜活的面庞，行进的脚步，抑扬顿挫的嬉笑怒骂。在骑楼街，店铺鳞次栉比，人们就住在商店楼上，左邻右舍到处走动。骑楼店里的老板与客人，也像日日相见的老友。即便下雨了，住在骑楼和走在骑楼的人们也可以潇洒自在行走其间，聆听着叫卖声与喇叭声混杂雨点滴滴答答。因而，骑楼是广州欢快、响亮、音符肆意跳动的小步舞曲。

在现代都市里，这样看似没有私人空间、暗灰老旧的骑楼，却成了许多广州人念念不忘的过往。现在，装点一新的上下九步行街到了深夜，灯

火璀璨，也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人们惊叹这样的建筑，能兼顾日常起居、从商、消费休闲于一体，在这个朝夕巨变的城市里，热闹而又孤独地坚持伫立着。

关于骑楼的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骑楼来自2500年前的希腊的帕特农神庙，那是雅典卫城的主体建筑，后来类似建筑风格一直流行于地中海沿岸；也有人称骑楼的雏形是英国人在印度殖民地建造的“廊房”。因印度气



广州传统骑楼至今仍是商业街区

候炎热潮湿，英国人便把欧陆建筑的第二层以上的部分，跨在人行道上遮阳挡雨。这种新型建筑风靡整个东南亚。不少南洋华侨返乡后，效仿着建起了这种建筑。很快，骑楼在岭南地区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

为了充分利用城市的道路空间，并考虑到广州春季潮湿、夏季多雨且酷热的天气，人们盖起了这种两三层高的骑楼式楼房。1912年，广州出现了关于骑楼最早的记载。广州市政府要求商贩们建造商铺时，在私地内，“留八尺之宽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之用”。这些楼房一般上层住人，下层经商。广州骑楼专门把门廊扩大串通成沿街廊道，既方便商家风雨无阻地做生意，也保证了顾客无论天气好坏，都能悠闲地漫步在长长的骑楼街，自由选购商品。对于自古重商的广州而言，没有比骑楼更令广州人觉得实用方便的商业街建筑了。

骑楼自民国初年传入广州，极为兴盛。到现在，广州的第十甫路、上下九路、中山路、解放路、人民南路、一德路仍保留着大量的骑楼商业街。骑楼是广州商业街的标志建筑，其中1934年兴建，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建筑师为了突出“爱群诸公”的用意，追求强调挺拔的艺术效果，借鉴了美国新摩天大厦的设计方法，吸收了哥特式复兴风格后，以广州骑楼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座骑楼建筑一度是华南地区的最高建筑，自民国起就闻名遐迩，被外媒报道为“华南之冠”。新中国成立后，爱群大厦也一度作为广交会外宾的官方接待场所，在海外颇具知名度。

如果将广州建筑比作交响乐，那西关大屋便是沉稳、庄重而令人回味无穷的慢板。它端雅富丽又注重实用功能，彰显广州实干艺术家的风采，门前的水墨青色石砖，窗户的雕花与庭间布满青苔的水井等等，已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一个个广州生活的符号。

西关大屋是广州最著名的传统建筑，亦是岭南民居的典范。这些民居最早是广州望族或富商建的私宅，始建于清朝中期，多数集中在广州的西

关一带（今荔湾区），故称“西关大屋”。

在广州，流传着许多西关大屋的传说。有人称西关大屋砌墙是用一锅煮好的糯米饭拌上灰浆，可见西关大屋建筑工艺要求之高。西关大屋以三间两廊为典型平面，呈纵深向，以主厅堂为中轴线左右对称。中轴线自前而后，自南而北，依次为门廊、门厅、轿厅、正厅、头房、天井、二厅、二房。每厅为一进，一般大屋为二三进。中轴线左边为书房及小院，右边为偏厅和客房，后面便是卧房、厨房。客房前有平台供家中女眷小憩、聚会、嬉耍。大屋内另设花园，假山鱼池，繁花佳木，独添室内的美景与风雅。

大屋的正门为由短脚吊扇门、趟栊、大门组成的三套门，既起到防盗之用，又方便通风纳凉。门前铺水墨青色石砖，大屋两侧各有一条青云巷，又称“冷巷”“水巷”，起到通风、防火、排水、采光、栽培花木之用。三套门、青云巷和大屋内的天窗、天井、满洲窗所形成的穿堂风，使得西关大屋冬暖夏凉，舒适宜人。

满洲窗则是西关大屋的另一特色。西关大屋内部除了采用岭南建筑一贯的木石砖雕、陶塑灰塑、壁画石景、玻璃及铁漏花、木雕花饰，还用五光十色的玻璃镶嵌满正方形的窗格，即是满洲窗。这细致的工艺在当时极其耗费人力与工时，据说建一座西关大屋，光是一个满洲窗，就可耗掉15人10天的工时。

传统民居最能体现当地的风土人情。西关大屋根据广州的气候与水土设计，从建筑用料到装潢，都洋溢着浓郁的广府气息，象征着那个时代广州的成就与富足，一直被广州人津津乐道。西关大屋鼎盛时有1000多座，残留至今的有100多座，而其中具有保留价值的不足10座。广州市政府特别建立了西关大屋保护区，为广州人保留这宝贵的生活遗产。

## 建筑背后的大师心影

2016年4月2日，广州大剧院免费向公众开放参观一周，为的是向刚刚逝世的英国女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致敬，以表达对她的缅怀之情，同时也让公众更多地感受“结构主义建筑之美”。广州大剧院是扎哈涉足中国市场的第一个项目，这座富有奇思妙想的建筑历时5年完成，总投入13.8亿元人民币，坐落于花城广场西边，外形宛如两块被珠江水冲刷过的灵石，在夜里常有摄影者到此架起照相机捕捉歌剧魅影。

2012年哈迪德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广州大剧院的设计构思灵感来源于精致风雅的中国园林。在她看来，中国式建筑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身在其中，人们能感受到一种“永恒与宁静”。在岁月的长河里，正是这些知名抑或不知名的建筑大师们赋予建筑以生命，从而构筑了有生命的建筑、街巷。它们不仅有史料价值，还具有文化情感价值。

岭南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广州的知名建筑有很多，究其源头，则是因为广州汇聚了一大批本土和国际建筑大师。这些大师为我们留下了镇海楼、陈家祠、骑楼和西关大屋、孙中山大元帅府、中山纪念堂、南越王博物馆、白天鹅宾馆等，至今前去参观的人仍可以感受到那种温热和意蕴。如集岭南建筑艺术与民间装饰艺术之大成的陈家祠（陈氏书院），其木雕、砖雕、石雕等传统工艺运用得出神入化，巧夺天工，多年来一直名列“羊城八景”，扬名世界。中山纪念堂，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典范”，是著名建筑家吕彦直一生呕心沥血的绝唱。

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之前，现代岭南建筑也开始萌芽，岭南建筑学者和建筑师接踵而出，群星荟萃，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林克明等，相继创造了传世的经典作品，并培育了后起之秀。这其中最杰出的两位代表人物是余峻南和莫伯治。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沙面白鹅潭上的白天鹅宾馆，是我国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象征着南粤服务业的巅峰与广州改革开放的荣光。其设计者就是佘峻南、莫伯治二人。佘峻南原籍广东潮阳，1951年起任广州市设计院总建筑师。友谊剧院、广州少年宫、东方宾馆新楼都是他的手笔。莫伯治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建筑事业，早期的代表作包括白云山的山庄旅舍、双溪别墅和矿泉客舍。当时，他们提出的方案与香港的方案进行评选，后来新加坡的丹麦建筑师也带来一个设计方案加入评比。最终，中国本土设计师的方案被采纳，白天鹅宾馆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由国人设计、建造、经营的酒店。

这幢外观为欧式风格的建筑，室内中庭却采用了岭南园林的壁山瀑布，是名副其实的“中西合璧”之作。到广州白天鹅宾馆看“故乡水”，曾是很多华侨归国的保留节目，她萦绕着许多华侨、游子的思乡情怀，是白天鹅宾馆园林景观的灵魂所在。白天鹅宾馆曾接待过40多位外国元首与政府首脑。在外国杂志评选出的“商务人士到广州首选酒店”中，白天鹅宾馆名列榜首。

现代岭南建筑，继承了历史上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前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后，各地建筑师涌向岭南，造就了广州现代建筑的繁荣。如今，大师所培养的后起之秀，如夏昌世的学生何镜堂教授及其执教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仍是中国建筑学专业的重镇，常有佳作问世。

作为国内首座突破圆形设计的体育馆，广东奥林匹克中心独特的造型一直深受各方关注。这座体育馆就是由广州本土的华南理工建筑学院团队和美国NEB设计集团联手打造，将屋顶设计成流动飘逸的丝带形状，轻曼飘扬，寓意着广州腾飞的勃勃生机。内设21个看台小区，专门用不同的色彩予以标识。从高空俯视，丝带状的屋顶使得整座体育馆内部宛若一朵盛

开的广州市花——木棉。

进入21世纪以后，广州进入城市规划大发展时期。一大批地标性建筑涌出。距广州大剧院不远处，同样坐落于花城广场边上，有被称为月光宝盒的广东省博物馆和外形像一本本书垒成的广州图书馆等大型建筑，还有东西双塔。在花城的会客厅上，云集了如此多的建筑杰作，代表了广州的新面目，是现代生活空间的艺术营造。

这些地标性建筑大部分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比如广州塔用的是英国ARUP Qualification公司的设计方案；广州图书馆是日本日建设计公司与广州设计院联合设计；广州第二少年宫采用的是美国SBA国际设计集团的“探索宝殿”方案；广州大剧院是由英国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

这些建筑连同海心沙广场、傲然挺立的東西双塔，加上与之隔江而望的广州塔，聚集在花城广场的周边。每到华灯初上，广州塔的绚烂斑斓与周围建筑的璀璨相辉映，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在此驻足、散步，流连忘返。

许多漫步在花城广场的人，都惊叹于其夜景的辉煌，同时又不免思考，这样的群楼为何出现在广州。城市的发展如何与历史呼应，如何建立一种文化的承传关系，亦即莫伯治所言“文化内涵的沟通”，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历史会给出答案。

## 崭新的地标“小蛮腰”

如果我们问，“哪座建筑是广州的地标”这个问题，恐怕十个广州人中有九个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小蛮腰！”

“小蛮腰”即广州塔（Canton Tower），这座2009年建成、2010年9月开放的广州新电视塔，因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的流光溢彩，而被全世界熟悉。结束了亚运会的转播任务后，广州塔毫无悬念地成为广州



昂然屹立的崭新地标——广州塔

的新地标。每晚，五颜六色的灯光在广州塔变幻斑斓，装点着婀娜多姿的“小蛮腰”，使其成为广州如今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线。

这座电视塔由年轻的荷兰夫妇——马克·海默尔和芭芭拉·库伊特设计。这对夫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家中，把一些弹性橡皮绳绑在两个椭圆形的木盘之间，从而获得了神奇的灵感——马克·海默尔根据自己的初步试验，一步步完善了一座电视观光塔的造型。之后，他们的这个方案被一个投资超过20亿人民币的项目采用，即广州塔。

广州塔塔体高耸，平面呈椭圆形。24根立柱、斜撑和圆环交叉构成了塔体外部的钢结构，塔面则采用了渐变的网格形状，造型简洁统一。塔体上小下大，上下两个椭圆扭转在腰部收缩变细，中部最细的部分在塔顶和底部的映衬下尤为突出，好似古代诗文里所写的女子纤细的腰肢，于是便有了“小蛮腰”这个昵称。

广州塔内部设不同高度的观景平台、旋转餐厅、“蜘蛛侠”栈道等观光与娱乐设施。此外在塔顶观景区还设有摩天轮与“跳楼机”，它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与世界上最高垂直速降娱乐项目。“跳楼机”还获得了世界吉尼斯委员会授予的“世界最高惊险之旅”的认证。广州塔与塔前的花城广场、海心沙广场一同组成了羊城新八景中的“塔耀新城”，代表着广州崭新的城市面貌。有人甚至毫不客气地说道：“没登广州塔，不算来广州。”

每逢广州举办重要活动或发生大事件，广州塔都会在第一时间用灯光告知全世界。它已经是广州的最佳代言人之一。广州塔的诞生，极大地提升了广州文化设施的建设水平，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化形象与影响力，成为广州面向世界的一面新的旗帜，世界瞩目广州的一个焦点。早在广州塔刚建成的时候，便有学者认为：“广州塔是一个地标，一根让广州迈入它所想象的国际性城市的图腾柱。”

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高层地标的变化可以看出城市经济实力增强和技术能力进步，以及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细化到每个高层地标建筑，其内涵也呈现出广州城市竞争力的变化。回顾历史，“广州高度”在80年间一直在刷新：1937年开业的爱群大厦，以64米的高度占据广州第一楼宝座30年，开先河引入国际酒店管理理念。直到1968年，86.51米的广州宾馆跃升当时中国内地最高建筑。此后，1976年建成的白云宾馆、1991年开业的广东国际大厦，依次成为当时中国最高楼，后者更是当时领事馆等外事机构的集中地。而随着1997年中信广场建成，近年来西塔、东塔、广州塔相继封顶，10年来“广州高度”已变更4次。东塔、西塔、广州塔组合成的十字形新中轴线上，聚集了140个世界500强企业的184家项目机构、超过100家总部型企业以及全广州70%的金融机构和90%的外资银行总资产，彰显出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开放多元。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海上丝路的发祥地，经济体量完全能够孕育并且支撑西塔、东塔这种地标式写字楼，这是“经济广州”时代的地标。广州塔还是“文化广州”时代的地标，包括花城广场上的众多新文化建筑如大剧院、广州图书馆等，彰显的是城市文化在城市中应有的地位。从64米的爱群大厦到600米的广州塔，历经80年的快速发展，广州逐步跻身世界一线城市，向着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迈进。

广州塔是世界著名高塔。“中国只有一个‘小蛮腰！’”美国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兼《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Alan Murray）在广州塔宣布，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落户广州。“小蛮腰”在2017《财富》全球论坛大放异彩，让广州名扬四海。广州塔已成为广州的国际科技创新平台。广州塔嵌入国际高端活动，背后是国际顶级地标的全球影响力。放眼全球，从巴黎到纽约，从伦敦到香港，每一个全球地标的诞生，都是城市融入全球舞台的标志，也是城市崛起的有力见证者。

## 结语

今天，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正方兴未艾，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创造力，书写着新时代最为传奇的故事。而广州，作为华南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新一轮国家城市竞争、世界城市竞争中能否再度脱颖而出，更加灿烂辉煌，世界拭目以待！

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商贸中心、交往中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正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迈进。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新的一页正在闪光，前景无可估量。

千年商都、云山珠水，得风气之先，走变革之路，领时代之新，扬活力之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因活跃的自由贸易而闻名全国，一直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营商成本最低的一线城市。在世界城市的高排名背后，变革的欲望激发了广州巨大的潜力。广州，作为一座千年商都和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整个珠三角地区，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任何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如今跻身世界一线城市，是国际对广州全球城市竞争力的认可。这是我们的广州，也是世界的广州。

广州是一座承载光荣、富有梦想的活力城市。如果说，广州的历史是源于一个动人的传说，那么今天，为了追逐创新的梦想，广州吹响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集结号，正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奋斗姿态，义无反顾地登上世界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驱动的“复兴号”时代高铁，续写着一个新的美丽神话。这个古老而神奇的世界大都市，必将散发出一种让人着迷的特殊魅力。

广州，如此美好的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